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从鸦片战争到解救



作者简介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Israel Epstein），1915年4月20日生于波兰，自幼随父母移居中国。1931年进《京津泰晤士报》，开始新闻工作生涯。1937年任美国合众社记者。1938年先后在香港和重庆参加宋庆龄创建的保卫中国同盟，从事国际宣传工作。1951年应宋庆龄邀请，返回中国，参与对外刊物《中国建设》杂志的创刊工作并任执行编辑。1957年加入中国籍。1979年任中国建设杂志社总编辑（《中国建设》1990年1月起改名《今日中国》）。在60年中他除采写大量报道中国历史发展、争取和平友谊的新闻通讯和文章外，还撰写了《人民之战》、《中国未完成的革命》、《从鸦片战争到解放》、《西藏的转变》、《宋庆龄—20世纪的伟大女性》等重要著作。现任全国政协常委、今日中国杂志社名誉总编辑、宋庆龄基金会理事、中国福利会执行委员。

内容简介

本书着重描述了从鸦片战争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这段复杂曲折的历史，具有较强的可读性。作者用可信的事实和生动的笔触，概括了在这一个世纪里，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使这片古老的土地恢复了政治上的独立。

此书已有三个英文版及十余种其它文版在此之前问世。这次再版时又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鸦片战争中香港被英国掠走。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标志着中国历史上最后耻辱的结束。这本书的再版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

在本书英文版第四版及中文版第一版出版之际，作者特意重写了前言和后记。

作者前言

《从鸦片战争到解放》初版印行于 1956 年，1964 年和 1980 年又在北京和香港推出增补修订版。1997 年的这一版已经是第四次印刷。从初版印行以来，在中国和国外，先后印行过阿拉伯语、孟加拉语、荷兰语、德语、印地语、意大利语、日语、葡萄牙语、西班牙语和乌尔都语 10 种译本。英文原版还在印度重印过一次。

第三世界的人民对本书的反响似乎最为强烈。许多跟我初次见面的朋友，都说他们读到过这本书。

读者中还包括一些国家领导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故名誉主席，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喜欢过这本书，1961 年她给我信中说：“我见着加纳总统恩克鲁玛时，他热情地称道过这本书。”

读者中还有研究中国的西方作家，其中有斯诺。他说：“这本书把这么重大的主题，写得这么精练，而所持的观点，则是西方国家著作中非常罕见的。”

我举出这些反响，不是在自我表扬，而是要说明，这本小书的确达到了它的目的。中国这个世纪风云变幻的繁复程度，要把它完全写出来，那真要写成一系列大书。而本书的意图，正如斯诺所说，是让受过西方教育的读者，听到一些“非常罕见”的说法，让他们“换换变速档”，从他们学过的历史书中，找到些他们从未听到过的东西。总而言之，用毛泽东的生动说法，提醒他们，需要把“被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有益于他们了解现实的底蕴。

这种观点新颖的书，西方已出现过许多英文本著作，发掘出了不少连在西方也被忽视的史料。这类史料不仅写帝国主义如何侵略中国和其他被侵略国家，也写了各个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相互争夺的史实。同样重要的还有，各民族之间争取进步的斗争都是相互支持的。这些斗争有些是出于有意，有些只是出于历史牵连所带来的。

撰写这本书，对我本人也是一种自我的再教育。我生长在旧中国的天津，那是外国人管理的一块土地。我接受的教育，在那个时代，都是以欧洲为中心，对殖民侵略者的行为，洋洋得意地百般辩护。我十多岁时上一家英国人办的中学，学校中很少人说中国话，更不教中国的历史与文化课程。相反，在天津英租界里，有不少街道是以外国侵略者名字来命名，如埃尔津路、戈登路、西摩路。连我们学校里的楼也有许多洋人名字。这种到处可见洋人名字的现象对住在这片土地上的我们，等于每天都在心灵上受到侮辱。

世界上的事情，总在变化。特别是我后来在 30、40 年代都过着记者生

宋庆龄 1961 年 11 月 10 日致作者信。

斯诺 1955 年 5 月 25 日致作者信。

涯，采访过中国的抗日战争，这让我从少年时期受到的以西方为中心的教育中解放出来，并产生了把我已知的和未知的事物放在历史背景中加以考察的渴望。

本书在 50 年代初版以来，似乎就在读者心目中点燃了星星之火，让他们对一切重新估价。从那时以来，世界形势的变化对人们也是件清除幻想的工作。最大的变化是新中国的迅速成长；另一个变化是，在第三世界国家里爆发了争取民族解放和非殖民化斗争的连锁反应。而如果不是中国在这方面得到巨大突破性进展的话，战前那种殖民帝国还会苟延残喘，不致遭到重大挑战。

在用英语撰写中国史方面，情况也有了变化。再也没有人公开吹嘘欧洲中心论了。了解中文并能直接查阅中文资料的人，也不例外。然而，在历史界却出现了另一派人，他们也爱对帝国主义和被推翻的旧中国统治阶级说三道四，其中有些研究北京学的专家，竟然感慨地说，中国真是不幸，它错过了走向资本主义的“正常”道路；“如果不曾错过的话”，今天的形势会大有不同。在 19 世纪和 20 世纪初期，中国早期主张洋务派的人，就为清廷找到西方化的路子。后来的美国也主张中国发展私人银行，来代替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半封建、官僚资本主义，等等，等等。

现在的学院派已经具备了用计算机管理、涵盖全部中国知识的条件，他们可以为所欲为地提出各种“如果”、“可能”。他们避免探索的只是，为什么事实的发展总与他们的说法完全不同，即中国马克思主义引导的革命，和走向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竟然如此不同凡响。原因到底在哪里？

对于这一点，某些学者不得不承认，这是个无可避免的结局。他们还说，中国早晚都会走上某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在他们看来，这是走向长远发展的唯一常规道路，特别是工业发展的必由之路。至于别的道路，则都是反常的。就连社会主义本身，在他们看来，也不过是资本的一种模式。在某些国家，私人资本没有大量积累起来，从而发展资本主义就只能成为泡影。从事这项研究的人，其动机显然是，社会主义从理论上、实践上，都是此路不通。这种论调从苏联解体以来，调子越唱越响。

但这类分析家对一项基本事实，假装视而不见，即：正是世界资本主义本身，在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后，封闭了像中国和类似国家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从而使一切历史上的“如果”都成了不可能的事情。社会主义道路，成了中国在一百多年来其他一切可能选择办法都告失败后，只能采取的正确选择。

在外国列强控制中国时期，特别是早期，帝国主义史学家，往往并不隐讳殖民者侵略统治时期以强凌弱的残酷罪行。在他们看来，这是理所当然的权利，因为他们是优秀民族，对劣等民族当然如此。后来，当他们在民族革命、社会革命浪潮下，处于守势时，也不得不承认，列强曾经干过一些坏事。但，即使在不得不承认胜利的革命派有其合法性时，也还说，他们本来并非

存心不善；或者，干过些好事，一般成果还可以，只不过有些冲突原是可以避免的，而这一点，倒是那些起而反抗外国统治的人，该负主要责任。

90年代又出现了一派以哈佛大学哈廷顿（Samuel Huntington）教授为代表的辩护人。他们说，未来的大战里，已经不是民族与政治观念的战争，而是不同文化形态的冲突，即白人的文化与有色人种的文化。这种说法意味着他们又退回到欧洲中心论者的老路。或者说，种族主义者的老路。

《从鸦片战争到解放》这次新版，用英文和中文两种版本问世，它正巧赶上历史上一个真正前进的时刻，即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这是一件盛事，把1840—1841年英国夺去的香港在经过一百年不义战争，不平等条约的耻辱之后，胜利收回。这一百年，中国人民在爱国主义旗帜下进行了漫长的艰苦奋斗，而后取得民族独立。本书正文开始于鸦片战争，结束于全国解放。解放战争的决定性胜利才能在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如毛泽东说的，“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然而中国遭受百年欺凌造成的影响，并没有完全消失。1949年建国之后，又过了近50年，才取得香港回归。而且这还是后来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特别是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政策带来的结果，它还为台湾与大陆统一创造了条件。就是说，香港与台湾都可在未来50年间，保持它们的资本主义制度。在大陆方面，当然要坚持建设社会主义，并使之日趋完善。

应该插上一句，从60、70年代以来，西方那些北京学专家的“也许”、“可能”派，包括苏联在内，他们都说中国没有走上革命的“正规”道路，而严酷的事实是，以苏联的革命为例，王明这帮人奉若神明，其结果屡遭挫败，如果中国依照他们的道路走下去的话，其结果必然是，中国再度沦为受人摆布的地位。

历史已经证明，任何社会都没有一成不变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固定模式。所以，环境条件不同，发展的模式也随之千差万别，这是由它的地理位置、历史条件所形成的。未来还将证明，作者也深深相信，前苏联的解体，并不表明社会主义已经整体消亡，而只是一起个别的特例。以为它可以成为普遍的形式，其实这样的模式是从来就没有过的。所谓的普遍性，只能靠一个社会在前进中自己去探索。

中国已经走上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比原来设想的更长，也更为错综复杂。它虽然有多种经济成分，但并不等于把现代化与私有化等同起来。目标是在现代世界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社会。它欢迎外国投资，容许它获得利润。由于中国及其制度不再受到别人控制，中国经过艰苦奋斗得来的主权、平等地位，可以得到确保，这一点是无可讨论的。

在国际关系方面，中国社会主义的特色也非常明显。旧中国不能抗拒外国的入侵。新中国的武装，恰恰也是用于自卫。中国在国外没有驻军，也没有基地。还不同任何国家结盟。对待其他国家，不论其大小、强弱，也不论它实行什么制度，中国对之一贯采取平等和互惠的政策。

关于其他方面，请看本书的“后记”。

爱泼斯坦
1997年4月

序

在这举世华夏儿女欢庆香港回归祖国怀抱的时候，爱泼斯坦著《从鸦片战争到解放》一书的英文第四版和中译本第一版问世，这是十分令人欣慰的事，因为随着香港回归这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盛事的到来，香港同胞、海外华人和华侨、台湾和大陆的同胞以及各国人士都热切希望了解中国近百年来“屈辱-奋斗-胜利”的历史，而这本《从鸦片战争到解放》正是最适合的读物。

讲述中国近代史的中外书籍，可谓汗牛充栋，为什么我说这本书最适合呢？篇幅适中自然可说是一个因素，但主要的因素是由于作者的特殊经历所产生的对中国和世界事务的深刻认识以及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感情，这种认识和感情在本书中得到最充分的、深沉的表达，从而使本书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这本书的出版纪录也可以说明这一点。它的英文初版出版于1956年，增订版先后于1964年和1980年在北京和香港印行，在此期间，它被译成欧亚10种文字在各国出版。

爱泼斯坦出生于波兰华沙（犹太血统），孩提时就随父母来到中国，在天津的租界里度过了童年和少年，先后在英国学校和美国学校上学，接受的是所谓“欧洲中心”的教育，宣扬殖民侵略的“光荣史”，而对中国的语言、历史和文化则完全抹杀。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后来在30、40年代都过着记者生涯，采访过中国的抗日战争，这让我从少年时期受到的以西方为中心的教育中解放出来，并产生了把我已知的和未知的事物放在历史背景中加以考察的渴望。”

本着这种寻求真理的精神，他阅读了大量史料并访问了许多人物和地方，包括1944年突破封锁访问延安，采访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从1938年起，他为宋庆龄（孙中山夫人）创立的保卫中国同盟工作，同这位为继承和发展孙中山革命事业奋斗终生的伟大女性建立了长达半世纪的友谊。所以爱泼斯坦对中国和中国百年革命的了解和见地，是把历史记载同现实生活相互印证而得出的，因此是最可信服的。

爱泼斯坦有语言和文化背景上的便利，又加上他的勤奋，所以他能够发掘和使用的外国史料，比一般中国作者要多，这是本书的另一个值得称道的地方。这方面的具体事例，读者在阅读本书时随处可以感到，这里就不征引了。

历史在前进。旧的殖民时代已经过去（香港的和平回归是一个突出的标志）。但是，殖民时代思想的残余还会长期存在或以某种新的形式再现。例如，还有人为殖民主义辩护，还有人认为中国应该“西化”，等等。因此，正确了解和认识中国近百年来历史发展的轨迹，正确了解和认识邓小平同志所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乃是中国历史的必然选择，仍然是一桩十分重要的事情。为此，爱泼斯坦为本书的这一最新版本写了很长的“前言”

和“后记”，以帮助读者在了解了中国的百年史实之后，再进一步辨析当前各种思潮，以深化认识。

爱泼斯坦是我素所钦佩的至友，他治学严谨，坚持真理，以八十二高龄而孜孜兀兀，勤奋工作一如往昔，我衷心祝贺他这本书新版的出版。我特别高兴的是他采纳了我的建议，出版本书的中译本，以满足中文读者的需要。我还要感谢老翻译家符家钦同志，他欣然接受并在短时间内圆满地完成了这一相当繁重的翻译任务，感谢今日中国出版社工作同志为赶出本书所作的努力。

让我们再一次为香港回归祖国欢呼！愿本书新版本的出版成为举国同庆中一朵小而明亮的礼花吧。

黄 华
1997年4月
于北京

从鸦片战争到解放

第一章

古老中华

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的历史，有几千年之久。在这段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涌现了许多争取民族独立和社会解放的杰出战士，还孕育了不少著名的自然科学家、发明家、工程师、哲学家、诗人和军事战略家。这些华夏健儿把中国物质文明推进到很高水平。他们熟练的农耕技术养活了大量人口。众所周知，他们的工业和科学发明有造纸、蚕丝、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和陶瓷制品。此外，比起欧洲来，中国领先几百年的技术还有：

使用煤作为燃料。

深井采盐和天然气（似今天应用于油田开采石油油气的原理）。

冶金工艺中采用自然流水驱动的水轮活塞鼓风机。

机械学上的差动齿轮和钟表装置。

造船上使用尾柱舵、密封舱和明轮。

敞肩拱桥、悬索桥和运河闸门。

察觉地震的地动仪。

算盘、高度精确的圆周率及数学上的二项式定理。

战争中使用的弩、火炮及火药火箭。

中国人开始炼铁并不早。但由于他们首先用煤作燃料，因而在这项重大技术方面进展很快。公元1世纪罗马史学家普林尼在他的《中国钢铁技术的发展》里指出，在罗马时期，中国铁器的精良品质是举世无与匹敌的。这位罗马人还把中国称为 *Serica*，即丝绸之国，说明当时中国丝绸非常出名，成为两个帝国间的贸易品种。

事实上，中国生产技艺领先于西方，几乎长达两千年之久。像中世纪旅行家马可·波罗，就对中国贸易中居然使用纸币，感到吃惊。因为在那个时代，哪一个国家也没有使用过纸币。虽然马可·波罗到底是个商人，只对纸币感到兴趣，而未注意到当时钞票以及书籍，都是印制出来的，而中国发明印刷术的重要性，在欧洲也居于领先地位。直到18世纪末，所有旅行家谈起中国来，没有一个不交口称赞。

然而，没有多久，欧洲的变革就证明，尽管中国技术领先地位不管历史有多悠久，在封建社会制度下，它很快就会被另一种新的制度，例如资本主

关于这方面的其它发明，见李约瑟（Joseph Needham）《中国科学与文明》（剑桥版），中文译本从1954年起已有多卷问世。

见《中国钢铁技术的发展》（1958年，伦敦版）。李约瑟教授说：“在5世纪至17世纪期内，是中国人，而不是欧洲人，在铸铁、炼钢的技术改进方面，得到很大进展，其中许多是欧洲人从未想到过的。在中世纪，除中国之外，也不可能找到如此丰富的钢铁供应来源。”

义，迅速超过。中国封建地主统治的历史有两千五百年之久，但很快便在欧洲社会面前，被人列入“落后”的行列。从此以后，西方的教授便喋喋不休地说，中国甚至整个东方社会都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

这种说法既不科学，还具有沙文主义的意味。提出这种论调的原因，本来就是为资本帝国主义大肆侵略亚洲制造借口，说侵略是为了传播“文明和进步”。后来有些人出于对东方现在的革命感到恐惧，又提出一种新的理论。这种人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说，这种制度必然将取代资本主义，原因不在于它有什么进步性，而只在于它是“东方专制”的化身。

认为东方专制是根据“水力社会”形成的（指东方中央集权的专制，控制了全国灌溉系统）。这跟希特勒的种族主义理论一样，它也追求着同样的目标，即向人民灌输这样的思想：人类只有某一部分人的发展形式，才具有道德价值。此外的一切人种都是卑劣、“异己”、威胁成性。其实，这是很古老的政治手腕，说某些“优秀民族”比别人优越。这种说法不符合历史真实性，毫无科学依据。其意图只在于让帝国主义国家人民忘掉本国内部诸如进步与反动的阶级力量一类问题，从而成为统治阶级手中的驯服工具。就是说，自己国家的压迫者可以压迫其他国家的普通老百姓。

从实际情况看，跟上述这种论调相反，中国的发展，跟其它社会走的是同样的道路。只是它的步调有时快些，有时慢些。中国同样是从原始氏族社会（宗族的与部族的）开始，经过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只是它的发展过程比欧洲国家要早几个世纪而已。接着它在封建社会就停步不前，时间比欧洲封建社会长两倍，因而就落后了。

现在，情况又改变了。不像欧洲，它的资本主义建立起来后，就牢牢站稳脚跟，维持了几百年而不衰，而中国则很快便推翻了外国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制度枷锁，迅速转变成强大的、现代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所以可以说，在当今世界上，老牌的资本主义才真正处于“停滞状态”。（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在建立社会主义过程中，除了千百年来技术上的相对滞后外，主要的负担还在于从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而不是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习惯与传统，还有待克服。）

至于要问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能长期存在、停滞不前，中国历史学家至今还没有一个完善的答案。但以下几个原因是经常被讨论到的。

第一，封建社会的某些特点，尽管它表现形式并不相同，但却程度不同地始终存在：

以农民来说，它生产的农产品和手工艺品，大都用于本人使用；商品未能大量流通，自然就不能摧毁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维特福格尔（K.A.Wittfogel）是帝国主义者宠幸的“中国史学家”。他原是共产党人，冷战时期转而侈谈地缘决定论，来取代马克思提出的经济社会力量决定历史走向的学说，为麦卡锡在美国掀起“戴红帽子”政治迫害运动效力。

地主阶级从农民手中取得的地租，也大部分用于满足自己私欲和维持统治的需要。后者包括养活朝廷的大批官员，还要用于为了国内镇压人民，边疆抵御外敌而进行的连绵不断的战争。所有这些开支，使得资金无法积累起来，用于投入工业和贸易。

第二，也是最重要的。据许多历史学家看来，中国封建社会还有些独具一格的特色：

以皇帝为首的中央集权机构，很早就已经形成。不像欧洲那里的中央权力不能在王室和城市新生资产阶级的联盟中居于统治地位。恰恰相反，以皇帝为首的，从首都直到乡村组成的庞大帝国官僚体系，只是为了满足皇帝统率的整个地主阶级的需要。而这个官僚体制，并没有形成一个明显的统治集团，如许多主张“东方社会特殊性”论客那样，把这一点作为东方社会性质“基本上有差异”的一个论证。可以说，这个体制是高度发展的封建社会的工具，它的特点是，拥有土地的统治阶级，通过地租（或贡物）劳役、产品或金钱等方式，来剥削农民。在中国，城镇是由占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派官员来治理，派军队来守卫的。因此，工商资本家根本不可能在这些地方发展自治性的城市武装据点。不像欧洲那样，地方诸侯之间随时发生冲突。

如何看等中国封建社会这种上层建筑，把它作为这种社会的“典型”，或者作为“特例”，关键在于你从什么角度去观察，即你用中世纪的欧洲，或中国的古代作为标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中国这种形式非常精巧，其中中央集权的程度之高，是世界上任何其它大国都很难找到的。这一点也说明了这种制度为什么能维持那么漫长的时间。

有些采矿与制造业的主要部门，如铁、盐、丝和陶瓷，以及茶、马等贸易业，早就由地主国家所垄断。在这些领域里，商人只有从封建权威那里取得许可证，才能操作经营，而这种许可证是随时可以取消的。在这类严密控制的企业里，工匠大多数既不是领工资的工人，也算不上来去自由的工匠，而是国家的农奴。商人的政治地位很低，一般进不了政府的要害部门。因此，商人致富以后，并不甘心老当商人，而是想方设法打进居于统治地位的地主阶级，及其官僚机构。

在上述这种体制下，中国封建主把商人，高利贷者都变成自己的从属，三者结合成一个紧密而牢固的三位一体剥削者。而一经牢牢结合之后，经过多大变乱，这种体制也能安然无恙。它能在无数次经济危机以及物质进步之中保存下来，使中国封建经济与技术，处于从它的科学与发明来说，既不冻结，又原封不动的状态。但最后，政治与意识形态方面的这种精巧构成的上层建筑，总不能使经济与社会的基础，在漫长的阶段中，保持原来状态。我们可从现代国家中，找个可供对比的例子。英国的资产阶级，找到一个与贵族妥协的巧妙方法，即运用皇室，铸造一个工党，使首相不能长期干下去，而要准备换班。同样，美国资本主义也不能让民主、共和两党玩他们的政治把戏，尽管两个党都受垄断资本操纵，却能成为各个社会阶层中唯一可以接

受的模式。其目的还在于，使工人们以为，在美国，也不需要工人另组成一个自家的政党。对一个人剥削人的社会，政治手段可以不同，但阶级之间的斗争不会熄灭，一旦条件成熟，就能完成它的历史使命。

在中国古代，基本的革命阶级是农民，他们处于地主、商人、高利贷三位一体的统治之下。多少世纪以来，农民曾经跟强大的压迫势力，英勇不息地孤军奋战。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书中特别指出过，两千多年来，出现过 17 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大小不等的起义不下几百起。毛泽东指出，“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因而“只有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至于为什么尽管这些斗争推翻了王朝，重新分配了土地，却并不能改变旧的体制，原因是物质与社会的进展，还没有把一个接班人推进历史舞台。因为历史已经证明，单靠农民本身，不可能建成一个新型社会或国家政权。直到新的阶级出现并积蓄起力量，他们才能进攻和粉碎封建制度。到 20 世纪，资产阶级才开始诞生，并在农民起义浪潮中增强实力，夺得政权，建立起自己的资本主义剥削体系。然而，在今天的世界上有一个年轻的工人阶级，能够推开资产阶级，带领农民作为自己的主要盟友，从进行反封建主义革命，直到最终结束人剥削人的制度，从而建立起社会主义。这就是中国最终发生的事情。但是，直到一切条件成熟之前，农民起义不可能超越封建主义，虽然它对封建主义的打击也能刺激生产力和其它进展，时机到来时，能够创造革命传统，取得最后的胜利。

自然，资本主义的种子在中国并不是没有存在过的。特别是在 17、18 和 19 世纪初期，资本主义萌芽过、发展过。商品交易有过某种程度的发展。在明朝（1368—1644 年），曾将封建租税和劳役合并成单一的货币税，用银元支付。官方可命令农民种植棉花；把生意人组织起来，或资助他们开纺织厂，有的厂工人达到几百人。对外贸易也开始发展。接着清朝（在西方入侵之前），光广西省矿工就达到 1 万人，广东省有 5 万纺织工人。制茶业出现大作坊。有的工人超过 5 千人。江西景德镇著名的瓷窑工艺异常精致。山西省相当早就有银行信贷业务的“钱庄”，它在全国很多地方开展业务，经营汇兑、存款、贷款，有时还是国家收税的代理人。

所有上述现象，都证明马克思所阐述的，各种社会阶段演变的顺序，不论在东方或西方，都是社会进化的趋势。但如上面指出的，有的地方可能推迟一些。因此，才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中国的封建制度的崩溃，并非由中国的资本主义来完成，而是通过外来的因素。再说，我们还应该看到，外来的因素还限制了、削弱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在 18 世纪中叶后，英国成立了东印度公司，它在征服印度之后，变成了在“中国贸易”大捞一把的带头人。在对华的贸易中，中国只是英国制造品的供应来源。它输出的只是茶、丝、棉织品、陶瓷和其它制成品。作为回头货，中国进口的不多，大都是生

皮、药品原料和富人餐桌上的食品。

1796年，乾隆皇帝答复英皇乔治三世要求增加贸易的上谕中说，“我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来货物，以通有无。”这种说法虽然是实情，但显然出于无知。表明了清政府何等顽固昏聩。说明中国封建当权者害怕变革，对外来的新事物忧心忡忡，完全没有注意到西方的经济实力和资本主义工业化带来的军事威胁，更不关心新的技术可以用来加强防卫力量。

在这段期间，英国商人在中国销售额不大，而且他们采购中国商品要付出银洋。银洋也有段血腥历史。它是美洲印第安人在墨西哥和秘鲁的矿工在鞭子抽打下开采出来，大部用于拉丁美洲的西班牙种植园主偿付英国人从非洲拐卖黑奴的款子。英国人拿到这笔钱后，又用于在印度收买好衣料和香料。在征服印度以后，又从印度人手中把这些银两用强制贡金办法榨取回来。这样一来，随着资本主义的进展，从奴役抢劫一个民族得来的银两，转过来又可用于奴役抢劫其它民族。

第二章

鸦片、军舰、传教士 (1840—1849年)

由于银元供应不是取之无尽、用之不竭的物品，英国东印度公司便寻找另外的途径来支付进口中国商品的货款。结果找到了鸦片。当时在印度的一位目击者，描述了怎样找到大量鸦片的办法：

东印度公司的领地内，从种植罂粟，熬成药品，运销出口，全都严格属于专营的范围。...种植是强迫的.....印度北方、中部贝拿勒斯、比哈尔等邦的大片良田都遍种罂粟。自古以来用于种粮食、棉花等作物的沃土，如今已一律禁种。——

1781年，经过周密计划之后，公司第一次把大量鸦片运到中国，当时中国还不知道鸦片为何物。从此以后，鸦片生意便扶摇直上。没有多久，中国出口的茶、丝等货品便不够支付进口鸦片的货款，中国的白银便从进口变成外流。

1800年，清朝皇帝对鸦片进口带来的物质和经济影响感到严重不安，便下令禁止鸦片贸易。但到这时，许多人已经吸鸦片上瘾，变成不能戒掉的嗜好；再说许多从事这种生意的商人和官员，都从中得到重利。所以，皇帝的禁令，由于走私贿赂变成一纸空文。

每年进口鸦片迅速增长，从1800年进口2000箱（每箱100斤到120斤），到1838年进口猛增到4万箱。人们还注意到，美国船只早就参加了英国人经营的这项肮脏生意。美国人从土耳其买进鸦片，在士麦那装船，贩运到中国来。后来美国用这种办法，组成了几家商务公司，经营鸦片贸易。

这样，中国白银外流像开了闸的湍流，大量流失。单是1832—1835年间，白银流出2000万两。国内银价随之暴涨。由于农民的粮价下降，整个负担便落在农民身上。地主和收税官员，趁此机会因可多收粮食，反而大赚其钱。这种局面，增加了中国封建社会的紧张关系。从18世纪中叶起，出现了一波农民起义的新浪潮。从1810年起，反清起义越来越频繁，地区越来越广泛。1813年一次起义队伍，曾经打进了北京宫廷。

为了自保，北京的清朝统治者不得不采取行动。在颁布了一道严厉禁止鸦片贸易诏书后，还任命一位主张严禁鸦片的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前往广州。林则徐在人民支持下，首先封闭了英国和美国的商行。强迫他们交出手头的两万箱鸦片。1839年6月3日，林则徐当众销毁了这批鸦片。

其结果是爆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在这场战争中，西方所谓“文明”国家掠夺成性的面目，与中国封建帝国外强中干的真面目，完全暴露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面前。1839到1842年间，英国部队在沿海各地登陆，占领了广州、上海、厦门、宁波，还深入内地，把华北华南鸦片贸易大动脉的大运河切断。英军在各地战争中，大肆掠夺和屠杀居民。

中国守军的英勇抵抗，甚至连敌军也不得不交口称赞。一位进攻广州的英国军官描写说，“多么顽强，令人尊敬。”另一位参加浙江定海之战的英国军官说，“要说高贵，谁也比不上这些中国士兵。”据守长江镇江的一位中国指挥官，在他的战士全部阵亡后，和敌人肉搏而同归于尽。城市沦陷后，总督“回到他的卧室，架起一堆木柴，将官方档案搁在柴上，然后点火自焚殉国。”很多地方的官兵，看到自己的弓箭比不过英国的武器，又不甘愿投降，便先将全家人杀死，然后自尽。合计一下，这场战争英军阵亡约 500 人，清军战死共 2 万人。

值得昭示后人的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唯一一次对侵略者打了胜仗的，并不是封建军队，而是农民。1841 年 5、6 月间，广州城清军向英军投降后，附近的三元里村却打了一场仗，打退了入侵英军。领导这次斗争的是一位园林工人。他们成立了一个有 100 多个村庄组成的民兵抗英组织，称为平英团。这个团打败了两千名英军，还把英军包围得严严实实，最后还是清廷投降派官员出来干预，才给解了围。

从三元里抗英斗争中，中国人民第一次显示了不能依靠腐朽的封建政府来捍卫国家，只能依靠农村群众。尽管他们武器并不精良，却能保卫家园，打败拥有现代化武器的侵略者。

然而，腐败的中国封建政府，并不想依靠人民的潜在力量。在无能为力又摇摆不定之下，很快便投降了。

1840 年，当英国军舰开到距北京只有 90 英里外的海岸时，清廷才感到震惊，开始和侵略者举行谈判，同时将林则徐革职。皇帝认为是他焚烧鸦片，才造成战争。不久，又将与英方谈判的琦善再一次逮捕。

从琦善抄家没收的财产清单，可以看出封建官员掠夺人民财物何等凶狠。这份清单中有 11000 两黄金，1700 万两白银，无数箱珍宝，加上 42.7 万英亩农田。当时佃农、小自耕农拥有的农田，还不到两英亩。而琦善绝不能算最富有的官员。

战争结果是中国第一次被迫签署不平等条约，使国家几乎走上亡国灭种的边缘。1842 年的南京条约和 1843 年的附加条款规定：

1. 赔偿林则徐在广州焚烧的鸦片费，等于保证未来鸦片生意人的安全。
2. 割让香港，英国从此以香港作为在军事、政治、经济上入侵中国的基地。

这个模式后来其他外国侵略者仿效，通过租界或其他各自已经取得的特权也照样办理。英方占领香港 156 年之后，才于 1997 年终止。

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个主要港口，作为与英方贸易口岸，不久并在口岸内设立飞地。

这些地区后来都悬挂英国国旗，成为租界。

在中国领土上英国人享有治外法权，不受中国法律管辖。

英国从中国得到的特权，后来被许多国家起而效尤，纷纷取得“最惠国

待遇”。实际上，这套立法持续了一个世纪，使中国沦为“最不受优惠待遇的国家”。

由于条约有一个内容，中国对外国商品进口的税率，不得超过 5%，这就大大阻挠了中国国内工业的发展。

看到中国的弱点后，其他外国的使节纷纷开着军舰前来，要中国签订类似的条约。第一个是美国的顾盛，他带着三艘炮舰狂妄地通知两广总督，威胁说“拒绝谈判将被认为是对我国的侮辱，足以导致一场战争。”顾盛在 1844 年强迫清廷签订了《望厦条约》。这个条约除了得到与英国一样的特权外，中国还给予美国更多的治外法权，减免关税，以及中国内河航行权。美国历史学家德涅特吹嘘说，“这项条约得到的优惠，成为后来的中法条约的模式。它得到的最惠国待遇，比英国得到的利益还要多。”

随后不久，英国企图再签个“条约”，从海上陆上侵占中国主权。1847 年，它施加压力，要中国官方划定印度与西藏的边界，企图按西方要求划界。它把这要求向两广总督耆英提出来，因为英国海军在这里处于优势地位。但军舰不能开进亚洲的中心，所以耆英总督向皇帝上奏说，“英人要求十分可疑”便没有采纳英方要求。英国人后来对中国的西部边疆总想千方百计蚕食吞并。可以说，后来每个外国企图渗透离间中国的西藏，其手段、过程，都是从英帝国主义入侵、瓜分中国的办法中学来的。

还有一点也该指出，即从鸦片战争中看到某些传教士所起的作用。由于他们了解中国国情，通晓中国话，他们表面上是来中国传教，实际上则也是在凌辱中国。

其中有位传教士叫古茨拉夫博士，他在英国雅尔丁鸦片烟公司中，充当中间人，从而为他的宗教杂志挣得一笔津贴。他虽然不是英国人，而是普鲁士人，但在鸦片战争中为英国部队充当翻译和情报人员。他的专长是招募和使用中国间谍。早在 1832 年他就雇用一批卖国贼绘制中国沿海的海防设施。在 8 年之后的战争中，当英国侵略军攻占浙江舟山群岛的定海，后来又攻占宁波大港口后，古茨拉夫都被任命为占领区的行政官员，而他最爱使用的统治方法，是残酷无情的拷打。在南京条约的谈判时，他也担任翻译官，最后被任命为香港英国政府的中国司长。

在与美国签订的《望厦条约》中，也是美国传教士威廉斯、布里吉曼、帕克（后出任美驻中国公使）向美国外交官顾盛建议说，你们在跟中国官先办交涉时，其立场应该是，中国在美国人的恐吓之下，必须“低头屈服”。

韦利（Waley, Arthur）：《中国人看鸦片战争》（The Opium War Through Chinese Eyes），1958 年，伦敦版。书中第五章标题为《古茨拉夫和他的叛徒一伙》专门写这一帮伪善流氓。

德涅特（Dennett, Tyler）《美国人在东亚》（Americans in Eastern Asia），1922 年，纽约版，160 页。这位作者对《望厦条约》如此热忱吹捧，竟然在书中专设两章，称颂顾盛条约优惠得惊人，说顾盛这位谈

在那个时期，侵略中国的政府，毫无例外地都采取诡辩、伪善的殖民手法。在鸦片战争中，英国向各国声明说，它进行这场战争，并不是为了鸦片生意，而是要教训中国不得反对进步和自由贸易。关于这个目标，中国谈判代表在南京时，曾问过英国使节朴鼎查，根据朴鼎查本人的报告，“我们（英国人）为什么不能在我们领地禁种罂粟，而且有效停止这项对人类有害的贸易，以示公平呢。”朴鼎查的回答是，他承认鸦片生意肮脏，但英国政府不能停办，因这样作“并不符合我们的宪法体制”！

这就是资本主义“自由体制”所谓的精神福祉，即对西方经济政治侵略是一套，而对亚洲的受害者是另一套。物质福利也有同样的情况。到 1850 年，使中国贫困衰弱的鸦片贸易，却占到印度英国政府收入 20% 的份额。

为了使读者不至于感到我们对鸦片战争讲得太多，有必要说说战争带来的影响多么深远。

鸦片进口在中国一直持续到 1917 年。5% 的进口关税一直持续到 1928 年才得以废止。

外国人在中国享有的治外法权，一直持续到 1942 年。实际上中国法律直到 1949 年解放才得以执行。

租界一直作为外国在中国领土上扩张侵略的跳板。外国商品在中国国内运输，享有免税特权。从此，中国内的欧洲和美国商行，处于受保护地位。这就出现了“买办阶级”，他们在使中国经济受帝国主义控制上，起了重要作用。

事实上，买办阶级不论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成了中国沦为半殖民地的萌芽。后来、亚洲、非洲、拉丁美洲许多国家也出现了这种外国控制带来的产物。

这就是为什么学习鸦片战争的历史，直到今天还值得我们重视，而且作为了解当前事务的一个原因。

实际上，到 1997 年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距香港被占领已 156 年。这场胜利是经过长期斗争取得革命胜利之后，又经过几乎半个世纪的全国人民自力更生的奋斗，才最后完成的。

判家非常聪明，具有深厚，漂亮的法律头脑，故能得心应手。他还列举顾盛条约实际上是走私偷运行当里一盏明灯。

第三章

太平天国革命 (1850—1865年)

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望厦条约》的签订，揭开了中国被奴役和中国人民争取独立斗争的一个世纪。从那时起，中国人民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权，必须对两大敌人作战。即不仅对付外国侵略者，还要对付封建统治者，那帮统治者既不打算、也无力保卫这个国家。

从社会和经济意义上讲，这些条约的最大影响在于，把进口关税限制在5%以内。这是应那些英国工厂主的主张而制订的。它鲜明地显示出制造商们在商界的至高无上地位。欧洲社会的这一特色，对亚洲的殖民扩张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经过英国企业家的争取，东印度公司在中国贸易中的特许垄断权被英国国会在1834年中止。在中国方面，鸦片战争的失败结束了皇帝特许的商人在广州跟外国人做买卖，他们的角色被那些买办取代了。买办们的身份不再归中国皇帝特准，而是由外国资本家来挑选，成为他们的仆人和工具。

这场战争后，鸦片贸易不断发展。1850年达到5.2万箱。1853年超过了8万箱。但增长更为迅速的是英国和美国的棉纺织品进口。中国从纺织品出口国变成了买主。欧洲工业资本家的剥削又加上了欧洲商业资本家的剥削。它给中国的经济带来了更大的震荡。

由于中国必须向英国支付赔款，白银外流加剧。一位中国高级官员在1852年写给皇帝的奏章中说：

过去一两银子值1000个铜钱，现在一两银子值2000个铜钱。过去卖三斗米交一亩地的地租还有剩余。官府收上来的仍然是那么多，而小民的实际付出却加了一倍。无力交租者不可计数……派出的吏卒日夜追索，把他们打得血肉横飞……”

成千上万的织布工和其他手工业者也破了产。原因不光是出于市场上的竞争，还出于对他们运营资金的掠夺。商人和贷款人过去把钱借给手工业者，现在开始投在外国商品上了。

被迫开放的几个新港，使原有的内陆运输体系被外国人取代。原来所有外贸货物都运到广州，——那时唯一的开放口岸。现在不同了，中国南方的数千船民和脚夫丢了饭碗。

外国的剥削很快便达到了人类在贸易上猎取行为的逻辑顶点。在1840年开始的“苦力贸易”中，成千中国人被装进英国和美国船只里运往世界各地，航程中的死亡率有时超过1/3，美国作家麦克纳尔称其为“条件之恶劣

《曾国藩奏章》1852年2月7日，转引自邓子榆《太平革命史札记》，1950年，哈佛大学出版社，44-45页。

有如置身在古代非洲的奴隶船上。”

代理人每搜罗到一名华工，用强制或诱骗手段订立 8 年劳动“契约”，可以得 7 到 8 美元。而到岸的幸存者，每个苦力价格却是“从 400 到 1000 美元。”他们在古巴、德梅拉拉（英属圭亚那）和夏威夷的蔗糖，马来亚、智利和秘鲁的矿产，以及遍布美国太平洋沿岸各种行业，从事繁重的手工劳动，为西方资本家提供利润。很多人像后来中国朝廷派遣到西班牙统治的哈瓦那的官员们报告的那样，“被打死，受伤致死，吊死……有的被丢进矿井和煮糖的大锅。”然而，他们也常常奋起，英勇地同压迫者斗争，无论在海上，还是在干活的当地。

今天，非洲和拉丁美洲华人劳动者的团结性，还有美国黑人的紧密团结性，都是从他们先辈在奴隶船上，种植园里和种族主义者皮鞭下的反抗斗争中发展而来。

西方这种持续的侵略行径，使中国封建社会陷入深刻的危机。反抗清政府的暴动和抗击外国侵略者的爱国斗争同步增长。如我们所知，鸦片战争后尽管政府签了投降条约，广州附近农民却起来抗击英国人，并且取得了比朝廷军队大得多的成功。在其他南方港口，虽然地方政府因循苟安，然而对苦力的绑架行为激怒了民众，“反对外国人的情绪普遍高涨。”

当时流行这样一句话，“百姓怕官府，官府怕洋鬼子，洋鬼子怕老百姓。”

显然，在这种形势下，百姓怕官府也不会很久了。

耻辱的《南京条约》和《望厦条约》签订刚刚 7 年，太平天国起义的巨浪就席卷了全中国。它既是中国最后一次旧式农民起义，又是现代中国人民第一次伟大的民主斗争。这一革命运动起源于靠近越南边境的广西省，其成员不仅有受剥削侮辱的中国多数民族——汉族群众，还有生活在受封建统治者野蛮待遇、处于苦难中的少数民族。队伍迅速壮大起来，像一支燃烧的剑，切割了这个广大的国家，矛头直指北方的北京、东部的上海和西部的西藏山区。

比早先任何一次起义显得更为成熟的是，它建立起一个平民革命政权——太平天国。这个政权持续了 15 年（1850—1865 年）之久，定都于南京，那正是清朝政府与英国签订第一个不平等条约的城市。

太平军是一支有组织有纪律的部队。他们制定的土地法令撼动了封建主义的根基。他们向封建儒家文化的根本观念挑战。他们在面对外来干涉时制订了真正的国家外交政策。

这支起义军的发起人和最高领袖洪秀全是个穷苦教师，他饱受清朝腐败

麦克纳尔（McNair, H.F.）《海外华人》（The Chinese Abroad），1924 年上海版，209—215 页。

西华（Seward, G.Frederick）：（Chinese Immigration in its Social and Economic Aspects）《中国移民—从社会和经济方面的考虑》，1881 年，纽约版，它提供了大量这类英勇反抗的事例。

德涅特（Dennett），同书，536 页。

的官府之气。他生在广东省的花县，深受被压迫人民的影响，并受到广州农民武装抗击英国侵略者斗争的鼓舞。同时，他加入了带有基督教色彩的组织，但不像牧师那样从事传教活动。他自称“耶稣之弟”，以“为上帝驱逐妖魔，共享太平”，来与传统的儒家学说相对抗。在这方面他与几个世纪前的欧洲的反封建斗争的领袖很相似，如英格兰的约翰·保尔，德国的托马斯·闵采尔，还有捷克斯洛伐克的胡斯。

洪秀全早期的几个伙伴反映出这场运动的阶级基础。一个是没有土地的烧炭佬杨秀清，后来成为太平天国拥有至高权力的军师和军事统帅。第二个是贫农、木匠萧朝贵；第三个是乡塾教师冯云山。同时看得出，一小部分相对富裕的士绅，他们反对朝廷是出于民族的，而非社会的原因。事实证明他们并不稳定。

韦昌辉是地主兼典当商人，他在太平天国全面胜利在望关头，加剧了内部分裂，扮演很不光彩角色。石达开是位能干将领，他带兵回天京，原想制止内讧，后来率军西征。但这次分兵削弱了天国革命，在四川山区被清军包围，最后全军覆没。清军答应赦免他和他的余部，结果被敌人解到成都，凌迟处死。

（石达开部队是在大渡河被围的。70年后的1935年，毛泽东、朱德率领的部队长征中也经过大渡河。蒋介石曾经预言，红军要步石达开的后尘，没想到政治军事素质比太平军成熟得多的红军，在当地人民支援下，敢死队员冒着敌人冲锋枪的炮火，渡过正在燃烧中的铁索桥，越过湍急的河水到达对岸，为长征、也为中国革命，打通了道路。）

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几乎与1948年席卷欧洲的民主风暴同时。这一点在当时并未被人忽略。“圣经与鸦片”传教士古茨拉夫与洪秀全是截然两样的基督徒，1849年他从中国回到德国。据他的所见所闻大声疾呼说，首次作为独立政治力量出现的欧洲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思想，与“中国众多下层暴民所宣传的何其相似。”

这一看法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尖锐批评。这一批评写于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侵略的开始时期。这是欧洲最先进的无产阶级成员与觉醒的被压迫的东方“睡狮”之间牢固友谊的首次体现。这种友谊发展到今天，已成为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核心力量。马克思1850年1月31在《新莱茵评论》中写道：

中国社会主义与欧洲社会主义之间的联系，可能就像中国哲学与黑格尔学说之间的联系。在世界最古老稳固的帝国所引起的兴奋，与在棉纺织品上大显身手的英国资产阶级如出一辙。在社会主义革命发生的前夜，无论如何，它必将对文明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当我们欧洲的反动派溜到亚洲，受到短暂欢迎之后最后来到中国的长城，来到这通向保守主义最主要堡垒的大门时，他们总会看见这样一段铭文：

“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

太平军不断取得惊人胜利，是因为它们赢得了人民的爱戴，并释放出他们的能量和才干。这是太平军的社会和政治纲领的效果，他们强调所有财富

人人共有，这特别迎合那些农民的胃口。太平军所到之处，他们捣毁了可恨的清朝官府，罢免那些官吏，把他们的财物分给穷人。

为了取代土地在封建地主手上的高度集中，太平军颁布了平等的《天朝田亩制度》，这部土地法规定“天下所有土地归天下所有人耕种……”

对穷人和赤贫者来说，太平军给了他们一个声明，决心做到“不使一个人无食无衣。”

取代盗贼和寄生虫式的清朝军队，太平军创造了一支人民的军队。他们既能作战，又能劳动，禁绝吸食鸦片、赌博、贪污，维护革命秩序。

封建社会妇女从来没有过任何权利。太平军规定，妇女与男子同样分配土地，也同样可以参加太平军。卖淫、缠足和买卖婚姻都在禁止之列。

一位美国传教士对此评论说，相比之下，中国这个封建王朝有兴趣的只是西方的军队，而太平军却吸引了欧洲人思想中那些为人民服务的部分。这位传教士看到太平军所住村子的墙上，还保留着这样的告示：“准备房屋供接种牛痘。”

一位曾参与镇压太平军的清军将领在给长官的报告中忧心忡忡地写道：“同心同德、熟悉地理环境和崇高的使命感，这是敌人的强点和我们的弱点所在。”不论哪个时代，所有跟老百姓作战的人都会发出这样的抱怨。一位英国外交官写道，每当穿越过太平军的地盘，就会“得出一个明白无误的结论：凡是太平军占据过的乡村地带，一定会比大清的军队占据过的地方，生活更安定，人民更富裕。”

太平军不承认外国人迫使清政府答允的任何特权和优惠，但他们愿意，并认真希望同各国发展平等的贸易关系。热情为太平军辩护的英国作家呤利，从中国贸易报告中引用了下面的统计数字，说明太平天国时期生产和贸易是怎样同步增长。1849—1850年，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前两年，中国出口5396万磅茶叶，16134包生丝。1862—1863年，当所有主要丝产区和大多数茶叶产区落入太平军手中时，茶叶出口翻了一番以上，达到118692138磅，生丝增长5倍，达83264包。

尽管他们有着一种平等乌托邦的农民理想，实际上太平军的改革已经带上了通向资本主义道路的特色。

1856年，太平天国在南京建都后第三年，地主、叛徒韦昌辉对农民领袖杨秀清及其部下进行大屠杀。洪秀全很快处死了韦昌辉，然而政治上的停滞和衰退并未就此中止。虽然太平天国政权和军队又维持了9年，得到城市和农村贫民继续衷心支持，太平天国运动还是走上了历史的死胡同。

本处及下面引文均引自呤利（Augustus Lindley）著《Ti-Ping Tien Kwoh, The History of the Ti-Ping Revolution》《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1866年，伦敦版。

据英国驻上海领事密迪乐（Henry Meadows）写给英国外交大臣拉塞尔勋爵的信，日期为1861年2月19日。引自呤利同书462页。

由于太平军坚持北伐攻打北京而失败的战略错误，和同时配合北方、南方的其他起义；使封建政府在军事上得到喘息之机。他们乘机招募了大批有土地的汉族士绅。本来这些人对清政府的土地国有化不满，现在明白了，要想保留住自己的地租，必须也保留住清政府。最后几年，连外国干涉的矛头，都指向了太平军。

英国和美国政府对待太平军的政策，是背信弃义的典型。就像花豹改不了它身上的斑纹，这些政策的发展趋势，也有它自己的思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在欧洲和亚洲，他们曾目睹资产阶级外国政府对付抵抗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那一套手段。像半殖民主义那样，试图把这场运动最终归附到大国羽翼之下，这是帝国主义不可改变的特性，包括 60 年代形成了最新变种的苏联霸权主义，因此他们对于倡导民族独立者始终保持高度警惕性。

太平天国革命在早期，曾经颇受西方传媒的赞赏，甚至在统治者圈里。他们也把它看作基督徒和腐败黑暗的清廷及其官员的对抗力量。在中国内战中他们虚伪地表示中立。交战中的太平天国得到承认，传教士和外交官们陆续访问它的国都。当形势转化时，几个大国自然盼着能把起义拉向他们自己利益的轨道。

一些外交官做起了投机梦，想把太平天国领袖改造成他们自己的工具，帮助他们战胜中国，取得控制权。另一些人只是观望，等着内战耗尽中国的国力，当统一的国家不复存在，分裂状况会给他们控制中国带来无穷的机会。比如，1854 年 7 月的《北美评论》就曾发表一篇描写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的文章：

也许在无意之间，他会教给我们，哪儿该打进个楔子，哪儿该保持水平；用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发现，对于高大孤傲的北京的宫墙，欧洲的影响迄今是那样无力；带着历代王朝痕迹的宫廷仍然保持着魅力，与曾在这里建立政权的英雄群体相比较，欧洲的影响是那样渺小。

然而太平天国的办事毕竟不是一成不变。他们显示出以中国事务视为己任的态度，拒绝了外国人提出的与清政府停火的“调解”方案，并且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即在他们的地区真正禁绝鸦片贸易。更有甚者，韦昌辉政变之后暴露了太平天国的内部矛盾，几个大国不再认为清廷已经不可救药。它虽然有弱点、腐化，总可以利用它：的确，它越是有缺点、越腐化，就越好，因为这正好把他们控制得更牢一些。

1853 年初，当太平军第一次打近上海，朝廷官员纷纷逃离时，英国、美国和法国领事们乘机控制了那里的中国海关。因为打内战，清朝在其他港口也已停止向外国人征收关税。这一让步使已经享受 5% 优惠的西方大国，跻身于充当中国的守门人，把政府税收的这一主要来源掌握在自己手中。这其

间太平天国确实尽到了保卫的责任，他们并不如此看轻自己国家的主权，就在他们执政的短暂期间，明确地取消了外国人的这一特权。

1856年，外国又采取办法，把清政府变成非常顺从的工具，吓唬它不但让步，还得乖乖听话。目的是扩大外国人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条约得到的收获，因为规定条约12年可以修订一次。这次的借口是中国当局捉拿海盗时，扣押一条挂英国国旗的快艇，捉去艇上水手，因而英国，后来加上法国，向中国宣战。

第二次鸦片战争就是这样发动的。但这次战争在进行中遭到一个严重的障碍，即原来打算调用英国的印度军队，来大打一场，但不巧1857年下半年印度军队爆发民族起义，这就推迟了对中国的战争。这是现代亚洲人民反殖民战争中相互支援的一个最早的范例。

等到“印度兵变”被镇压下去后，英国又能够往中国派遣大量军队，靠着刚结束的欧洲克里米亚战争期间积聚的武器，由海军运来。他们不但能够对中国，还对阿富汗、波斯开战。这是亚洲一个民族被西方战败后伤及其他国家的好例子。

1857—1858年，广州遭到炮击。英法联军还在天津登陆，距离北京只有80英里。

清政府又一次妥协。它在1858年的《天津条约》中承认：

支付巨额战争赔款；

外国人在北京有居住权；

鸦片贸易和教会活动都合法化；

开放几个归外国人管辖的新口岸；以及外国人永久的控制关税和税率。

清政府还答应协助中国劳工出口，使臭名昭著的“苦力贸易”得到合法化。1858年与英国签订条约的第五条有这样一段：

.....中国皇帝将通过颁布法令，命令各省长官宣布，被选赴英国殖民地、或其它

外洋地方服务之中国人，拥有与英国国民就此目的签订合同之完全自由.....

所谓“完全自由”，实际上只是对奴隶贩子而言，他们的劫掠行为得到了合法地位，人民可不想要这种“自由”。所以，条款刚生效的第二年，广州的英国领事阿尔科克就报告了苦力贸易中常遭杀害事件。他说，“苦力贸易没法子安全，也办不下去”。这是因为：

.....没有一个人愿意离开自己房子，哪怕在光天白日的通衢大道上总有人被用各种借口，抓走卖给苦力贩子，装船渡海，从此再无音讯。所有广州市民和邻近地区百姓都感到人人自危。然而，帝国主义者的补救办法，并

英国驻印度军队统帅查理斯·内皮尔在印度民族起义前不久写的下面这段话，透露出这种哲学：“我要是印度之王！我要让莫斯科和巴黎颤抖.....我要是英格兰之王，我要从德里王宫，伸出一只攥紧的拳头.....英国舰队都呆在西方，而印度军队都是在东方。”引自R.帕尔梅·杜特1949年在孟买出版的《今日印度》。

麦克纳尔（McNair, H.F.）：《现代中国历史选读》，1927，上海出版，409—411页。

不打算停止这桩贸易，只是试图缓和公众的情绪。一家“移民所”开张了，另一英国官员哈里·帕克斯曾撰文论及此事，并在他觉得最重要的地方划了线：得到更大利润。

我希望这种制度会证明它比做人口偷盗的生意要便宜得多。那些出于道德目的不愿这么干的外国人，出于经济眼光也得干的。

美国除去要求 1858 年条约中赋予英国的所有权利之外，还谈判了一些特殊的附加条款。这些条款措词巧妙，即承认将“苦力”运往海外是基于“一个人与生俱来，不可剥夺的改变居所和效忠哪个国家的权利！”

到了 1860 年，一支工人占九成的契约奴工在美国太平洋沿岸各州修建铁路。后来他们不堪忍受歧视，迫害和私刑拷打被迫到那些边远的洗衣房和饭馆谋生，至今他们还在经营这些行当。当西部开发告一段落，不再需要华工去从事最繁重的体力劳动时，所有的中国移民在 1882 年被这个国家排斥。这就是“一个人与生俱来和不可剥夺的改变居所的权利。”至于改变“效忠”，就在那一年，即使那些已经定居美国的华人，也得不到入籍资格（事实上 1849 年他们刚到加利福尼亚州时，就没有人得到入籍）。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并未参战的沙皇俄国，还有不曾参战但参与了对华军事行动的美国，也根据所谓“最惠国待遇”，从中国攫取各项特权。他们的公使，加上停靠北中国海岸的英法舰队，共同向中国施加压力，要它接受侵略者的条件。实际上，在 1858 年中国被迫签订的四个天津条约中，那些打着“中立国”旗号的国家，比在这场战争中的敌国还占了先。与俄国的条约签订于 6 月 13 日，与美国签订于 6 月 18 日，与英国和法国分别签订于 6 月 26 和 27 日。此外，沙皇俄国以军事行动威胁，从与中国签订的《璦琿条约》（1858 年 5 月 28 日）中大得便宜。在这个条约中，俄国攫取了东西伯利亚黑龙江以北的中国版图。这是一件最大的战利品，这片含有各种丰富资源的领土总面积达到 60 万平方公里。正如恩格斯在当时描写的，它是“一块大小等于法德两国面积的领土”，还包括“一条同多瑙河一样长的河流”。

1860 年，因为中国朝廷惧怕激怒民众，拖延了对几个条约的批准，英国和法国重开战端。清廷尽管拥有雄厚兵力，它扼守进京海路的大沽炮台，仍然被攻占后夷为平地。英法军队直捣首都北京，劫掠和毁灭了世界最大的艺术宝库之一的圆明园，还对老百姓犯下种种暴行。当时英国部队一名尉官查理斯·乔治·戈登在家信中，谈到了他亲身参与的这起掠夺和破坏行为：

我们出动，在劫掠之后，烧毁了整座宫殿……离开这儿之前，我们以每件 48 磅的
拍卖价到手一批珍品。尽管我的收获不算很多，也干得不错了。……你几乎想象不出我

出处同上。

许多美国作家都试图证明中国劳动力到美国来非常“自由”而并非“苦力贸易”。事实并非如此。德涅特在《美国人在东亚》一书中，用另外的事例提出不同看法。他冷冰冰地说，人们“不会得出他们是自由人这样的结论。”

们烧掉的这座宫殿有多美丽壮观……我们的时间太仓促，没法细细搜寻……每个人都大肆抢掠。

著名法国民主主义者、诗人和小说家维克多·雨果愤怒地说：

所有我们教堂里的珍宝加起来都无法与这座神奇壮观的东方博物馆相比……有一天两个强盗闯进圆明园。一个抢劫，另一个放火……一个装满口袋，另一个装满箱子，然后挽着胳膊，大笑着走开。当这件事载入史册时，一个强盗叫法国，另一个叫英国。

在 1861 年写下这段尖刻描述时，雨果还评论道：

可是我要抗议……政府有时也会做强盗，但人民是永远不会做强盗的……我希望有一天，净化解放了的法国，会将这回掠夺的珍品归还中国。

一个多世纪后，这些珍宝仍然躺在西方的博物馆和宅邸里，或者作为投资收藏，或者作为“审美修养”的证明，兜售给“有声望的”超富级拍卖行，而从没有人想到珍宝全是抢到手的。

1860 年在互换 1858 年批准条约的文本时，英国、法国趁机又捞了一把赔款。沙皇俄国虽然并非交战国，也狮子开口，得到了大块土地。沙皇密使伊格那替叶福伯爵事先得到了西方入侵者打算撤离消息，便许诺软弱的清廷说，他能运用外交压力让他们撤退。作为回报，他又从中国手中攫走 40 万平方公里领土，包括沙俄后来的滨海省。它把中国的海参崴，更名为符拉迪沃斯托克（意为“统治东方”）市和要塞。1858 年和 1860 年，沙俄强迫清廷签订的两个条约，取得了上百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土地（它从中国获得土地的总面积，包括各个时期加在西方先行者中得到的，大约有 150 万平方公里）。像其他强国一样，俄罗斯玩弄着威逼虚弱的清政府妥协和支持它反对革命的两手策略。它轮番使用利诱——答应提供大炮用于剿灭太平军；恐吓——与英法一起参战，除非它的领土要求得到满足。

清政府终于把新的不平等条约强咽进肚里，几个大国从条约中得到的财富远比他们放弃的那一点多。他们议定的优惠条件远大于平等条件下发展贸易的纯商业内容，那是在太平天国取胜的情况下也能得到的。封建统治者并非无缘无故地出卖国家。在与英国签订的条约第 10 款中，加进了有保留的让步：允许在太平天国控制地带“恢复和平”后，英国船只在长江航行。与法国的条约中许诺，一旦它从太平军手中收复南京，就对外国人开放。鸦片贸易方面也耍了同样的把戏。条约中将它合法化，这无异于将太平天国因为

德米特里（Demetrius，Boulger）：《戈登生涯》，1896 年，伦敦版，46 页。

引自切斯努（Chesneaux，Jean）“中国的新老法国朋友”，《中国建设》，1958 年，7 月。其中他还提到著名艺术家洪诺利·杜米埃的一件雕刻品，“谴责这种野蛮行为……法国远征军和一场强迫一个民族吸食毒品（鸦片—作者注）的没完没了战争的丑闻。”

相反，当苏联修正主义领导人在国内宣传扩张，1969 年后更向国外以武力称霸，终于引发一场边界危机时，中国并未要求归还它在 19 世纪与沙俄签订不平等条约中失去的大片领土。它解决边界争端所遵循的是中国政府 1969 年 10 月 7 日宣布的原则，包括以下几点：

禁绝鸦片而置于“国际违法者”的地位。

由于这些因素，外国政府的调门和压力变得强硬起来。太平天国不再被称赞为改革者和“信奉同一宗教的人”，而被斥为“无政府主义者”和胆敢信奉自己是上帝的“渎神者”。种种暴行劣迹流传开来，义务提供消息的是清政府官员或直接由那些外国作者捏造。北京的帝王政府，昨天还是反动的、不可救药的异教徒，现在成了保证安定的力量，贸易和法律的守护者。

1861—1862年，英法军队参加了对上海太平军的剿灭行动。此外，一支国际海盗联队，包括一些中国人，集合在刚参加过威廉·沃克对尼加拉瓜的海盗式入侵的美国冒险家华尔麾下，在清廷旗帜下作战。华尔被打死了，太平军为拉丁美洲人民雪了耻。他的职务由英国少校（后来成了少将）戈登接替。这是一位最标准的帝国主义分子，我们在圆明园的劫掠者中已经见过此人。多年后他在与保卫家乡的苏丹爱国者作战中被击毙。苏丹人为自己、也为中国人民报了仇。除戈登外，还有一批英国陆海军军官当了清廷的参谋。最新式英国武器恩菲尔德步枪，从未在欧洲使用过，被大批用于装备这支部队。此前从未在战争中使用的装甲蒸汽炮艇，也开进长江游弋。

所有这些意味着什么？1862年6月10日英国刊物《越洋贸易报告》是这样描述的：

自从卜罗德海军上将被害后，法国军队的行为有如魔鬼，随意杀死男人、妇女和儿童。他们坦白说英国水手在对付类似反叛的野蛮人时，也干过同样的罪行——不仅杀太平军，也杀那些无辜而又无助的老百姓。这是一种很罕见的情形，然而却是事实，太平军对他们俘获的任何一个欧洲人，却从没有过报复行为。⁸²

卖国贼总是干一些肮脏勾当。太平天国南京失陷后，香港《中国邮报》1862年5月22日报道：

主要杀人犯和虐待犯之一……是英国领事的侍从，一个叫阿福克的小子。……他身着绸缎，骑一匹矮种马，带着随从招摇过市，叫他们去杀死那些不幸的人，还向英国士兵发命令，命令当然被忠实执行。⁸³

当然西方也有好人。欧洲对于这些帝国主义干涉者发出一片抗议声。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作了无情的揭露和谴责。英国工人阶级和民主团体在伦敦的特拉法尔加广场示威反对。当时在华的俄罗斯人和其他来访者，也都谴责上述暴行。有些外国人还与太平军并肩作战。尽管其中有些人像美国的白齐文是冒险家，在清廷与太平军之间来回投机，另一些人则是受正直感情的驱使，自始至终不改初衷。他们之中就有呤利，他写下了有价值而激动人心的起义史实，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另外一些英国人，几名前法国军官和一名

⁸² 是非，明确今天的边界现状是沙皇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造成的。（这正好揭穿了前苏联政府和前苏联舆论在霸权主义时代对沙皇扩张主义的美化。）

⁸³ ，以这些条约为基础，通过和平谈判方式全面解决边界问题……中国不要求归还通过这些条约被吞并的中国领土。

意大利人，莫雷诺，被呤利称作无私的人，令人敬重。当时他们在上海秘密为太平军做情报工作。这几个人不像那些为封建统治者效力的外国人，他们是无偿的志愿工作者。

特别要提到的是志愿者中的几个印度人。1857年伟大的民族起义被镇压后，[^]英国把孟买的第五步兵团、旁遮普的第22步兵团和其他由英人统领的印度军团派到与太平天国作战的前线。但几乎是立刻，这些军团的普通士兵就开始倒向革命一边。清廷统帅李鸿章写道，“五六十名深肤色的外国人”1863年2月在浙江省站在农民军方面，与清军交战。同年5月，据一名英国观察员说，3名前孟买第五步兵团士兵被发现夹在太平军中，在距上海不远的太仓战役中战死。呤利也写到太平军中的印度人。所以，甚至在一百年前，“让亚洲人打亚洲人”的政策，就已经唤醒亚洲人另一种认识——为了共同利益，必须协作，打击外国侵略者。[≠]

在这个时期太平军出现一位杰出将领李秀成，他为挽救革命作了极大努力，在天国破灭，被俘处死前几天，他写了自述，成为总结太平天国革命的珍贵史料。

斗争的最后阶段极其残忍。朝廷和外国干涉者的军队使大片国土遭到蹂躏。太平军英勇作战，但同时运动内在的局限性反映到了领导集团政治和战略的失误上。在外国人的庇护下，孤注一掷的封建军队推出了他们一方新的代表，包括曾国藩、李鸿章和左宗棠，可这一批“强人”只能对付百姓，跟外国压迫者打交道还是不行。他们政治上最后一位后裔就是蒋介石。意味深长的是，这些卖国贼成了外国历史学家的亲密朋友。正如一位中国历史学家评论时，引用中国古代哲学家孟子（前372—289）的一段话：“尽管子孙想夸耀祖先，但恶名会跟着这个家。”

太平天国革命这场农民战争是整个19世纪武装斗争中被残酷扼杀、又有大批人民被杀害的最悲惨的一次。其牺牲之重，死难之惨，远远超过了拿破仑，克里米亚，美国内战，和佛朗哥—普鲁士战争。尽管它最终被彻底镇压下去，却告诉人们，封建王朝已不再能够凭自己的力量来控制中国人民。

在反动派一边，中国统治阶级不惜一切换取外援，成了外国侵略者的小伙伴。（这种令人憎恶的结合统治中国直到1949年，还作为时代错误保留在台湾）。直至1970年，中国才得昂首阔步走进联合国大厅，驱逐国民党留下的代表中国的席位。在人民这边，伟大的太平天国斗争给予中国封建主义的打击，使它再也无法复原。从那以后它就只能等着它的掘墓人了。而帝国主义者，自太平天国革命后，对于直接面对中国民众的起义非常谨慎，一再不轻易对中国反动官员和军队这个靠不住的力量提供支持。

[^] 新的、平等的边界条约。

[≠] 议的地区（苏联在所有条约划定之外侵占的），在谈判解决之前维持现状，停止武力冲突并使双方军队脱离接触。

一个光荣的传统延续下来。太平天国留下的故事鼓舞了 1866 年太平天国失败一年后出生的孙中山，他深深相信人民具有推翻国内、国外压迫者的力量。

30 年代，中国红军的领袖们在太平军走过的地方战斗，吸取了他们的许多经验。40 年代，太平天国的口号“有饭同食，有衣同穿”，在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得到发扬，在为着同一目的开展的大生产运动中，军队、百姓和地方政府一齐参加，以“一手拿镐，一手拿枪”的精神，克服国民党封锁造成的困难，依靠自己力量取得了胜利。新中国的自力更生政策，说到头来皆源于这一先例。

今天对太平天国英雄精神的纪念，已经超越了国界，它成为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反帝斗争共同传统的一部分。它必将作为争取民族和社会解放的世界伟大战争之一，铭记在各地人的心坎里。

第四章

“西化”失灵 (1865—1895年)

从1865年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到1911年推翻清封建王朝这段时期，出现了三个特点。一是清廷在国内的统治暂时稳定下来。二是外国对华包围日益收紧，达到瓜分中国的边缘。三是中国社会出现新的阶级，即资本家和产业工人。

也就在这段时期，外国剥削中国的方式有了改变。在鸦片战争之前，剥削的主要手段是商业资本。到世纪末，它已由金融资本来打头阵。

在这种新形势下，中国人民反封建、反帝国主义控制也转入一系列前所未有的阶段和形式。通过这些，人民学到了很多对他们未来18年间很有用处的东西。

在扑灭太平天国革命后，清廷已经有了相当现代的军事力量。从这场危机中成长起来的新型地主阶级官员，他们统率的部队装备上了西方的枪炮。有了这种部队，许多反清的起义被镇压平息。这样的过程长达几十年之久。

让我们考察一下这些起义的特点。

从1853年开始的捻军起义，曾经横扫华北的河北、山东、河南三省，还波及华中、西部的一些省，时间长达15年之久。捻军是主张人人平等的农民军，它扶助贫苦，打击朝廷官员和富豪，因而得到人民的热情支持。它早期斗争与太平军协同打过仗，晚期活动也有太平军余部参加。在军事上，它采用游击战术，行动迅速，打伏击，佯装败仗，立刻又发动突然反攻，骑兵来往飘忽。另一方面，其弱点是，没有建立根据地和政府职能机构。在兴盛时期，捻军战士有10多万人，1865年在一次骑兵遭遇战中，曾经包围、消灭了清朝的高级指挥官僧格林沁亲王。清廷感到首都北京也受到威胁，便投入大量军力，又一次在英法军队援助下，在卖国贼李鸿章指挥下，于1868年将捻军剿平。

1872年，贵州省苗民起义历时18年，曾经得到太平军余部的支援，最后被清军镇压下去。

1873年，左宗棠消灭了一起西北（在陕西、甘肃两省）回民起义，起义军也得到捻军协同作战。同年，中国西南部云南省也平定了一起回民起义，起义也是在清廷忙于和太平军作战时发动的。

这一大批几乎席卷全国的起义浪潮，表明中国各族人民再也不能忍受封建社会的压迫剥削，何况再加上帝国主义的入侵。这些起义还表明，少数民族经常起义虽然是昙花一现，起不到什么决定性作用，但它说明了少数民族对统治官吏的不平等对待，恨之入骨。不过他们斗争对象并非是针对汉族劳

动人民。事实上，这些起义虽然有些打上本民族的旗号，但归根到底，主要还是农民运动。而且，由于这些少数民族的武装农民都能协同作战，清朝的贵族和汉族的地主官员统领的封建部队，如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到蒙古族贵族僧格林沁，也都能携起手来。统治中国的王朝，不管是汉族或其他民族，总惯于在各民族之间制造分裂，根据早已有之的“分而治之”策略，拉拢一批疏远一批。中国各民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上述分裂手段的影响，但总的说来，他们在对付共同压迫者上，是能够采取共同立场的。因此，基于许多世纪以来在古老经济上、文化上的互相交融，中国的统一能够找到共同之点，这是一个客观事实。没有哪个民族，不论民族大小，能够不依靠别民族的帮助，单靠本民族力量解决自己的问题。在帝国主义插手进来之后，上述真理更加显得真实正确。

垂死的官僚行政体系为了压制中国人民反抗，进行了难以置信的血腥屠杀。各民族无数农民遭到屠杀。单在贵州一个省，起义苗民牺牲了100万人。在太平天国革命战争中，西北西南好几个省变成半沙漠地区。华中人口也大量减少。

中国被压迫的贫苦人民，受到封建主继续统治与外国侵略者的凌辱，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清廷不久以前还拒绝外国使节进入中国京城，1867年却派遣美国人蒲安臣率领一个外交使团，出访欧美国家，疏通关系。

外国的远征军和政治代理人，也开始在中国沿海和边境地区进行活动。

英国人通过缅甸，想把云南的回民起义操纵在手，它允诺把起义头子的儿子，送到英国。

1868~1879年，英国拉拢土耳其，想搞一个泛伊斯兰运动，（土耳其的奥托曼王朝曾自封为伊斯兰世界的宗教领袖），曾经支持新疆南部喀什的贵族阿古柏（其实他原是塔吉克人）。英国人要他把喀什从中国分离出来，成为一个与印度帝国之间的缓冲国。福赛斯原是英国印度总督的官员，他千方百计把阿古柏武装起来，向外活动，并于1874年与之签订条约。英国侵占领土的计划分两个阶段进行。首先强迫阿古柏割让一部分靠近喀什地区的领土。同时，又向清廷正式提出建议，在中国与喀什之间勘定边界。当阿古柏的政权摇摇欲坠的时候，英国驻北京公使威妥玛又提出建议说，只要中国让阿古柏在中国拥有宗主权的条件下，能保持他的汗国，阿古柏就会投降。可想而知，这实质上是把新疆一分为二，南疆归属英国，北疆分与沙俄。

虽然上述这些阴谋后来都未得逞，但英国总算同喀什的武装集团建立和保持了一个总领事馆，此后若干年内，从这个总领事馆制造了不少麻烦事端。随之而来的还有1889年荣赫鹏领导的边境渗透，他于1904年进兵西藏，从而使英国人得到控制邻近的，有战略价值的山地小邦吉尔吉特和洪扎

引自岭利同书，519—520页。

引自岭利同书，519—520页。

地区，（均在克什米尔境内）。为荣赫鹏写传记的人，在书里坦白写道，荣赫鹏早期情报活动的目标，是从北方开发通过喜马拉雅山的通道（即不是从印度，而是从中国境内去的通道）。荣赫鹏后来也说过，他为英国干的这些开发边疆工作立足点在于：

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开发边疆的人要像老鹰那样机警，抓住机遇。抓不住机遇，等于将政府多年的经营付之东流。

荣赫鹏说，他这种手法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利用一切机会掠夺中国土地。另一方面是，抓不到手，也不要紧，可耐心等待，先弄到块地方，主权虽未到手，至少先把中国对该地的宗主权加以淡化，把它变成两国间缓冲地带，最终归入外国的殖民统治。上述手法在对待西藏交涉上，表露得最为明显。不但对西藏，后来在新疆交涉上，英国都用此手法，自由进入该地区，而这些地区连腐朽的清廷也从未放弃过主权。

沙俄也照搬英国这套阴谋手法，当英国打进南疆后，沙俄在北疆采取并吞行动，派部队开进伊犁地区。1881年，它把部队撤走，却在那年的《圣彼得堡条约》中，清政府把大片土地割让与俄国。

值得注意的是，在沙俄和英国两个帝国主义之间，在那个时代，每一方都把从中国掠夺土地，说成是对对方的防御行为，有时甚至说成是对付中国的包围。这种论调在当时英国历史学界随处可以找到。而且，这类论调在前苏联后期的史学界，还有复活之势。他们只不过是將沙俄时代的扩张主义政策，加以乔装打扮而已。不同之点只是，早先沙俄史学界论调，曾经依据实情，直言不讳。事实上，不管沙俄或英国，这些帝国主义者在当时并没有干什么“防务”。两个国家都不折不扣在搞掠夺。丝毫没有关心过中国的领土完整，全都在忙于进行秘密的和公开的，私下的公众的争论，签订条约，人人都想向中国插上一刀，加以重新分割。不管是在少数民族聚居的边疆地区，也不管是在汉人为主的内陆，都想不战而掠夺到手。

与此同时，帝国主义侵略者在邻近中国海防地区也加快了侵略步调。1867年和1871年，美国开始武装侵入中国东北的朝鲜（在第二次海军炮击中使350名朝鲜人丧生）。1871年，鉴于日本派遣使团到中国，似乎要与中國结盟，美国便怂恿日本干脆吞并中国的琉球群岛，这地方位于中国和日本之间，美国海军早就对之垂涎欲滴。为了使中国日本两国关系恶化，美国驻东京大使馆促使日本进攻中国的台湾岛，而美国早在1850年和1867年曾经两次在该岛登陆。美国的运输工具被日本租用，把日本部队运到台湾，还派遣一位熟悉台湾岛情况的美国官员李仙得充任向导。1874年日军在台湾登陆，后来又撤回回国，到1894年才正式占领。

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大大缩短了从欧洲到中国之间的距离，从而使西方海军舰只和商船到远东的航程，大大缩短，也更加安全而且运费低廉（原来要绕道南部非洲）。这样一来，运河不但为帝国主义带来巨额利润，还使帝国主义从经济、军事上侵略中国的压力大为加强。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当

1956年埃及从殖民者手中把这条重要水道坚决收归国有时，中国全心全意支持埃及的果敢行动。因为从历史公正性看来，埃及收回运河之权，可确保国家安全，还和整个亚洲未来的命运密不可分。

19世纪中下叶，中国近邻的两个国家，即缅甸与越南，分别遭到英国与法国的武装入侵。中国西南边疆的这两个国家从此沦为殖民地，使中国也受到威胁和渗透。

鉴于工业，特别是军事工业，成为西方国家武装实力强大的“秘密”，中国封建官员中出现了主张“西化”（中国称为洋务运动）的集团，他们主张中国兴办工业，增强国家实力。他们受到日本维新带来国家富强，却并没有动摇皇室体制，也未动摇社会结构的鼓舞。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前，早在19世纪，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就兴办了一些兵工厂、码头、煤矿、航运和纺织工厂，当然都是由政府机关经营管理的。

然而，中国机器生产的出台，后来证明，它对中国经济发展和国防实力，并没有产生重大影响。早期开办的工业企业后来不是倒闭，破产，就是转到外国人手里经营。1860年以后，日本的大商家和封建力量结成联盟，从而使封建农业得到大发展，在这基础上带来工业迅速增长。中国的情况却与之形成反差，办洋务的维新派，把私营资本加以排开，一切由国家垄断经营。

中国为什么不像日本维新那样成功，另一个原因是，它的对外关系与日本有不同之处。我们可以看出，日本首先得到美国照顾，英国也开始把日本作为在远东与沙俄抗衡的有用伙伴，尽力拉拢日本。而中国则不同，它虽然领土辽阔，却非常衰弱，没有资格充当大国的盟友，只能成为一个被人宰割掠夺的对象。因此，在列强心目中，这个国家无足轻重，早晚要被人支解。

这样，当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垄断资本阶段以后，中国的国内、国际形势，就与日本大相径庭，中国不可能走“日本模式”的现代化。作为现代化的先决条件，首先它必须通过一场人民革命，粉碎外国控制与国内封建势力套在它头上的枷锁。

1868年左宗棠在福州创办的马尾海军造船厂的故事是具有教育意义的。这家有名的国防大企业所有工程师、大多数工头和熟练工人，都从法国聘来，左宗棠是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战斗中得到法军协助而同法国拉上关系的。造船厂付给法国人的高额报酬，不像是工资，而是丰厚的贡品。法国技工比同工种中国工人工资，要高10倍。法国工头工资也要高5倍。以总工程师日意格（Prosper Giquel）为例，他是在镇压太平军战斗中因组织用机动炮艇有功，而被雇用。他的薪水赛过王侯，每年达到96000金法郎，外加津贴。这还不算付给那些名义上管理工厂的中国封建官员，他们也从这个厂无情地捞走大笔开支。

不但机器要靠进口，连造船的原料铁、煤、甚至木材，也依赖进口，其原因是，造船厂跟国内相关的附属企业或现代运输业，毫无关系，而一切原材料本来都可从那里得到的。再说，造船厂经费来自关税收入和各省赋税。

而各省赋税都掌握在地方官之手，这些人的兴致与左宗棠的想法并不相同。其结果是，厂子虽然雇有 3000 员工，也的确造出了几艘高质量船只，显示了中国工人能掌握新技术的才能，但只维持了 5 年，生产就陷于停顿。

最后，造船厂在中法战争中被法国海军严重击毁，它建造的 11 艘炮艇也完全报销，法国舰队当然知道，炮火如何才能击中对方要害。为了报复第一次中法战争中中国志愿部队“黑旗军”援助越南人民打击法国殖民者，法国向中国开战。结果在没有事先正式宣战条件下，发动突然袭击，福州一位英国居民描写战争的惨烈情况说：

一切都在没有宣战之下猛烈攻击，中国方面有 3 千多人被打死，尸体随海潮冲进大海，退潮时又被冲回来。接连好些日子，人们在锚地与海面 20 英里的江面上几乎无法通过，因为随处都能找到这些可怕的尸体，使你想起这场既残酷又奸诈的战争。

1886 年，在经过一段战争后，清廷完全屈服，接受法国对越南提出的一切要求。其中压力最大的是美国驻北京公使杨约翰。美国历史学家德涅特曾经这样写道：“他曾经试图说明，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中国是对还是错，而在于中国再也没有能力和外国打下去。不惜用多大代价与法国媾和，都比打下去的好。”而美国多少年以来，在谈判中就一向把关心中国主权与尊严，跟压迫中国向侵略者屈膝投降当作一回事。

在中法战争危机中，日本利用中国处在危急关头，强迫中国同意，在未经事先知道对方情况下，双方都不得派遣部队进入朝鲜。这项条款表明，中国放弃了自古以来享有的，给邻国朝鲜军事援助的权利，而日本向来是朝鲜的敌国，却取得了派兵去该国的权利。

1890 年，英国强迫喜马拉雅山的尼泊尔王国，中断和中国长期维持下来的密切关系，把该国降为自己的保护国。同年，英国又强迫中国承认英国对另一个喜马拉雅山小国锡金“享有直接而独占的、对其内部行政与外交关系的控制权，”而且还特别规定：

除了经过英国政府许可外，该国统治者，或其他任何官员，都不能与任何其他国家，建立任何形式的官方与非官方关系。

上述两项行动都表明，英国以印度为基地，进一步侵略邻近各国。第一

1857 年的印度民族起义爆发于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值得进一步研究，毫无疑问，其联系是非常密切的。当时驻印英军指挥官亨利·哈夫洛克将军在写给孟加拉总督洛德·坎宁的信中，探寻印度军队中不满情绪的原因，认为并非像通常谈的由于“使用动物油子弹”违背了印度和穆斯林的食品法（事实上，这是早些时候一直使用的），而是由于号召大家去打中国的总征募令。孟买军团的印度士兵决心抵制这种服役；它的第 47 团早些时候就曾在同样情形下因拒绝乘船赴缅甸而遭射杀。

这些事实大多引自《一个世纪前中国和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一文，载于 1957 年 5 月《人民日报》，为印度民族起义 100 周年而作。太仓战斗的报道根据安德鲁·威尔逊的《战无不胜的军队》1868 年，爱丁堡版。

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亚洲的中枢：新疆与中国亚洲内陆边界与沙俄》1950 年，波士顿版。

步将迄今为止的独立实体，变成它附属的“保护国”，第二步将“保护国”降为事实上的殖民地，作为从中国边缘的国家向中国渗透的跳板。

中法战争之后，中国又重新向西方购买战舰和军需物资，还派遣一批学生到外国学习西方技术。另外一位主张“现代化”官员张之洞总督在长江中部地区创办了汉冶萍钢铁厂。还办了一批棉纺厂。作为官办企业，又办了铁路、电报局，但是，所有这些有限的发展计划效果如何呢？不久便在 1894—1895 年第一次中日甲午战争中显示出来。甲午战争是中国遭受到的最惨重败仗，这次败仗不是败于西方工业发达国家之手，而是败于邻近一个小国之手，而日本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十多年之后，才开始同西方接触的。

甲午战争起因于朝鲜问题。当时朝鲜爆发一起大规模的反封建农民起义，即东学党叛乱。它像太平军那样，打着宗教旗号。朝鲜国王邀请清廷派兵，帮助它平息叛乱。日本援引 1885 年的中日《天津条约》，趁此机会派兵进入朝鲜南部。不久，中国军队屯驻平壤，日军驻在汉城，双方沿 38 度线遥遥相望。1894 年 2 月 25 日，日本走法国的路子，即不经宣战，进攻黄海的中国舰队。两个月之后，日本在平壤打败清军主力，将清军赶回到鸭绿江边。接着，日本把战争扩展到中国本土，迅速攻占旅顺，威海卫两个海军基地。这两个基地是中国花费大量财力才建成的。1895 年，中国开始求和。

根据 1895 年 4 月签订的《马关条约》，清朝将台湾、澎湖列岛割让与日本。但台湾人民不承认此条约，进行保台斗争，最后被镇压下去。中国承认朝鲜自主独立，实际上是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中国开辟重庆、沙市、苏州、杭州等七个新口岸，与日本臣民通商。赔偿日本军费 2 万万两。最后，日本（以及其他外国后来也按“最惠国”条款）有权在中国领土内开设工厂。

条约还包括将旅顺、大连割让与日本。不过这项条款后来由于沙俄、德国、法国联合干涉，加上海军示威，日本不得不取消，从而又勒索了一笔赔款。至于三国之所以干涉，也是出于各自掠夺中国领土的野心，下章里我们还要逐一说明。

在这场掠夺战争中，日本得到英国心照不宣的支持，是英国帮它建立起舰队。日本还得到美国的支持。可耻的《马关条约》，从一开始便得到一位美国前国务卿的支持，这位先生后来被清廷聘为政府顾问，当时成为施加美国影响的渠道。这位先生叫福斯特（John W. Foster），是后来美国务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的祖父。

第五章

瓜分威胁

(1895—1898年)

侵略国家第一次取得在中国开办工厂的权利后，表明世界资本主义又出现一个新的特色，即从向一个国家输出资本，取代原来只向这个国出口商品。在欧洲、美洲、日本的大工业——金融垄断资本成熟以后，就开始把整个世界切割成一片片可供投资剥削的殖民范围。随后几年内，中国深深感受到帝国主义的强大压力，面对着即将来临的瓜分威胁，中国将不再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外国向中国投放资本的规模，已越来越大，从开设工厂转到投入银行贷款。在1895年之前，中国欠外国银行债款是微不足道的。但在其后5年间，政府借外国银行款额高达5千万英镑，用于偿付对日本的赔款。这笔借款由俄国法国财团、和英国德国财团分别提供，用中国关税和内部航运税作为担保。这意味着，中国关税（早已由外国管理）的大部分收入，已完全不归中国政府所有。而且，后来还有大批借款，而外国贷款银行又一再扣押（其中俄法贷款直到1931年才还清，英德贷款到1943年才还清）。为了弥补这项损失，清朝统治者自然要增加地方税收，所以整个负担便直接落在人民身上。

除了筹集用于赔偿日本的贷款外，外交使团又开始强迫中国接受贷款来修建铁路。贷款用于向贷款国家购买修路材料与车辆，规定从铁路资产和运营收入作为还款的抵押。所以，1898年英国修建华北铁路的贷款，抵押到1944年。沙俄的办法更为巧妙，它本国并没有用于投资的资本，便另出高招。即利用从中国取得的可在东北修建一条铁路的特权，直截了当送了100万卢布来贿赂李鸿章，李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大臣。

沙俄是从法国银行借来这笔贷款的，因此，这笔交易变成巴黎提供资金，沙俄提供担保，共同对中国施加政治、军事压力，交易结果让两方都既得利，又安全。

一切帝国主义国家，都从中国败于小小一个日本这件事上受到鼓舞，看来中国软弱可欺已非常明显，于是便开始在中国领土上夺取据点，准备共同瓜分这个国家。

德国用两名传教士被杀作为借口，1897年12月占领了华北大港口和军港青岛。这件事手法相当低劣，一位作家这样写道：

一批德国海军军官上岸拜会中国司令官，提出想在胶州湾举行海军演习，中国官

斯迈思 (Smyth, George B.) 《中国的危机》中的一章：《中国排外情结的原因》，1900年，纽约伦敦版，29页。

员对客人的意图毫不怀疑，就邀请他们上岸，共进午餐。11月14日清晨，德国巡洋舰上的6万名水兵登陆后，占领了所有战略要地，接着主力部队也跟上。中国司令官对有机会看到德国武装部队的演习，极为高兴，两国官兵互相问候、致敬。当一切据点都占领以后，才交给中国司令官一份照会，要求青岛驻军在三小时内完全撤出，一切工事、枪炮、军需物资保持完好无损。中国方面完全没有料到德军的抢占行动，处于措手不及状况，不能提出有效的抗争。这样，德国司令官狄特立克斯上将可说是不放一枪，就占领了胶州湾。

抢占得手以后，德国又于1898年3月通过签订条约，从中国勒索到租借山东半岛为期99年的租用权，就是说，租期要到1997年！

德国条约签署以后三个星期，沙俄也从中国强行租借到旅顺海军基地，为期25年，同时还租到大连商业口岸，这是沙俄当年不许中国割让与日本的。说起来，沙俄的办法也并非偶然，当年它不让日本得到这片土地，正是为将来弄到自己手中。记得1897年夏天，德皇威廉二世与沙皇尼古拉二世曾经在圣彼得堡保会晤，这两个帝国主义在欧洲原本是敌对国，但现在沙俄在掠得中国的旅顺大连后，却同意德国强占胶州湾。威廉皇帝的打算是，在向中国掠夺殖民地上，必须得到尼古拉的支持，将来又可在日俄战争中把这片土地夺到自己手里。这样一来，就使俄国要想和英法两国共同反对德国在欧洲的打算难以实现。这两位皇帝互相拉拢勾结的细节，在十月革命后公布的《小威、小尼通信录》里，才大白于世。（小威指德皇威廉，小尼指沙皇尼古拉，两人是表亲，所以互相通信都用彼此的小名）

在俄国人下手之后5天，英国也取得海军基地威海卫，说英国要像沙皇占领旅顺港那样，租期相同。

1898年4月10日，法国占领中国南海的广州湾，即今天中国大贸易港口湛江港。

1899年，英国再一次恢复瓜分中国边疆的行动，这一次是在新疆。它用老办法，利用中国的困难时机先压迫中国在边界上稍加限制，即承认帝国主义侵略蚕食得来的果实。这种早已行之有效的扩张手段，早先曾被一位英国高级官员描述过，说此举是为了“防卫”的需要。印度政府的外务秘书莱尔爵士这样写道：

通常我是提出一个划分政治边界的方案，这条界线是，我们实际控制领土，和别的国家行将威胁到我们安全的领土。这样办的结果，往往都会加速我们的扩张，因为我们发现，最后总会推进到我们的敌对国家难以超越的界线。

涅特 (Dennett, A, Tyler) 话见前书 492—493 页。美国坚决主张中国在国外侵略面前保持冷静态度，后来见美国远东事务学者裴斐 (Peffer, Nathaniel) 著《中国现在决不能打仗》(China Must Not Fight Now)。

《中国与英国关于锡金与西藏的条约》1890年3月在加尔各达签订，见赫茨勒特 (Hertslet, G) 《英中与中外条约协定》，1908，伦敦版。

杜勒斯 20 世纪 50 年代任美国国务卿，他不但推行冷战，还对中国革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动辄以原子

为了明目张胆瓜分中国，每个国家都提出它在中国领土上的“势力范围”。长江流域归英国所有。西藏、东北、蒙古划与沙俄。中国东南归英法两国，福建省归日本，山东省归德国。

瓜分中国的浪潮，恰好也和美国历史上一个新阶段连接起来。美国在南北战争以后国内生产迅速发展，它很快超过其他强国。它的大托拉斯开始进入世界市场，参与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1898年，打着“解放”古巴的借口，实际上很快将古巴作为自己的半殖民地。它向西班牙开战，结果夺取了太平洋上的菲律宾和关岛。与此同时，美国传教士和种植园主开发夏威夷，最后划归美国。

美帝国主义虽然年轻，它吞并的胃口却越来越大。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原来是个海军上尉，晚年成了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驻日占领军司令，美侵朝战争后任联合国军司令，侵朝战争失败既表明美帝国主义称霸亚洲美梦的破产，也是麦克阿瑟戎马生涯的终结。

麦克阿瑟还参与镇压过菲律宾争取自由的斗争，当时菲律宾想同美国联合，赶走西班牙人，没想到赶走了西班牙，却换来个新的殖民主子。当时美国的政客倒坦白得多，敢于对美国在太平洋企图无限制扩张的阴谋，说了实话。不像后来的政客，偏要把美国磨刀霍霍称霸全球的野心，遮遮掩掩，难于出口。下面是1900年1月美印第安纳州参议案贝弗里奇的一段表白：

菲律宾永远属于我们……菲律宾邻近的中国是个取之无尽的市场。我们不会从这个国家撤走，我们不会背弃我们民族的使命，在上帝信托下，让世界走向文明。谁统治太平洋，谁就能统治世界……这个国家永远是美利坚合众国。

然而，当时美国还不够强大，不能独占中国无穷无尽的市场，因为许多大国早已挤了进来。它也没有把太平洋变成“美国内湖”的力量，最后，既使在打败西班牙以后，美国人民或知名人士都并不赞成对外扩张政策。工人、农民、平民党员和民主党内层都加以公开反对。所以美国的外交准备是逐渐完成的。作为第一步，1899年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提出了著名的对待中国的“门户开放政策”。

美国这份官方声明以此作为捍卫中国主权完整的政策，实际上却并不是那么一回事。相反，倒是它的反面。“门户开放”声明是向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发出的，声明中一点未说到各国瓜分中国的既成事实。只是要每个“势力范围”或租界里的商业，都该让一切国家共同享有。

一位美国作家拉铁摩尔，曾经风趣地称这个政策为“我也有一份”政策。美国的如意算盘是，凭借美元的强大力量，它的贸易投资可以在中国畅行无

弹讹诈。就是他的祖父，当年极力“说服”清朝官员，签订割让台湾的条约。

详见十月革命后公布的沙俄档案，又见《威特回忆录》。是威特任沙俄总理大臣时，经手用重金收买李鸿章和张荫桓。

戈德歇尔（Godshall, W.L.）《在三面旗帜下的青岛》，1929年，上海版。

阻。对一切敌对国家，美国的压力可以在更大程度进入政治经济领域。自然对于中国本身，倒不是打听它愿意“开放”，还是把门关掉。

当然，军事上强大，经济上属第二流国家如沙俄，对海约翰的政策是冷淡的。然而，英国却加以支持，因为当时它依然是世界最强大的金融国家，开放政策可以使它渗透到俄国、法国、德国、日本的势力范围，对自身却毫无不利之处。事实上，这项政策可说是美国英国联合制订的，每个人都想从中捞到好处，还顺便从对方身上也捞到一把。英国美国联合经营，当时又引不起各方冲突，这样，开放政策便受到各方支持，虽然一旦力量强大时，谁都将不理睬它。

这种“和平共处”想法的动机，实际上在于将他们吞并的国家，重新塑造一番。正如英国外交家奇洛尔描绘的那样：

“共存共荣”这条原则只适用于非洲，只有在非洲，帝国主义之间的争夺不致于把欧洲也卷进来。而在远东，这种争夺是否发生或能否避免，这条原则不可能为远东问题找到一条和平解决的方案。

奇洛尔预料的争夺，很快就在远东成为现实。在 1897—1898 年间，现代帝国主义国家，在几个月之间，就对中国的生存构成最大的威胁，其威胁程度之大，超过自 1840 年的鸦片战争，1856—1860 年的英法联军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84 年的中法战争，1894 年的中日战争的总和。而且，从 1897—1898 年以来，对中国的掠夺，都是在不发一枪一弹，完全采用恐吓手段，就可以得手，说明清朝政府的腐败已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

对于上述事态的政治上的反应，说明中国社会已出现了新的变革。

从 19 世纪进到 20 世纪，中国就面临着一个悲惨的处境，即真正有民族灭亡的危险。再想想现在，从 20 世纪进入 21 世纪的今天，我们才能理解到，中国在 20 世纪中叶得到解放的重大意义。今天，中国已不再受到外国的控制，国力强大，足以捍卫本国的自由，在国际上居于显要地位。在国内，它以世界罕见的速度发展国民经济。它也不再害怕外国的贷款投资，虽然付出一点利润，却不危害本国的主权。

在下一章里，我们还要综述 1890 年以来的事，评估它国内政治环境以及中国社会转型带来的影响，从而将来我们可以预见到，将出现更大的变革。

伯恩斯坦 (Bernstein, H.) : 《小威、小尼通信录——凯撒与沙皇秘密电信》 (The Willy-Nicky Correspondence, Being the Secret and Intimate Telegrams Between the Kaiser and the Tsar) 1918 年, 纽约版。又见莱文 (Levine, I.D.) 编《凯撒致沙皇信》1921 年, 纽约版。

第六章

维新破产 (1898年)

如何拯救国家，是最早派到外国留学的青年爱国人士，提出了最果敢的答案。其中最杰出是孙中山先生。他是伟大的、不屈不挠的民主革命家，早在1894年就组建了兴中会。此会纲领是推翻清廷、从而消灭整个封建王朝，建立西方式的，有点像美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在这面旗帜下，1895年首先在广东举行了武装起义，虽然以失败告终。

孙中山代表中国新资产阶级最激进的阶层。后来又在华南、华中各大城市发动更大规模起义。在洋务派官僚办垄断工业的一帮人失败后，1897年在长江流域各省，兴建起30家私营的棉纺厂。

孙中山还代表海外华人中有远见卓识的阶层。从1860年代的太平天国起义以后，向海外移民逐年增多。根据《天津条约》，中国政府允许向各国输送“苦力”，大批破产农民和城市贫民被送到马来亚、夏威夷，美国、加拿大、西印度群岛作工。过了一些年代，其中有些人便成了企业家。他们受到殖民统治和种族歧视，这些海外华人当然盼望中国能早日富强、现代化，使他们能受到中国的庇护，在当地生活。这些生意人也希望国内能有一片投资领域，不受外国竞争的影响。他们对封建王朝和儒家教条毫无兴趣。吸引他们的政治形式是资产阶级共和国。

与此同时，官员学者中也出现一个改良主义的、非革命的运动，他们代表当时新工商业资产阶级中最讲求实利和比较保守的一翼。这些人来自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他们和主张西化的洋务派封建分子在战术上有所不同。那帮人以为单靠引进技术，就能让古老的秩序原封不动。与这帮人不同的是，他们想照日本的老路，把古老的王朝稍加革新，使资产阶级能同封建王朝的人，在有限立宪制度架构内共享权利。可这批人与孙中山集团有根本的不同点，即他们并不想结束清廷的统治秩序。这批学者的代言人是康有为，此人既饱读中国经书，又对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理论知之甚多。

康有为和他的信徒一提起太平天国起义就十分恐惧，他向光绪皇帝上书，主张“温和改革”，也就是为了避免再来一场新的农民革命。在这一点上，它又同孙中山兴中会的观点大为不同，孙中山对太平天国革命是异常尊敬的。如果说，孙中山的共和政府的构想，来自他早年接受的西方教育，那么，他的革命精神，就更多地来自中国的农民起义的传统，特别是太平天国革命，这是他幼年在农村生活时使他魂牵梦萦的一件事。但在实际行动中，孙中山革命党人又很少跟农民群众有过交往。它把革命的希望，主要放在青年知识分子和军官中，组织革命行动。

康有为组织举子公车上书皇帝，提出维新运动性质特征，作为解决民族

危机的一系列措施。这些奏折因为被大臣截留，并未送到皇帝手中，但康把上皇帝书全都印出来，很快成为政治纲领在全国风行。康有为本人也在各地学校、刊物上大肆宣传。最后终于得到光绪皇帝召见，而光绪帝此时正想摆脱代他主持政务的慈禧太后（他的伯母）的控制。帝党看到维新运动风行一时，成为反对慈禧太后死硬派的政治基础。这时又插进来一起外国因素。慈禧的后党倾向于倚靠沙俄，结果是帝党和维新派受到英国、美国、日本的支持。

从 1898 年 6 月 11 日到 1898 年 9 月 11 日的一百天中，皇帝发布了由康有为起草的一系列变法诏书。他下令废除科举考试，开办京师大学堂。还下诏设立农工商总局，他们有权直接向皇帝上书，设立铁路总局，鼓励商办矿务，各省设立学校，引进现代农业机械。其他诏书还有改革司法诉讼程序；精练陆军，撤除无事可办的衙门，裁减绿营，由绅富之有田业者兴办农会、商会。

维新的结果只带来一场反革命政变。古老的封建贵族表明，单凭任何诏书，哪怕是皇帝诏书也是无法强迫他们进行激烈的改革。连光绪皇帝本人也被慈禧太后软禁起来，直到 10 年后他于 1908 年去世。康有为和维新领导人纷纷出逃。来不及脱逃的被逮捕起来，后有 6 个人被野蛮地在菜市口腰斩，刽子手从腰部一刀把人体砍成两半。

百日维新尽管有许多不足之处，但维新党人中的确有些人是富有才气，胆识至诚的人士。他们的活动唤醒了中国大批知识青年，让他们看到绝对专制的腐朽性，让他们认识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为何物。百日维新的惨败，还归因于它对中国人民需要解决的任何基本任务，完全提不出一解决方案。

1898 年的维新派不愿面对中国封建王朝的整个专制体制的真正性质。他们也无视于这个事实，即权力并不体现在任何个人身上，哪怕他是个皇帝，而权力是整个反革命统治阶级的化身。从政治上说，他们是主张折衷妥协的上层资产阶级的代表人。从个人上说，他们大都是地主或官员出身。因此，他们不能提出剥夺封建经济与社会基础权力的纲领。他们更绝对不可能对人民群众中的农民提供任何东西，而只有农民才是扫清中国进步障碍的唯一力量。

维新派对于帝国主义掠夺成性不可避免的本质，也没有什么认识。他们只是对国家战败蒙羞感到气愤，然而他们接受帝国主义者散布的谎言，说因为中国落后，自然不能在对外关系中与他人平起平坐。因此，他们认为，“效法西方”就会使中国受到尊重，不但不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反而会支持他们走维新的道路。

经过这场反革命政变之后，主张君主立宪道路的康有为在国内丧失影响。中国新起的政治洪流中，孙中山的一派开始为天下先。但这个转变短时期内还没有显示出它的战绩。与此同时，中国的农民再一次走上前台，举行直接反对帝国主义的义和团起义。

第七章

义和团人民起义 (1899—1901年)

义和团原是农民反清的、与白莲教有联系的秘密结社，因他们保持设坛练拳活动，被西方称为“拳民”。1898年，山东省已被划为德国势力范围，传教士在全省星罗棋布，他们不但在经济上残酷剥削农民，焚烧对教堂“不友好”的村庄，作为惩罚，从而引发人民对德国传教士的极大愤恨。再说，山东人民跟华北各省人民一样，越来越看清楚了，这些传教士已公开变成他们本国政府征服中国的急先锋，更感到怒不可遏。1899年3月15日，在法国自行设立“保教团”的压力下，清廷下诏，对各国天主教神职人员，授予各种特权。当时一位英国作家写过各项特权的内容：

对主教可以享有与总督、督军同等的地位，与省财政、司法、道台同等的地位。

对修士、修女，可享有与县知事同等的地位。让天主教徒人人如愿得福，在教徒与凡人诉讼中，凡人不能胜诉。从此以后，在有关教徒的官司中，经常是怨声载道。

实际上，虽然只有天主教徒才能享受这种官方授予的地位，但各国的教会人员，都可用来充当本国政府的代理人、观察站。其可贵之处还在于，不单在“条约开放”口岸，还可在全国一切城市内合法通行。如此滥用权利的行为，正在中国被瓜分时期出现，正如欧洲历史学家指出，使1899—1901年这场农民起义，作为反对外国、反对教士的性质，从而使他们把中国基督教徒，作为外国侵略者的帮凶和门徒。不错，义和团没有提出过什么进步的社会纲领，或组织形式。比起半个世纪之前的太平天国起义来，在社会纲领与组织形式上，他们都比不上后者。然而，要把这次运动定性为“反动”，则是赤裸裸的帝国主义诽谤，恰恰相反，它是中国普通人民为保卫民族生存、反对想支解中国的“文明”强盗而掀起的一场英勇的、自发的斗争。许多民主人士都赞扬过它。例如马克·吐温，就热情为“拳民”辩护，而嘲讽那些号召向拳民发动讨伐战争的“文明卫士”。马克·吐温并不是革命家，但他出于强烈的正义感，在美国掀起的反华歇斯底里高潮中，仗义直言，发表《致黑暗中的人》等用词犀利的论文。他对美国在远东扮演的帝国主义角色十分恼怒，竟然宣布说，美国的国旗不能再用星条的老式设计了，他建议把原来代表十三个州的条形中，白条子改为黑色，代表50个州的星，改为头骨和大腿骨。他曾写信给一位朋友说，“现在天天都在说中国的事，我是同情中国人的……我希望他们能把一切外国人赶出去，别让外国人再进

莱尔 (Lyll, Sir Alfred) : 《英属印度自治领的兴起》(The Rise of the British Dominion in India) 1893年, 伦敦版, 278页。

来。”

另外一位当时写反战小说《红色英勇勋章》获得畅销的文艺评论大师克萊恩，也用德国抢占山东作为题材，写了一出讽刺短剧。剧本中写的普鲁士亲王亨利，真正访问过中国，他以德国利用两名传教士遇害为托词，夺得山东，因而号召其他教士都想法被害，让德意志祖国为此发洋财。当其中一位被打得遍体鳞伤却还活着时，亲王无情地责骂他一顿，说他不爱国。因为只有死了的教士才能换来土地，还可为德国夺取经营修建铁路的权利，是划得来的交易。

还有比上述两人写得更为深刻有力的评论是出自列宁之手，他既了解中国起义者的感情又对帝国主义在亚洲的暴行感到愤怒，从而作了生动的分析。论文说：

对！一点不错，中国人民恨欧洲人，但他们恨什么样的欧洲人，为什么恨？中国人并不恨欧洲老百姓，跟他们毫无芥蒂。他们恨的是欧洲资本家，以及为资本家服务和政府。这种人来到中国，纯粹是为了捞一把。他们吹嘘为文明，只不过用来欺骗、掠夺、暴力行凶；为了做鸦片生意、毒害中国老百姓，他们不惜开战，如 1856 年英法对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而这种掠夺政策，偏偏要以传布基督教的伪装来进行。

列宁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者，他认为，抨击他自己国家统治，是他的责任。他还写道：

如果我们要把事情说得明白清楚些，那么，我们得说，欧洲各国政府（其中首先是俄罗斯政府）已经开始瓜分中国。他们像盗尸者搜刮尸体一样，对中国大肆掠夺，如果你想要反抗，他们会像凶残野兽那样，烧掉你的全部村庄，把手无寸铁的居民，连同他们妻儿老小，都扔进黑龙江里去……

该怎样解释我们政府的毫无意义的政策，谁从中受到实惠？利益都进了一小撮大资本家的腰包……

列宁还特别批评沙俄政府千方百计用沙文主义来毒害老百姓。他指出：

沙俄政府的对华政策，不但是嘲弄中国人民的利益，而且在于腐蚀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而中国人民却从来没有压迫过俄罗斯人民。中国人民跟俄罗斯人民，遭受到同样的祸害……因此，一切有阶级觉悟工人的任务，就是要全心全意一起反对那帮煽动民族仇恨、转移人民的注意力，让他们放过了他们真正敌人……

与列宁的无产阶级立场，也同马克·吐温的小资产阶级实话实说立场形成强烈反差的，是当时马克思主义最大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的立场。伯恩

伟大的中国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在他 1899 年起流亡日本时期，曾经支援过阿奎那多领导的起义部队，后在流亡河内时，也支援过越南反封建爱国知识分子的革命组织东京俱乐部。孙中山经常强调，中国的解放运动和全亚洲的反殖民斗争，是密不可分的整体。

杜勒斯(Dulles, Foster Rhea)《1784 年以来中美关系故事》(China and America, The Story of their Relations Since 1784) 1946 年，普林斯顿版，104 页。

奇洛尔(Chirol, Valentine)：《远东问题》(The Far Eastern Question) 1896，伦敦版。

坦是德国“演进社会主义”（即今天的“和平演变”）论的支持者。他对其他帝国主义的胡作非为，不是加以谴责，而是以此为德国帝国主义参加这种罪行提供辩护。他反对德国社会主义刊物采取反对对中国进行殖民侵略的国际主义立场。他写道：

瓜分不瓜分中国，对德国人民并不是感到兴趣的事情……但德国人民对这个问题倒十分关切……就是说，一切有关中国的事件，德国人都不得不有话要说。德国在华的商务，它有权抗议。至于占领胶州湾，更有权抗议……就我来说，我认为社会民主党为这项原则大叫大嚷，是没有道理的。

而且，伯恩斯坦不但不打击资本主义兜售的欧洲文明“优越”论，作为他们有权掠夺亚非洲人民的根据，还要让工人跟“他们自己”的帝国主义统治阶级成为一体，而自外于世界上的别的工人。他说，国际主义社会主义是一种遥远的想法。同时，要注意他在行文中竟然用了“我们”这个沙文主义的字眼：

如果我们考虑到德国目前每年要进口相当数量的殖民地产品，我们就得让自己明白，那样的年代终将来临，即我们要从我们自己殖民地里，提取一部分产品……再说，只能有条件承认野蛮人占有土地的部分权利。文明程度越高，它应得的权力越大。现在，不是征服，而是开发土地，才是历史赋予土地使用者的使命。据我的观察，上述几点才是决定社会民主主义对殖民政策的主要立场。

社会帝国主义（名义上的社会主义，行动上的帝国主义）可以说，是从伯恩斯坦开的头。不幸的是，这种思潮并未随他而终结，或者仅限于它的社会民主的一个品牌。

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1966—1982），他的社会帝国主义政策牢牢控制苏联，背离列宁的路线。正像当年伯恩斯坦背叛马克思一样。他们奉行“有限主权论”和“国际分工论”，要别人向他们供应“殖民产品”。他们重复高唱伯恩斯坦的“高级文明享有更大权利”，“开发是历史赋予的使命”。他们坚持说，没有拖网渔船的国家，可在它的内河水域捕鱼，以免“资源不致白白浪费掉”。同样的理论是，本国领土外的石油，构成了“国际性的储备”。它还搬出一顶大帽子，向西方国家吓唬说，中国是“黄祸”这个种族主义的滥调。

义和团反对的是丧失主权和帝国主义国家不可一世的种族优越感。他们的悲剧在于，他们没有明确的政策，跟其他中国革命团体没有联系，对国内国外各种关系，一无所知。这样，义和团便容易受骗上当，只能以失败告终。

北京的封建统治者，鉴于运动发展火爆，担心被起义人民席卷而去，于是便假装要予以引导，发布了动听的爱国宣言，而且在群众压力下，真正向帝国主义国家宣战。但正当战争还在北京城内进行时刻，当局就向各帝国主

斯迈思（Smyth, George B.）：《中国排外情结的原因》（Causes of Anti-Foreign Feeling in China），1900年，纽约版。

义国家，奴颜婢膝发表通知，说“ 贵国从来并未贪图我国领土 ”，要求外国政府不要怀疑我朝廷竟然不关心人民。最后声明，中国现已无力筹措部队所需款项，为走出困境，只能向别国求助。

话说得非常清楚，朝廷要求弄到一笔钱，用于招兵买马，对付爱国的“ 叛逆 ”。为使这次叛卖行动开路，慈禧太后还为被清兵围困的北京使团，送去食物。除了华北义和团力量雄厚之外，各地方总督，也不愿参加这场战斗。相反，他们继续与敌人打交道，似乎没有义和团这回事。

侵略者正好利用这个良机，调集英、美、德、俄、法、日本、意大利、甚至奥匈帝国部队攻入北京，大肆劫掠屠杀。英国一位目击者普特南写过这次大屠杀的事，认为其残虐程度远远超过 1860 年英法联军的表演：

从公使馆里走出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他一再担任刽子手角色……这个人经常用猎枪杀人，似乎很欣赏杀人的勾当。他见到我，似乎兴奋得要发狂，结结巴巴对我说了些终生难忘的话，“ 你瞧见吗，靠东门的井，许多妇女姑娘都跳进里面去，他们害怕外国兵。” 接着小伙子又凑近我跟前说起大兵把妇女奸淫之后的行为。他说，是我们自己那些丧尽天良的大兵，特地请我来这里看他们暴行的。

普特南还说起北京城里，每个家庭都被抢掠一空，外国兵成了一支无穷无尽的抢劫队伍，而且后来，在血腥的抢劫中，开始把抢来的物品公开拍卖，所以后来“ 我们部队全体官兵，都成了做买卖的人。”

等到战斗全部停止以后，瓦德西元帅统率的两万真正德国远征军，才到达北京。德军离开不来梅港之前，德皇威廉二世，这位早就在欧洲兜售“ 黄祸 ”的皇帝，训示开拔去中国部队说，要他们真正具有血腥电火般的帝国主义精神：

记住你们在战场上碰见敌人后，不能丢掉阵地，也不必抓俘虏。用好你们的武器

让中国人一千年内都不敢正眼看德国人。为文明永远铺好道路。

到那时候，欧洲军队大多数都撤走了，也没有中国部队，一位作者记述当时德军战斗情况说，“ 德国占领军成了讨伐部队。每个小小军官都有特权下乡到处扫荡。凡是义和团住过的村庄、或发现过团员武器的村庄，一律纵火烧成灰烬，居民们不是杀死，就被赶走。”

伦敦《泰晤士报》记者柯乐洪曾经告诫人们不要低估这场波及 3 亿亚洲人的乱子产生的不祥后果。他说，清朝统治下的中国，“ 它站得稳脚跟……是生机勃勃的富矿……这份有待开发的产业，盎格鲁撒克逊现在一代人，不得不留给他们的日益繁衍的后代子孙。” 他的结论是，单靠武器，解决不了争端，“ 最好办法，是向中国投入资本和熟练管理”。清朝统治者已经原谅了外国帝国主义，因为他们需要外国人来对付人民。同样，外国也该原

致特威切特牧师 (Rev, Joseph T, Twichell) 信, 1900 年 8 月 12 日, 见《马克·吐温社会评论集》1958 年, 纽约版。

列宁: (Lenin, V.I): 《中国的战争》。

谅中国的反动统治者，尽管中国宣过战，但他们毕竟离不开帝国主义。历史已经证明，中国统治者有能力蒙骗、瓦解一场人民运动，这就可以永远把他们作为有价值的看家之犬。

义和团起义平定之后，中国被迫签订了《辛丑条约》。主要内容有：

清廷政权成了听凭帝国主义者任意摆布的总管。条约前所未有地规定要惩处那些轻率开战的朝廷大员，有的“令其自尽”。

在所有传教士遇害的地方 5 年内停止考试，下诏永远严禁反对外国的结社，直到判处死刑。

赔款总额高达相当于 5 亿美元，从 1901 年起到 1940 年止，每年向几个出兵大国赔款外，还给荷兰、奥地利、比利时、西班牙、葡萄牙以及一些北欧国家，通通赔款。

有 10 个国家还得到在北京使馆区内驻军权利。而中国在自己的首都“中国人也没有在区内居住的权利。”

外国军队还占领了北京到渤海的铁路线驻军权利。结果，北京、天津、山海关都有外国军队驻扎，为期长达 40 年之久。

《辛丑条约》第 11 条还明白规定，“中国政府将同各外国间谈判现已施行的商务航行条款中增加些补充内容，以便改进中外关系”。

第八章

走向资产阶级革命 (1901—1911年)

从1901年签订《辛丑条约》，到1911年资产阶级革命推翻清王朝的10年间，中国的局势发展非常迅速。

随着中国政治上处于屈从地位，经济上也日益依赖外人。国家变成了孙中山所说的“次殖民地”，即不止一个国家、而是许多国家都可以来吸它奶汁的奶牛。

帝国主义金融资本投入中国高达15亿美元。铁路靠外国银行强迫供款来修建，从1902年的只有560英里到1912年猛增到6000英里。这些铁路的任务是为外国股东提供红利，还便于输出中国的资源，输入外国的制成品。而且，铁路全都是为外国战略利益而兴建的，如其中有三条路（包括通往北京的一条）都由外国军队防守。

外国资本也渗透、夺取了前段时期“洋务派”兴办起来的工业设施。

李鸿章创办的开滦煤矿，就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它的所有权被帝国主义（主要是英国）夺走，纯粹是出于一名美国工程师从中勾结操纵，上下其手。这位工程师名义上是中国政府聘请用于开发矿产资源的技术顾问，但实际上是为伦敦金融家卖力，好盗窃这座矿。此人名字叫胡佛。他自称开发此矿目的在于，让矿山通过科学为别人大赚一笔钱。果然他在澳洲、南非、尼加拉瓜、缅甸等地推行这门“科学”后，知名度大增，成为一位“伟大慈善家”，最后登上美国总统（1928—1932年）宝座。

这位统治阶级“受人崇敬的老政治家”一直活到19世纪60年代。胡佛成为帝国主义“顾问”的样板，是值得加以研究的。1900年，他恫吓他的上司，许诺说，把矿交给他，会招来大量外资投入公司，当时华北遭到八国联军摧残之后，企业百孔千疮，胡佛说的话是不难实现的，因此他就取得了矿的控制权。1912年，伦敦的中国工程矿务公司代管了开平煤矿，胡佛是英国公司的董事之一。1912年，它成为开滦煤矿管理局的核心矿山。实际上，当英国法院的乔伊斯法官在听取中国控诉胡佛一伙诈骗案时，乔伊斯法官竟然说（见1905年3月2日《泰晤士报》报道）：“就我所知，起诉人已将本人和亲友持有债券，全部偿付，但我估计，还有424,993股，分文也未偿付。”

在中国，胡佛除了从接管中国煤矿出名外，还在于振兴了中国的“苦力”生意。他在担任开平煤矿董事长期间，不但运出原煤，还贩运工人到外国作

伯恩斯坦（Bernstein, E）：《演化社会主义，批判与肯定》（Evolutionary Social-ism, A Criticism and Affirmation）1961年，纽约版。

契约奴工。单以 1904—1910 年运往南非德兰士瓦省有一处的工人，就约有 5 万人，这种奴工每天工资 25 美分，工伤死亡可得到 50 美元抚恤金。

张之洞的汉冶萍钢铁厂也遭到同样的命运，没有成为中国重工业与国防的基础，它早先依靠德国，后来又靠日本借款。它的处于殖民地局面可以从美国钢铁大王、伯利恒钢铁公司老板斯瓦布的声明里就说得最清楚不过了。他说，他发现从中国进口生铁，比从自己的匹兹堡工厂买进，运到旧金山的价格，还要便宜些。

东北的鞍山和抚顺，盛产生铁和煤，却被牢牢控制在日本人手中。

中国对外的商务增长了一倍多，但其构成并不理想，成了对外出口原料、而为帝国主义国家推销商品的场地。中国贸易逆差迅速上升，债务越来越重。

在中国的主要城市里，美国、英国、法国、沙俄、德国、日本的银行以及各该国家国内主要金融垄断企业的分支机构，到处可见。

在中国社会的内部，随之出现了“买办”资产阶级的滋长。商业“买办”成了外国企业的分销代理人，通过他们，把外国货品运到最偏远的地区，又从各个角落，收购可出口的原料。银行买办则代表外国金融资本与当地地主、高利贷者资本、与部分商人资本的联合体。上述这些人成了帝国主义渗入中国政治、经济领域的无所不在的帮手。

然而，与此同时，中国人拥有的轻工业，尤其是纺织、面粉工业，却迅速发展，它代表民族资产阶级进一步壮大。它不像买办阶级，这一部分资本家阶级，希望看到中国强大、独立、经济上得到发展。

民族资产阶级为依赖从外国进口机器，甚至原料（如从美国和印度进口棉花）深为愤恨。由于封建落后才造成国内交通梗阻，不能从内部供应原料。而国内企业受进口税不许超过货值 5% 的规定，外国货可源源不断运进来。更气人的是，他们还被迫要与外国工厂在不平等条件下竞争（在治外法权条件下，外国工厂可以减免征税）。伴随着帝国主义军事与政治压力，外国资本不断流入，这是清廷无力抗拒的。这样，就严重限制了民族资产阶级发展本国的重工业与交通工业。

帝国主义对旧中国投资的极端反动性，还在于，除了剥夺中国主权外，它从中国竭力搜刮一切可能的油水。这表现在美国官方对厘金的成废问题上。厘金原是中国推行国内商品过境转口税，厘金妨碍了通行全国市场的形成，不管它是中国与外国资本主义企业的产品。美国出口商品到中国，早就主张中国废除厘金。但华尔街金融资本取得修建中国铁路借款的特权后，当时的美国助理国务卿菲利普 1900 年写信给他上司、美国国务卿诺克斯建议说，厘金可以保留，原因是，“如果将来我国银行业被邀请参加中国借款，我相信他们都以厘金作为担保。”根据这项建议，美国后来果然改变官方立

场，同意保留厘金，使之从束缚变成既为中国封建统治者，也为帝国主义服务，而前者与后者之间形成密切的依从关系的联盟。

比起中国资本家来，中国工业的工人阶级得到更快的成长。它不但更加团结，还代表一支更壮大的力量。每条铁路、每座工厂建成，不管它是外资或中方资本，也不管它是官营或私人经营，工人阶级总随之壮大。不管受谁雇用，工人面临的是同样的问题。

由于中国是农业国家，几乎一切国内的资产阶级，或多或少都跟地主有联系，而且是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这也是中国社会在清理整治上总是动摇不定的根源。工人的情况，正好相反，他们大部分来自农民，跟农村保持着密切联系。中国土地上这些遭到封建压迫剥削的劳动者，他们原来就饱经忧患，富于反抗精神，现在又加上新的，工人受到的忧患。他们对旧社会毫无眷恋之情。

成千上万的农民，他们不但直接遭受中国地主的剥削，还越来越受到外国工厂的剥削。帝国主义出于本身利益，能为农民出售农产品，还为农民要购买的货品规定价格。还可以为新建的铁路，轮船，规定运费价格。所以，农民的地位因双重负担而恶化。在人口众多的省里，地租比重占到产量的 70 %。

所以这些变化，使中国面貌与太平天国革命时期，甚至刚过去不久的义和团起义时期，都有很大差别。朝廷依然存在，但社会已有变化。一切要在今天中国人民革命中出台的主要阶级，已开始亮相。

说几位大人物吧。孙中山开始进入他革命活动的决定性时期；毛泽东，他于 1893 年出生于华中乡村，现已进入青年时期。孙中山童年深受太平天国革命影响。毛泽东则看到了帝国主义侵略带来的尖锐危机，维新派与革命党人对如何洗雪国耻方案的生动辩论，以及经常爆发的农民骚乱和遭到的残酷压迫。

让我们回顾一下这 10 年间的几件大事：

在国外方面，一些帝国主义大国正忙于巩固他们在 1880—1900 年间从亚洲非洲掠夺的广大殖民地区巩固其政治、经济统治。同时，又忙于重新划分掠夺得来的土地进行了两场血腥战争，一是 1904—1905 年的日俄战争，一是 1914 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屠杀。互相倾轧，加上义和团起义给他们的惊恐，才使列强没有立即开始瓜分中国，但尽管如此，帝国主义征服中国的势头，还是年复一年在加紧，掠夺行动与签订条约时有发生。

1902 年，英国和日本签署盟约，企图共同对付沙俄。条约前言里还伪善地提到“远东的和平”与维持中国和朝鲜两国的“独立与领土完整”，但第一款里就特别规定，英国对中国，与日本对朝鲜，具有“特殊兴趣”和武力干涉的“权利”。这项条约为后来日本在 1904—1905 年进攻沙俄，提供了

柯乐洪 (Colquhoun, Archibald F.) 在《中国的危机》中的一篇文章。

依据。在这场战争中，一切地面战斗都在中国土地上进行的。这场战争，虽然中国是中立国，最后却成输家。因为日本在朝鲜站稳脚跟，又得到沙俄在南满修建的铁路，以及大连旅顺租借的港口，全都可用来作为将来侵略中国的跳板。

正当日本与俄国准备在中国东北进行血腥的侵略战争时，英国趁此时机从中国西南入侵西藏。英国的借口是，在达赖喇嘛身边出现了一位来自西伯利亚的布里亚特蒙古人“经师”。其实沙俄早就想在西藏搞一套政治阴谋，只是找不到入侵的理由。而英国则实际上早就作好入侵的打算。英国驻印度总督寇松爵士，是极端的扩张主义分子，若干年来他千方百计要跟西藏地方当局建立政治关系，把西藏从中国分割出去。西藏地方当局以对外事务应通过北京商谈为由，退回英方函件时，寇松竟然说，地方当局的行为，不符合对待“一个伟大文明强国的领土应有的亲密关系”。

所谓的亲密关系与文明国家的作法，在 1904 年英国远征西藏中，表现得最为清楚。当时，荣赫鹏率领这支远征军进入西藏。他们早就在新疆雇到一名边境间谍。3 月间，几百名藏军被诱出他们的防卫工事，伪装要商谈，到古鲁这个地方被屠杀。一名英国记者，根据帝国主义的逻辑，无耻地写道，对付西藏人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没有指望让他们把英国看作强大国家，直到我们杀死他们几千人后，他们才能看得起我们。”

根据当时的资料，西藏人非常清楚，他们为什么打这场仗。一百多年来，他们亲眼看到西藏的邻邦印度，如何遭到英国殖民者的征服和奴役。他们下定决心，西藏不能步印度后尘。这就是他们的狂热勇气令侵略者震惊的源泉。例如甘孜城，就是在敌人大炮摧毁了英国人自己描述为地方部队用原始武器作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英勇防守后，才打下来的。后来，荣赫鹏率领部队到拉萨，他在那里按他要求签订了条约；规定西藏人要偿付讨伐他们这场屠杀的代价；在赔款付清之前，英军占领丘比河谷这块战略要地。今后英国商人官员有权自由进入西藏；夷平从边境到拉萨之间一切大小堡垒；同时本地区除非得到英国事先批准外，各国代表不得向西藏投资。

西藏人出于无可奈何、万分悲痛签署了这项条约。他们的悲痛和愤怒还在于，他们英勇抗战是为了维护中国的主权，北京的清廷政府应该有责任保卫全国，却躲在一旁，毫不出力救助。一切依赖帝国主义者。这次不但将许多汉人居住的要地拱手让与敌人，还把原来满族祖先留下土地，也丢失了。一味退让，1900 年敌人便一直打到北京。《辛丑条约》已规定，外国可以自由进入北京，从海口到北京铁路沿线已由外国军队驻守，海防已经裁撤。事情非常清楚，侵略中国西部边疆的西藏，就是侵略整个中国。

同样，1904 年西藏地方军民英勇抗击英军的斗争，也是中国各民族保卫共同祖国的反帝斗争的一部分。它与封建王朝的叛卖行径，形成鲜明的反

胡佛 1904 年 7 月 15 日写给伦敦《矿业杂志》信，见 202 页。

差。

与此同时，帝国者之间的交易，虽然不无矛盾，但在把中国和其他被他们掠夺的国家加以宰割上，却照旧在进行。

英日同盟条约在 1905 年又重加修订，作为两国在亚洲如何进行掠夺的相互保证。其中一条说，其目标使两缔约国在“东亚和印度保持其领土的权利”。修订后条款还使日本有权“指导、控制、保护朝鲜。”为瓦解朝鲜铺平道路。英国也同样可以占有印度边境。（就是说，西藏与中国西南其他地区，将来也可能归属在内。）

1906 年，英国又强迫签订一项条约，重申 1904 年荣赫鹏武力强迫西藏签订的条约外，又取得了在西藏架设电报线的特权。这是英国又一项盗窃中国主权的勾当。不过可以说明，伦敦政府不敢掠夺中国对西藏的管辖权，在牵涉到该地区事务时，不得和北京谈判。第二步是 1907 年，英国与沙俄达成妥协，即根据 1906 年条约，英国侵占的土地得到沙俄承认，还说双方要虔诚地尊重“中国的宗主权”以及“西藏的领土完整”。对英国来说，这种安排是为了缓和它与亚洲对于俄国的紧张关系（1907 年协定还牵涉到对阿富汗，波斯的关系）其目的在于，把俄国、法国拉拢来结成同盟，对付日益强大的德国。帝国主义国家已经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排好了阵营。美国也不例外，它已经和日本勾搭上关系。美国估计，日本在军事方面花了很大心血，将来一定能在东北、朝鲜它占领地方，充当警察。这就能使美国资本投向这个地方，获得丰厚利润。日本与俄国打仗，它的开销一部分来自华尔街金融辛迭加的支持。后来的和平条约，也是出于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操办，从而使日本得到超过应得的实惠。与此同时，罗斯福还在拉丁美洲动手掠夺，开凿了巴拿马运河，使美国海军可以进入太平洋，同其他帝国主义对手，在亚洲竞争。更有趣的是，美国卫戍巴拿马运河这一着，正是从沙俄当年卫戍中国中东路一举学来的。可见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尽管互相勾心斗角，但也能彼此“取经”，找到侵略的更好办法。

后来，到了 1908 年，华盛顿与东京又签订了《鲁特—高平协定》，让日本在中国东北与朝鲜可以便宜行事。作为回报，日本也不准备干涉美国在菲律宾的殖民占领地位。这就彻头彻尾背叛了美国过去签订的一项支持朝鲜独立的条约。那项条约是一位朝鲜爱国人士刺杀了朝鲜法庭的美国外事顾问艾蒂文斯而制订的。

《鲁特—高平协定》是典型的奴隶贩卖交易，它为 1910 年日本公然合并朝鲜，铺平了道路。讲到这一点，一位朝鲜评论家沉痛地指出，“美国嘲

关于胡佛接管开平矿及其他细节，见《开平矿》，1957 年，哈佛版；又见《胡佛怪诞生涯》1931 年，纽约版。

合同规定，运往德兰士瓦的工人，3 年内只限于在矿场干活，不得购进财产，或经营商业，可处以鞭刑。见菲利普（Phillips, L.）：《德兰士瓦问题》1905，伦敦版。

弄了自由，为专横霸主提供了武器。”

随着《鲁特—高平协定》的签订，美国华尔街开始收买沙俄与日本的中东铁路，完成美国拥有“环球铁路”的野心勃勃的谋划。这项谋划的设计人，是美国铁路大王哈里曼。其财政后台则是摩根财团、库恩勒布公司。

一位美国历史学者说，此人在美国国务院与银行家之间建起联系，后来成为在远东推行这项政策的官方官员。作为斯特莱特公司远东司长，他为哈里曼工作。而又作为哈里曼的代表，他为国务院工作。

这项收购计划后来未能实现，公司便转而想修建一条平行线路，把俄国和日本排挤出去。当时美国国务卿诺克斯很赞赏这个计划说：

资助中国修建铁路的国家，在对华事务中非常重要，美国资本参与这项投资，表明了美国在那个政治上富于争议的地方的权威意见。

美国这项坦白的声明，还伴随着对中国“行政实体”表现出关心。同时，美国塔虎特总统，还对清廷外务部长醇亲王，在最高层次上施加强大的压力，说“我对美国资本用于中国的发展怀有热切的兴趣。”由于后来中国革命高潮兴起，美国上述如意算盘，收效不大。

其结果倒是，美国这段时期玩弄的花招，跟英国一样，反而使日本掠夺亚洲大陆更加方便。在这种条件下，日本帝国主义从 1937 年起，以全力征服中国，并在 1941—1945 年间，再征服了太平洋地区，包括美国和英国的属地。

另外一桩互相保证彼此间殖民地掠夺成果的条约，也在法国日本之间签订。其主旨是支持日本对朝鲜的殖民控制，支持法国对印度支那的殖民控制地位。这个条约同样也重申两个帝国主义国家有干涉与中国邻近的对方殖民地的“权利”，作为后来一个接一个被合并的先声。这种厚颜无耻的“邻近”理论，后来被他们无穷无尽加以应用，包围圈越来越紧，受害者什么也没有得到。

但在这 10 年间，在中国国内，由于我们前面提到过的社会条件的变迁，帝国主义的残酷压迫，帝国主义阶级初期欧洲工人阶级举行第一次武装革命斗争，即 1905—1907 年的俄国革命。这次革命表明，帝国主义列强中的沙俄皇朝，表面上非常强捍，实际上很脆弱。这件事正巧发生在沙皇政府在 1904—1905 年的日俄战争中，被一个亚洲帝国主义打败之后，其影响是，亚洲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政府的民族运动都趁此机会制订斗争纲领，反对国内的专

《美国与中国，1906—13 年》《财政外交研究》，1995，美国拉特格斯大学出版社。

坎德勒（Candler, Edmund）：《拉萨真相》，1905 年，伦敦版。

西藏人反抗占领、压迫印度的政权这一事实，使得半个世纪后印度的尼赫鲁政府，自命为他根据荣赫鹏强加在西藏人民身上的掠夺性条约，更加不合逻辑。尼赫鲁在 1959 年中印边界争执后，认为“1904 年印度政府（原文如此）与西藏政府之间的协定”证明西藏是有签订条约能力的政权，因而，说英国包围边境之说显然是与事实不符的。（见《印度与中国政府为关于边界问题公报集》1861 年，德里版。）

制政府。

1905 年以后，亚洲各国那种传统的起义和农民战争时代，已经过去。在伊朗、土耳其和中国，起义都让位于资产阶级式的革命。

但更早一些，在《辛丑条约》签订之后，完全丧失人民信任的清廷，已从西安迁回北京，并发现形势已经大变。对清廷统治权的最大挑战，已不是来自维新派，它只求限制专制权力，而是来自要求推翻它的革命党人。

慈禧一行人在回京途中，遇到了一场惊险场面。他们在回京途中，险些遭到一批哥老会分子的暗算，而哥老会是跟孙中山有联系的。因此，慈禧太后惊恐之余，改变了带三千辆车马缓缓回銮的办法，而改由新建的铁路安全行进。当她回到血洗之后满目疮痍的北京时，英国报刊报道说，“她一见到洋人面孔，便推开她黄色轿子上的帘幕鞠躬微笑又点头。”

这一改变具有象征意义。从此以后，这位极端反动的统治者，也成了“西化”人物。她颁布了一系列诏书，诏书中再次发布 1898 年维新派变法时宣布过的大部分纲领，而当时维新派人曾因此被处决、流放。这样做，她想为王朝带来一线生机，而她的“革新”很能迎合西方金融资本的口味。古老的体制已经证明，它不能控制住人民群众。它也不利于治理这个已被殖民者投资兴建起铁路、电报、工业的国家。

然而，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膏药，已经为时过晚了。中国受过教育的青年精英，已经组成了各种秘密团体，发行地下报刊，从事各种反对王朝的活动。正当清廷官员忙于采取镇压和煽惑办法对付国内的革命浪潮时候，孙中山却在流亡海外中不屈不挠地组织革命党人。他几乎足迹及世界各地华人社团。到各大学找中国留学生。筹集基金，制订纲领，举办俱乐部、报刊，购买、运进武器。他和他的同志们指示归国留学生，组织各类地下活动，包括打入行政机关与军队。尽管遭到逮捕与处决，这些任务都是果敢地建立起来。

不久，革命从地下转到公开。1904 年，黄兴领导的地方革命党人，后来成为孙中山亲密战友，开始在湖南建立一个巨大的农民起义组织。同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发起一个很有效的抵制美国货运动，作为抗议美国在西海岸对华人施加的残酷种族歧视。

1905 年，清廷派遣大员出洋考察西方政体时，曾遭到炸弹袭击。

孙中山于 1905 年 8 月在东京将兴中会与其他革命派合组成同盟会，是件意义重大的举措。此外，过去大多数革命党派都小而零散，现在第一次组成一个真正的政党。

俄罗斯沙皇尼古拉二世也“梦寐以求将西藏弄到俄国手里”，见 1903 年 2 月 16 日俄国陆军大臣克鲁泡特金日记。但俄罗斯不久因在 1904—1905 年对日战争中失败，国力削弱，所以，它在 1907 年对英贸易条约中，承认让西藏容许英国进入，换取其他类似便利。沙皇外交大臣在十月革命后披露的一份秘密文件说“英国的建议，显然已把西藏变成了英国实质上的保护国。”“我们应该在阿富汗或波斯方面，取得补偿。”

同盟会在它们探索观念中，对 1905 年的俄国革命给予广泛共鸣，虽然这次革命并未成功。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几乎每期都有关于日俄国革命运动的报道。中国进步人士在此以前只盯着 18 世纪的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现在转而被这次伟大变革所吸引，深感兴趣，以异常同情、敬佩心情，注视着它的发展。“俄国革命的事比一切国家更为卓越”。一位作家说过“欧洲美洲国家虽然强大，但他们的人民很穷困。”他的结论是，有必要“同时，要开始一场政治的和一场经济的革命。”从 1905 年的俄国革命的范例中，中国革命家得到用报刊来传播本党理论，关于武装斗争和组织群众这些有效办法，以及土地问题的政治重要性等这些新的观念。

同盟会的纲领不但要求建立一个共和国，还要求平均地权，使农民从地主的束缚奴役中解放出来。防止中国再滋长资本主义的弊病，从而铺平进入社会主义的道路。然而，事实上，在那个时代，就是实现了上述目标，也无可避免地在农村引发资本主义的产权关系，从而在全国产生资本主义。因此，这个纲领肯定在整个封建体制中是具有革命性的，然而，为它贴上社会主义的标签却还是一种幻想。中国工人阶级当时还很弱小，没有它的政党。在当时，这种现象是无可避免的。

同盟会的纲领事实上还是一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尽管在这方面这也是不完善的，有着许多弱点。它把目标完全对准满人的专制主义，而忽视了外国帝国主义跟整个中国封建反动派有着联系。尽管如此，它在特别坚持革命方法这一点上，还是与过去的维新派有区别，因而它仍将是代表当时中国政治思潮最为先进的一层。在当时提出的一切挽救中国方案中，它是最符合实际情况，适合人民要求的一种，因此，加入同盟会会员一年内便超过 1 万人。

1906 年，同盟会领导了江西煤矿工人起义，参加的工农群众达到 3 万人，最后被镇压下去。1907 年，同盟会又在汉口组织一次因拖欠兵饷而发动的兵变。还在广东省发动抗捐的农民起义。1908 年，孙中山在河内建立总部时，曾武装同盟会员从越南进入国内。后来虽然被迫撤回，但他撤出时的军力大大超过入境人数，因为清廷许多士兵都投向革命党人的一边。

与此同时，康有为的维新派虽然还流亡国外，但看到革命浪潮高涨，也打出“保皇党”的旗号。有趣的是，连维新派也对 1905 年的俄国革命，给予密切注意。但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正如他们的报纸所说，只是为了要清廷像沙皇那样，赶快进行立宪改革，避免“心怀叵测的人，利用群众愤怒情绪，揭竿起义”。然而，历史的进程大大超过康有一帮人的设想。他们的真面目，只能助长革命阵营的势头。

1809 年，清廷再次想借维新花招来保住王朝，下令各省筹建咨询会议，作为将来建立全国议会的第一步。这种会议没有受到欢迎，也未对朝廷带来什么好处，虽然这类立法机构大部分为非革命的地方士绅组成，但同盟会也在其中施加了一点影响。两年之后，在天灾、饥馑，农村日益不稳，在各省

出现起义的背景下，他们跟清王朝在外资进入中国问题上，发生激烈的冲突。

铁路是个迫切问题，从 1905 年起，随着外资修建铁路的发展，中国资本家和地方士绅也组织起许多修路公司，用自筹资金筑路。早在 1901 年，清廷在美国塔虎特总统直接压力下，接受了美、英、法、德的银行贷款 650 万磅。朝廷宣布将中国中南、西南私有铁路修建权“收归国有”，作为四国银行贷款的抵押。四川省成渝铁路公司的股民，派出代表团，向官方抗议。四川总督下令逮捕了代表团，还向要求释放代表团的成都市民开枪。

成都市民，在遭到水灾农民增援下，奋而起义，斗争长达几个月。起义者俘虏了总督，将他处死。有意思的是，这次四川保路起义中的一位领导人张澜，1949 年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这位统一战线重要人物，成为国家副主席。至于引起保路斗争的那条成渝铁路，在解放后 1950 年至 1952 年建成，但不是靠外资或地方士绅的资金。尽管他们为此争执了 40 年之久。它成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国家的第一项行动。

第九章

推翻清朝 (1911年)

1911年10月10日，发生了一起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以同盟会员为首的，位于华中大工商业城市武昌的清廷卫戍士兵，举行起义，发表宣言，号召推翻满清王朝。在工人、学生支援下，占领了武昌邻近的汉阳兵工厂，它是中国最大的兵工厂，贮存着大量军工用品。

清廷的海军，原来奉命开赴汉口镇镇压起义，但行驶到停泊地后，不愿向革命军开火。不到30天，不久前还能在全国执行的朝廷命令，已在长江以南失灵。就在北方一些城市如沈阳，它原是满人祖先的封地，也行不通了。

这时，果断专横的慈禧太后，已经去世。因推行新政被软禁的光绪皇帝，亦已去世，可能是被他血腥成性的嫔娘下令谋害的，因为她感到自己的末日，也已来临。溥仪这时在位，但他还是儿童，周围是群无足轻重的人。

外国列强，中国的地主与买办阶级，现在都看得出，清王朝已无救治可能。他们都想找到一位“强人”，这个人既能粉碎革命派，或扭转革命方向，又能保持住自己的特权。在他们眼中，这个人只能是袁世凯。他是训练新军出身的将军，一向野心勃勃。在1898年百日维新中，他假装站在维新一边，后来叛卖告密，使维新流产。

这时，袁被任命为清军总司令，后又任总理大臣。他已控制住北方局势，因为革命派在北方并无部队。接着袁开始和南方的共和军谈判。袁得到外国的支持，他们照会说，如果不能媾和，他们将出面干涉。南方阵营中摇摆不定的资产阶级分子，恐怕革命内战引发农民起义，也愿媾和。

在双方达成停战后，革命旗手孙中山在流亡海外20年后凯旋。1912年2月1日，孙中山在太平天国革命旧京南京城，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总统。他的就任宣言强调了一点，即不让专制政体，以立宪或其他任何形式，在中国重演。但宣言也有个致命缺点，没有提到同盟会另外一条纲领，平均地权。

由于革命派的这条缺点，它没有在广大农村建立起巩固基础，使得北方反动派能推翻新生的共和国，变成封建秩序的盾牌。袁世凯果然不久就逼迫清帝退位，取得了北京的政权。退位诏书命令总理大臣袁世凯“联合南北”，而无视南京早已存在一个共和制的政权。命令还授权他“组织临时的共和政府”。诏书还确认，退位后的皇帝享有与外国君主同等的地位，岁费每年约200万美元，一切皇室财产包括宫殿，都得以保留，其随员、卫队都由国家开支。满人贵族也得以保留私人财产、头衔，还免除服兵役。那些没落穷困的贵族，或将来可能没落的贵族，得以保留其产业，并给予生活出路。

两天之后，1912年2月14日，被革命军推选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宣布辞职，让位于袁世凯。袁被退位的封建王朝指定为继承人。这一不幸的

后果，使孙中山和他领导的革命党，将南方的地盘也送给袁世凯。这帮原来的立宪党人，都是最后一分钟才倒向革命派的。因为他们在至关重要的土地问题上没有动员群众，也没有组织过革命武装力量。孙中山采取这种行动，是因为他想避免内战和外国干涉，故而把各种团体都拉到共和国里来。这样既可得到国际承认，又能为新创建的国家经济建设取得外国借款，而帝国主义列强早就暗示过，除非袁世凯出任总统，他们是不会借款给中国的。

对于老老实实、而又考虑不周的孙中山来说，他长期追求、战斗得来的共和国如愿以偿，因而为此作出些妥协，是值得的。后来他自己也深为后悔，因为他的委曲求全，并未给国家带来统一、和平，也没有带来他盼望的“有秩序的进步”。

1912年3月10日，中华民国的约法在南京公布。其中选举权有财产的限制，因而剥夺了大多数人民的普选权。同年夏天，要求革命成功后生活得到改善的农民，遭到袁世凯军队枪杀。虽然这时已经换成共和国政体，但其横征暴敛的残暴程度，比起在清朝龙旗下的日子来，毫不逊色。

对中国人民来说，这些经验是一场排演，一个学校。它告诉人们，要想真正赢得一场革命，不单是改变政府的形式就行的。孙中山本人，也将永远记住这个教训。许多参加1911—1912年那场革命的人，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都又吸取了新的思想，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并和孙中山结成盟友。

朱德，在云南省反清斗争中的一个军官，后来成为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38年之后，终于驱逐了中国大陆上得到帝国主义武装的反动部队。董必武，辛亥革命时期在汉口从事革命工作，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位副主席。在湖南长沙的青年学生中，有一位参加过反清起义部队，在后来事件中又多方面慎重思考的人，他就是毛泽东，当时他才18岁。

第十章

军阀统治，新人民力量诞生 (1912—1918年)

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就不复存在。会中一些有名望的会员，组成了风起云涌出现的新政党，他们都没有什么革命的历史，后来组成国民党。这是遭到孙中山反对的。这不单是一个名称的变化。同盟会原是从事革命活动的组织，国民党则只是个松散的机构，由于一批趋炎附势的人大量流入，这批人都想装成革命“阵营”的人，原来的革命性便大为冲淡了。袁世凯等篡夺政权以后，国民党成为议会中的反对党。虽然国民党还在侈谈“服务社会”，甚至“社会主义”，但它的政纲，不像同盟会那样，对农村政策的迫切问题，只字不提。首先，新的政党显示出，它已堕落成一批既无火气、又无原则的政客的集体。

孙中山不久就看出了苗头不妙，所以他宁愿在国民党内再组成一个小的政团——同盟会俱乐部。但他想以此来保持老同盟会的革命精神，却并未成功。

在这时期，袁却积极建立起一个军人独裁政权。不久，他就再也不需要约法的外衣，不顾一切民主程序，同国际财团谈判借款。而过去这一类借款曾引起群众对清王朝强烈不满。反对袁的铁腕行动的人，都被袁派人暗杀。

国民党的抱负得到进展，在第一届国会中赢得多数席位。但它想分享政权的希望，却因袁派人暗杀宋教仁而落空。宋是幻想走议会道路取得政权的人，是国民党推出的总理候选人。正是在袁的恶棍手段大显身手以后，英、法、德、俄、日本银行，对袁向革命党开战，非常满意，便向袁的政府贷款2500万磅。美国报纸更称赞袁是善于办事的“强人”。

得到了外国支持，这位“强人”当然要回报。1912年1月27日，即袁登上总统宝座的第一个月，他热心办理的第一件事是签订协定，成立开滦矿务局。根据协定条款，1900年胡佛玩弄花招从中国窃取的英资开滦煤矿，和中资企业滦州矿业公司合并，而由英方控股。这样，当时全国最大的煤矿产区（位于唐山与天津之间），拱手送与外人。根据协定条款，中国对开滦的主权也不复存在，因为中国的矿业章程，除非得到英国政府同意，在这里不能执行，包括对矿产征税的税率。而管理矿业的权力，完全落在英国总经理之手。而作为贿赂，工资虽高、却无实权的“董事长”一职，才由袁世凯的大公子担任。

对英国的回报是煤，对美国的回报是则是石油。纽约的美孚石油公司得到在陕西和全国独家开采石油的特权。

领土，也成了报酬的价码。中国国内的军阀混战，刺激了帝国主义国家不再信守他们之间的互不侵犯的承诺，展开了新的斗争，即掠夺中国广大的

少数民族地区。中华民国的国旗，展示了它历史性的多民族特色。五条同样宽的色带，象征五大主要民族：汉、满、蒙、回、藏。但袁世凯的兴趣只在于，不管你是汉族或是其他少数民族，同样加以剥削、压迫。比起过去的王朝来，既加强了阶级压迫，也无视于各民族的平等。与此同时，他比过去的王朝，在捍卫国家的共同遗产方面，并不多下力气。为了讨好外国列强，他承认并保证遵守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协定，包括沿中国边疆的“势力范围”，如英国对西藏，沙俄对蒙古等等。所有这些条件，都被帝国主义者利用来一方面加紧分割中国，一方面阴谋将原来划分“势力范围”，干脆变为赤裸裸的占领，或成为他们的附庸。例如，西藏贵族的亲英分子，宣布所谓“独立”，实际上变成英国的保护领地，而这一点，不管中国或其他任何国家，都从来没有承认过。

1912年8月17日，英国驻北京公使送给中国政府一份照会，威胁说，如果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政府派部队或行政人员进入西藏，或给予西藏议会代表权，英国将不承认中华民国。照会还蛮横无理地说，英国承认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并不是承认中国的主权。英方坚持召开一次特别会议讨论西藏问题。在会议之前，英国将封锁中国人员货品通过印度进入西藏的通道。

对此，袁世凯政府只是发出一封措词软弱的抗议，说此举实际上是“友好”英国对中国的宣战，却仍然同意谈判。1913—1914年的西姆拉会议，就由此召开。在这次臭名远扬的会议上，英国不仅阴谋把西藏从中国分割出去，还想吞并西藏，作为西藏东南的印度的领地。

在西姆拉会议上，英方代表麦克马洪爵士专员提出，建立一个“西藏外围”，实际上成为一个独立的实体，另一个是“西藏本土”，包括藏族居民的各省，对此中国有管辖权，在谈判中英方对此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还直接照会北京说“英王国政府的忍耐已到了尽头。除非签署本条约，否则王国政府将与西藏直接签订条约。”但袁世凯政权尽管对帝国主义总是百依百顺，却也拒绝西姆拉会议英国一意孤行制订的条约。7月3日，它不但在会议上，还通过驻英公使，宣布说拒绝本条约，而且将来英方与西藏任何人签订的各种协定，都不能生效。

这样的举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早在1914年3月，麦克马洪就劝诱西藏地方政权代表龙臣·沙特拉，在德里秘密签署一张地图，把西藏东南部几个县，划入英属印度之内。这项阴谋不但是背着中国政府干的，龙臣·沙特拉的行为也受到拉萨方面的谴责和驳斥，它照旧在上述各县收税，管理政务。因此，直到15年后的1929年，英方不敢公布麦克马洪与龙臣·沙特拉这项文件。他们也不敢把“麦克马洪线”作为官方地图上的边界。一直到1936年，当中国面临日本迫在眉睫的侵略前夕，蒋介石政府在极端困难中，也不

张亨利：《美国的东方政策》，1919年，纽约版。

哈里曼 1961年担任美国肯尼迪总统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A·哈里曼的父亲。

敢承认这段边界，以致这条界线在英国官方的印度地图上，始终未出现过。

西姆拉会议或麦克马洪线，从来都没有生效过或具有合法性。两件东西都不过是英国殖民主义想把西藏从中国永久分割出去，成为他们的保护地、从西藏人手中盗窃这片土地，归其直接进行殖民控制的，只是未能得逞的一套精心策划的阴谋而已。

1913年，袁世凯对帝国主义者屈膝的政策，以及他在国内背叛人民，引发孙中山讨袁的“二次革命”，南方几省组织的武装起义，先后被镇压下去。各方对袁的不满，无疑使得袁世凯在向外国屈服方面更加小心。二次革命失败，未能推翻独裁者，其原因仍在于没有在农村进行改革，使农民都置身事外，不参与革命战争。

军事上取得胜利后，袁干脆宣布国民党为非法。同时他也不再受议会约束。在他的法律顾问美国古德诺教授煽动下，他加强了总统的权力。孙中山被迫流亡到日本。他于1914年初组织了一个新的、更加紧密、纪律严格的政治组织，称为中华革命党，准备再度推翻袁世凯。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带来了一系列新的事件。日本参加协约国一方。但它跟德国只打了一场战争，而战争是在中国山东省土地上打的。日本强迫戍守胶州（今青岛）的德国海军投降。这样，日本便把它的部队开进政治上四分五裂的中国。日本进占的地位还不受任何交战国家的限制。而除了美国外，一切国家都卷入了欧洲这场生死的战争。对东京来说，现在已不是在瓜分中国中占有份额的问题，而是把全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的时机，已经到来。

这也正是日本为什么参加大战，对德宣战的原因。日本军国主义者组织黑龙会，在1915年一份备忘录中解释了这一点：

当欧战结束、恢复平时，我们关心的问题，已经不是德国奥国两个王朝获胜，还是英、俄、法三个协约国获胜的问题，而是鉴于未来的倾向是欧洲向亚洲大陆扩张，日本帝国政府就应该毫不犹豫地运用力量，阻遏这种趋势。现在是迅速解决中国问题的大好时机。这种机会是几百年也难遇到一次的。

抓着这个大好时机的野心勃勃的企图，是1915年1月18日，日本大使秘密夜访袁世凯时，提出了声名狼藉的《二十一条》。这份谋财害命的文件，在令人想到日本在合并朝鲜之前，强迫朝鲜签订的那类文件，即虽然是写在纸上，但纸上面却盖着大炮、战舰的水印。

《二十一条》的各项要求，分为五个部分：

1.关于日本在山东的特殊权利，即使未在和约中有所规定，但日本仍可

格里斯沃尔德（Griswold, A, Whitney）《美国远东政策》1919年，纽约版，141—144页，161页。

关于这次抵制美货运动，起因、过程见美哈莱（Harley F. McNair）教授的《海外华人》（1927年纽约版）书中列举了当时屠杀、拷打、逮捕、驱逐“蒙古利亚人”。1903年，还发生了一起驻旧金山的中国军事参赞，因不堪忍受警方的羞辱而自杀的事件。

保有它从德国取得的特权，在原德国范围外修建新铁路，日本也有特权。

2. 日本享有东三省南部和东部以及内蒙古的特殊权利，即原日俄战争后俄国租用大连旅顺（租期 99 年，即到 1997 年和 2002 年）。南满和内蒙东部向日本企业开放，所有矿山、铁路的借款，首先须向日本提出。在该地区须聘用日本人为政治、财政或军事顾问。

3. 将中国最大重工业企业，即汉冶萍公司，变为中日合办企业。中方对上述企业不得另行处置，也不得允许任何中方或外国人，在未得日本许可之前，在其邻近开新的矿山。

4. 中国沿海港湾、岛屿，概不得让与或租与他国。

5. 此条款最为苛刻，包括聘用日本人为中国政府的政治、财政、军事等顾问，某些地方的警察由中日合办，设立中日合办的军械厂，把武昌至九江、南昌间，南昌至杭州间，南昌至潮州间的铁路建造权，以及在福建省内修铁路、开矿山的投资优先权许与日本。

北京政府为此条款谈判一直拖到 5 月间，接着日本提出限 24 小时答复的最后通牒。袁世凯并没有顾及国人的民族义愤，反倒强化了他的镇压措施。他这时也想登上皇帝宝座。在这方面，古德诺教授给予大力支持。他写了一篇论文被袁世凯大量印行，认为中国应该恢复帝制。文章开头就来一句侮辱性的断言，说“在一个人民智力不高的国家”总统更换只能带来一场骚扰，接着便威胁说：

欧洲的首都与工商企业，越来越倾向于为了他们的投资获得适当回报，必须有一个和平环境。他们越来越认为，不安定国家政治上的独立，实际上只会是带来毁灭。

因此，古德诺的结论是“对中国来说，帝制比共和更为适合时宜。”

他的意见受到霍恩伯克教授的支持，这位教授是美国务院远东司的头面人物，在中国，这位职业政治家武断地说，“帝制政府可以代表全国人民的政治观念。”对古德诺和霍恩伯克来说，袁世凯不言而喻就应该是皇帝。霍恩伯克还说，“三十年来，外国的代表都感到，对他深有信心。”

然而，古德诺文章还有一条保留意见，即“实现他的建议，还要这一变化不致于激起中国人民的反对。以至于造成骚乱，当前的民国政府多次制服了这些骚乱。”换句话说，从这位知名的经典人物看来，产生过华盛顿、林肯的政府的形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压制革命力量的效率。

袁世凯听从古德诺的劝告，却并未注意他提出的警告，自己“选举”自己为皇帝。原定在 1916 年元旦登位。但离登位一个星期之前，蔡锷首先在云南起义讨袁。朱德也参加了讨袁。独裁者这时已丧失民心，群众如此反对帝制，这就使中央政权分崩离析，像 1911 年辛亥革命时期那样。袁已经推

利用中国各地进入西藏只能通过印度这一特殊条件，1950 年中国刚成立不久，英国的香港殖民地便以拖延或不发护照，使拉萨派出的代表团，几个月后才到达北京。详见 1950 年 11 月 16 日中国致印度照会。

延、后来又取消帝制。1916年6月，袁就去世。

虽然北京政府依然还是全国性政权，但从此以后，它再也不能在全国发布命令了。名义上的总统，实际能控制北京的人，在两大省籍军阀集团中换来换去掌权。一个是皖系的段祺瑞，由日本人支持；另一个是直系的冯国璋，受到英、美的支持。稍后又出现了另一个亲日的军阀集团，称为奉系。三个集团都在抢夺中央政权，开始了“军阀混战时期”。实际上是帝国主义的不同列强，在支持、装备中国的武器冒险家，来控制中国。

段祺瑞是上述集团中第一个主持北京政府的人。他首先从日本得到一笔2亿元的贷款。1917年8月，在美国对德宣战后，段也宣布中国参加协约国一方，多数中国人都认为，中国参战对国家毫无真正的好处。事情非常明显，对德作战也不能收回被德国占领的租借地，因为《二十一条》已将此项权利转让与日本，所以民国的议会原来都反对此举，后来得到通过，是靠贿赂议员。

孙中山在袁世凯去世后已经回国，他也抗议说，中国应该参加的战争，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控制的战争，为了支持他的抗议，他在广州建立一个政府，认为这是唯一的合法政府。但由于政治上、组织上准备不够，广东政府存在时间并不长。

北京参战只是平息反对派，并没有派人去国外作战，可能是因为欧洲协约国不愿意让中国人得到向“白人”开枪的经验，虽然打的是协约国敌人。然而在英国人指挥下，中国选派了20万农民和城市居民组成“华工”。这批“华工”是由专门办理贩运“契约奴工”的老手集中，用轮船装运到欧洲的。帝国主义经办的开滦矿务局担任了大部分任务。而开滦矿务局则是未来的美国总统操纵成立的。这批华工后来被派到法国，往往在手无寸铁的条件下在战场上干活，或挖战壕、或埋死尸。所以这些都说明，中国虽是它名义上的“盟友”，然而奴工总是奴仆，主子要他干什么，就得干什么。

在这场斗争的后面，是靠战争发财的美国，它已经准备在德国战败被处置之后，也企图独占中国的市场。这当然是日本所不愿看到的，因为日本早有独占中国的野心，而且当它的对手正在别处占领的时候，日本已大大扩展了它的势力范围。英国呢，直到1914年之前，它是在中国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现在既然美国与日本都想挤进来争夺市场，它就不得不再施展花招，跟它们较量一场。

然而，在第一次大战停战之前，上述冲突并未表面化。相反，因为日本经常以退出战争或倒戈参加另外一方来进行讹诈，英美两国都不得不出让

就是这位麦克马洪（Henry McMahon），后来成为英国驻埃及（当时埃及是英国保护国）专员，他曾保证，只要阿拉伯国家在一次世界大战中站在协约国方面，对德国、土耳其作战，就在战后让他们独立。战后他作为英方代表出席巴黎和会的中东专员时，却将阿拉伯国家划为“保护地”或“委任统治地”，分与战胜国协约国各方。

步。英国向日本保证，不但在山东，连同德国在太平洋上的其它岛屿，都让日本接管。而美国呢，它暗示说将来在和约中会支持中国的要求，然而中国参战以后不过两个月，便背信弃义，于1917年11月2日，与日签订一项令人嘲弄的《兰辛—石井协定》，“提出邻土邻近形成国与国间的特殊关系”这一前提，因而“美国承认日本对邻近中国的某些领土，具有特殊兴趣。”《兰辛—石井协定》不只是针对中国，也针对俄国，当时俄国正处于革命前的阵痛中。美国承认日本有特殊兴趣的地区，也邻近俄国的边界。

1918年，英国也重新施加压力，要求中国批准1914年的《西姆拉协定》，即吞并西藏。

这样，即使中国在战争中是他们的“盟友”，帝国主义者照旧推行他们瓜分中国的政策。这就使中国爱国人士含羞忍辱，义愤填膺已达80年之久的激情更加强烈。与此同时，战争使得中国内部经济社会都发生重大变化，带来新形式的斗争。

一方面，欧洲列强对中国压力暂时减轻，使日本在中国扩大侵略，更加有利。

另一方面，对中国经济压力减轻，也使得中国工业得到前所未有的飞速发展。同样，中国资本家与工人阶级也大幅度增长。

虽然中国直到这段时期，还没有扭转贸易上的不利局面，但它的进口超过出口额，已从1914年的1.34亿美元，下降到1919年的2200万美元。

中国棉纺厂的纱锭数，从1913年的651676支，增长到1919年的1173012支。国内面粉业也有大发展（1914年中国进口面粉超过它出口15000吨，但到1918年它出口超过进口15000吨）。大战爆发时中国只有15家中资银行；1919年已有57家。

除了中国资本兴建的新工业设施外，日本人也在新建工厂。因此，中国工人阶级增长的比率，高过中国拥有工厂与外资工厂加在一起的总和。在1914到1919年间，中国工人人数从100万增长到约300万人。还不应忽略，在大战期间，被运往国外的“苦力”也有千百万人。这些人大部分在工厂或其周围干活，大多数人，特别是在俄国做工的，不久就受到革命思潮影响。事实上，十月革命之后，有整连的中国人加入红军的部队，向白卫军和外国干涉军英勇作战。随着人数的增长，视野的开拓，工人阶级不能不对过去的处境提出挑战。斗争自然要找到在政治上表达的途径。这是极端重要的新的事实。

最后，还要注意到，中国民族资本在欧战时期的扩张，还有片面性，即完全放在轻工业方面。在基础工业（金属、工程、采矿）方面没有涉及。恰恰相反，正如前面指出的，日本趁此机会加紧对中国的控制。中国经济，事

关于西姆拉会议的研究报告，包括《艾奇逊条约》版本如何企图使它“合法化”，见马克思韦尔(Maxwell, Neville)《印度的中国战争》，1970年，伦敦版，第二章。

实上并没有走出半殖民地地位而走向真正的独立——正在上升的民族资产阶级对此当然是不满意的。

所有这些发展形势（包括国际与国内的变化）表现了中国知识界前所罕见的沸腾奋发。1915年，《新青年》杂志创刊。它首先对中国封建社会一切社会的、哲学的上层建筑，加以批判，特别是针对孔教伦理和家族制度，掀起了一场“文艺复兴”的运动。其中一项是提倡白话文，用口语写作。这一点是极其重要的，因为要想把新的信息、观念向人民表达，语言要通俗，而在此之前，即使是报纸，都用文言文，对读者来说，正如你对现代意大利人讲拉丁文一样，没有受过特殊教育的人，就是听别人读，你也无法理解，自己读更如对天书了。在这场新文化运动中，涌现伟大作家和民族英雄鲁迅，小说家茅盾，后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成为文化部长。这些人都是新的革命民主文学的开拓者。

在这些年代里，大中學生人数也大量增长，他们都反对旧观念，认真研究中国和世界上每一种新思潮，到1917年，学生创办期刊近300种，大都使用白话文。青年组织研究团体风起云涌。其中有毛泽东在湖南办的“新民学会”和天津的“觉悟社”，其中领导人有周恩来。新文化运动后来分化为右翼和左翼。前者坚持将运动限于“非政治”范围，左翼则企图寻求在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政治的、经济和文化的方面进行激烈改变。

中国社会与思想在第一次大战后的变化，是自从鸦片战争后所有各时期变化中，最为深刻、最有意义的一次，这些新的变化为革命发展打下了基础。辛亥革命的最大成就是废除有二千年之久的专制政体。但这点成就说到底也只是表面上的一点骚动。新生的力量则要废除不平等条约，因为它损害了中国的主权。他们很清楚，如果不平等条约继续生效，那么大战之后各个打了胜仗的帝国主义列强，一定要利用他们政治上、军事上的特权，来破坏中国的进步。

要求结束中国处于被奴役的地位这一共同愿望，使得北洋军阀政府也不得不在上述问题采取新的立场。它不得不训令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以民族自决权为基础，根据美国总统威尔逊宣布的类似的十四点自由权，以及其他协约国的声明，要求恢复中国享有与其他国家平等的权利。特别提出以下几点：

废除各外国划定的势力范围。

撤出各国在中国的驻军。

废止列强享有的治外法权。

收回各国在华的所有租界。

恢复中国关税自主权，废止限5%的税率。

撤消二十一条。

然而，上述正当要求全部遭到拒绝。相反，凡尔赛条约156条承认日本夺得山东原德国享有的权利，使之合法化。主宰和会的四巨头，美国总统威

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法国总理克列孟梭，意大利首相奥兰多。看他们的粗暴的叫嚣：

胶州湾周围领土，铁路，电报，以及山东境内矿山，连同中德 1898 年 3 月条约中规定的特权，都让与日本。

德国在铁路干线与支线、产业、车站、建筑与其他不动产，以及矿山，由日本接收。

从青岛通往台湾的电缆，由日本无条件接收。

这些后果，是在大战结束后给中国的一记耳光，而中国是在“争取民族自由权”、“让世界安全走向民主”的口号下参加这场战争的。在国内，它引起全国的怒潮，这就把中国的新生力量，跟一切帝国主义者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发生了面对面的冲突。

第十一章

“五四”运动，新民主革命开端 (1919年)

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走向政府机关门前,才发现在这个紧要关头,部长们正和日本外交官亲切恳谈。警察向示威群众开枪,逮捕了一批学生后,全国掀起一片抗议浪潮。中国青年学生,不愿像他们父辈那样,在半奴隶状态下过日子,到处起而抗争。就连在日本留学的学生,也走向东京街头游行。政府派骑兵驱散他们。民族资产阶级开展抵制日货运动。上海工人、英资开滦煤矿工人,京汉铁路工人,在中国历史上展开第一次政治性的罢工。

政府受到抗议浪潮的震慑,早在6月初便下令释放了关押的学生。然而,这些学生作为斗争胜利的一方,却拒绝出狱,要求政府开除对逮捕学生负责的官员。最后,当局在新的示威群众面前,也不得不公开向群众道歉。政府为了使全国的愤怒情绪稍为冷却一下,不但让警察请求拒绝出狱学生谅解,还准备派汽车送他们出狱。6月28日,示威群众声讨的三个部长被免职。中国还宣布不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

“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高潮的一个热点。它发生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也是十月革命的一项成果。十月革命改变了地球上1/6人口的世界大国的面貌,由工人阶级取代了帝国主义政权。中国革命人士过去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思想一度垂青,现在已完全丢掉了幻想。连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屠杀的国家,也承认他们打败了德国、奥地利、土耳其三个最专横伪善的帝国,这是中国没有过的经验。如果说,帝制和共和政体只不过是形式上的不同,被统治的人民照旧遭到无穷的欺骗、流血。那么,中国人就应问问自己,还有什么别的出路?能在哪里找到同盟军?

前面指出过,伟大的工人阶级领导人和思想家,马克思、列宁,对中国人民过去的斗争,早就表示过同情和理解。但在那个时期,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还无法向中国提出帮助。中国人民也还不理解他们表达的同情,想不到世界工人是反抗帝国主义资本剥削的盟友。

然而,到了1919年,情况就不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在中国的近邻找到一个具体实现的场所。中国人民能从苏联看到,工人阶级如何治理国家,从他们行动中,判断实验是否成功。

苏联的行动是明确无误的。当打了胜仗的协约国列强,又在阴谋恢复对中国的奴役时,是苏联政府第一个无条件废除了过去沙皇俄国从中国掠夺到的一切特权。把各项不平等条约得到的成果:治外法权、租界、赔款、“最惠国待遇”等勒索到的果实,通通废除。

不仅这样,中国人民还看到,邻邦俄罗斯的工人阶级,不但推翻了“他

们自己的”帝国主义政权，还以自家的力量，打败了各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部队。美国、英国、法国、日本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都站在一个阵营，德国是一个阵营，现在则通通纠集在一起，派遣部队到俄罗斯，企图粉碎苏维埃政权，大肆叫嚣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连中国的军阀政府也参加了反苏的干涉军。决心实现民族独立、争取进步的中国爱国人士，看清楚了一件事情。如果他们从前的敌人都站在一个队列，那么，站在他对面的一边必然是代表正义，正确的一边。他们也越来越可以断定，他们在国外的真正朋友，是工人和工人阶级。

当时，斯大林就中国人民第一次对这一历史事实在政治觉悟上的反应，指出过：俄罗斯胜利推翻资本主义已经“为反对世界帝国主义建立起一条新的阵线，这条阵线从西方的无产阶级，经过俄国的革命，延伸到东方的被压迫民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事件，显示了这一过程的开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事件，使这一过程更加明显。

的确，在第一次大战的日子里，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东方的革命，仍然属于资产阶级民主的性质，而并非社会主义。他们的对内使命是，在每个国家内消灭封建关系，当然它与 17、18、19 世纪欧洲的“古典”式的资产阶级革命，已有很大差异。他们追求的目标，使他们与帝国主义，即 20 世纪的世界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资本主义在前俄国这个帝国里，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打了胜仗，因而在欧洲，资本主义也受到劳动阶级社会主义力量的挑战。

因此，新的革命总是日益上升的社会主义的盟友，但在每个国家里，资产阶级都不能单独领导革命取代胜利。它注定要在帝国主义与本民族利益矛盾的跟前，越来越摇摆不定，它本身的阶级性格，又使它对劳动人民，怀着恐惧。这样的革命，要想把反封建、反帝国主义斗争取得完全胜利，只能依靠在政治上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领导农民和全国人民。取得胜利后，也不能建立资本主义的统治。它只能过度到下一个阶段，即建立社会主义。

这就是毛泽东指出的原理：

然而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自从 1914 年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和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在地球 1/6 的土地上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以来，起了一个变化。

在这以前，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之内的，是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在这以后，中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却改变为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在革命的阵线上说来，则属于新的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了。

中国革命新的领导现在已开始组成。全国爱国知识分子转而研究马克思

麦克纳尔 (McNair, H.F.) : 《现代中国史选读》，1927 年，上海版。

霍恩伯克 (Hornbeck, Stanley K.) : 《当代远东政治》，1916 年，纽约版。

主义思想，找到推动中国进步的方法。尤其具有最伟大历史意义的是，现在引进来的马克思主义，已经不是旧的社会党人和第二国际的工联主义者所奉行的还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而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它在俄罗斯被共产党人用来有效地清理了本国的帝国主义。毛泽东曾这样说过：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考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虽然人数不多，但他们在“五四”运动中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们提出“打倒帝国主义”口号，体现了新的思想。它和一部分人提出的，诸如“打倒凡尔赛和约”，显然显示了不同的水平。

正是在这个运动过程中，知识分子中的马克思主义者，跟自由主义者开始出现激烈的分化。自由主义者在“五四”运动中也起了作用，特别是在反对封建古典主义和文化改革方面。但这些人自命为文化精英，能取代老派官僚，并运用现代（即资产阶级）知识，担负起领导与“拯救”民族的重任。因此，当“落后而不学无术”的劳动群众（他们占民族的大多数）加入到斗争行列中来时，便跟反动政府一样，感到惊恐。这批人的主要代表是曾留学美国的胡适，他是詹姆斯（William James）和杜威（John Dewey）实验哲学的门徒。他不久就打了败仗，因为他号召青年人少谈些“主义”（即马克思主义），应该多研究些“问题”，即研究技术与资产阶级的社会学。

所以，从一开始，知识分子两大阵营从同样的不满于中国的衰弱落后出发，却得出不同的结论。自由主义者把群众的坚持己见看作是对“文明进步”的威胁。胡适连帝国主义的存在和封建阶级权力该不该反对，都采取否定态度。他只主张在“陈旧原始”思想与“科学的”、“有效率的”的思想方法之间选择一种。但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统治阶级和旧社会的上层建筑，都是进步的绊脚石。而群众才是主力，是推翻旧社会，带来进步的唯一力量。所以，李大钊教授，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回答胡适说，只有“主义”，才能找到“基本的解决办法”，没有主义，中国的“问题”一个也不能解决。

这场论战是具有历史重要性的。对知识分子，它提出了可供选择的两条道路。一条是，把自己知识供给被压迫群众，跟他们一起战斗，向他们学习，推翻压迫者，建立一个新中国。另一条是，作为压迫者的“忠诚的反对派”，从他们求得一官半职，从而有机会做点好事，让国家与群众依然处于困境。正如毛泽东后来说的：

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都

历史向霍恩伯克这种博学人物开玩笑。他在上述书中说，蔡锷的起义“可能 前景并不美妙”，但到书付印时，帝制连同袁都已完蛋。但霍恩伯克后来的 事业，并未受到他那反动近视症的影响。1930年，他作为外交家，帮助过蒋介石打天下。到50年代，又为蒋与台湾和韩国的李承晚拉关系。这说明帝国主义与反动派总是能凑在一起的。

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而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则比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识分子更广大和更觉悟。然而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胡适后来大半生用于讨好美国，在中国政权中担任一系列要职。人类事件的发展过程，早就决定了，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要想争取民族自由，在全世界处于帝国主义的时代里，通过无产阶级革命，用社会主义，独立发展资本主义，是不可能的。所以任何具有“现代思想”的人，如果只用发展资本主义，拒绝社会主义，其最终结局，只能成为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的帮凶。胡适晚年是台北政权的中央研究院院长，是统治旧中国最后一个半殖民地买办阶级的代表。

李大钊走的是革命道路。他死在敌人的绞刑架下，成为早期的革命烈士。他为中国知识分子主张的，和他协助创立的中国共产党制订的这条道路，最后得到大多数人的拥护，终于打败了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全体中国人民来说，这才是取得独立、力量与现代进步的正确道路。

即密克罗尼西亚群岛，包括马绍尔群岛，加罗林群岛与马里亚纳群岛（关岛 除外）。第二次大战后，这些群岛都归美国管理；美国早期爆炸核试验的比基尼与恩尼威托克，也位于马绍尔群岛之间。

第十二章

创建中国共产党：工人阶级领导 (1921—1923年)

“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者人数增长很快。在北京（李大钊等）、上海、汉口（董必武等）、长沙（以毛泽东为首）、济南、杭州都创建了共产主义小组，在海外留学生中（如巴黎的周恩来），也出现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组织。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建立党的组织。它把工人阶级及其利益作为基础，以马克思列宁的分析和远见卓识作为指导，从而把中国人民长期进行的自发的、组织不健全的斗争，转变成自觉的革命斗争。它为领导阶级建立起一个参谋总部，它对过去得失并不介意；相反，像一切国家一样，只把全部希望指向未来。

中国人民过去有过多次起义，虽然英勇壮烈，但由于缺乏这样的领导，都以失败告终。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起义，都因为纯粹是农民战争，未能成功。1911—1912年的中国资产阶级革命，也因为领导不力，而未奏效。好了，现在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终于起步了。它将领导革命，直到胜利；虽然这场革命进行了30年之久，全体人民经过巨大的一场场战役，才实现了斗争目标。

然而，与此同时，帝国主义者同样也在卷土重来。从大战结束带来的平衡局面，重新改组。它们运用新的联合，新的方法，展开了控制中国资源与中国人民的斗争。

在国际上，美国成了头号的帝国主义强国，它实力强大，强迫日本吐出它利用大战从中国吞并到的权益。它也强迫日本废止了英日盟约。1921年11月到1922年2月在华盛顿签订了《九国公约》，九国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胜利的一方。公约反映出由于列强间关系变化，有必要签订新的条约，恢复帝国主义各国联合控制中国的格局。

在《九国公约》中，美国、英国、日本、法国、意大利、荷兰、葡萄牙、比利时，向北京军阀政府又一次提出了臭名远扬的“中国门户开放”和“各国在华机会均等”原则。一般认为这是美国非常精巧的大手笔。它假装给中国一个“机会均等”的参加国待遇，却强迫中国“自动”承认各国侵入中国的权利，不像过去与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那样，只向一个外国开放，而是向许多国家，特别是美国开放，因为美国现在政治上、经济上、都是最强大的国家。

在这同时，美、英、法、日四国又组成一个新的财团，向中国投资。这清楚地表明，条约完全是世界金融资本的工具。财团由美国银行操纵，不像过去由英国操纵。美国的近期用意在于打进中国东北日本的势力范围。这个

地区对美帝国主义者来说，有着三重利益：东北是物产丰富、可供剥削地区，可以作为支配中国的基地，也可以作为反对苏维埃革命的军事重镇。

《九国公约》四国财团，外表都打着“国际协定”的幌子，却完全是个骗局。因为不久就被事实证明，在中国，每个帝国主义国家都在热切寻找听从自己的军阀，作为军事上控制全中国的帮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剩余军火，以及从战败国德国、奥国俘获的军火，潮水般运到中国，分给各国豢养的军阀。不久，就展开了军阀混战。

日本把军火运交它新选定的“中国强人”张作霖，他属于奉系头目。英国和美国同样把军火运给他们中意的雇佣军人、直隶的吴佩孚。其后几年间，这帮被收买的军阀混战不停，使地方大遭蹂躏，只是为了决定由哪个帝国主义者取得优势，来掠夺中国。

所以，在表面上，中国这时遭受列强瓜分的局面，似乎形势更加恶化。“五四”示威的群众抗议浪潮，暂时也得到平息。这是因为，运动原是为反对签署凡尔赛和约这一特定事件而进行的，并没有为中国革命提出一整套可操作的纲领。但就在报刊只热衷报道军阀成败的误导下，另一股重大的进展势头正在形成。即中国共产党开始组织工人阶级。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从下列一事实上可以看出来。即在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虽然只有 50 名党员，但它已成为劳动队伍中起领导作用的力量，而这是其他任何政党从来都未达到过的地位。在“五四”之后，是工人阶级对帝国主义第一次发起了巨大的战斗。

从一开始，中国工人阶级的群众运动就是既有政治性，又有经济性。因为完全缺乏民主权利，又遭受帝国主义，半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所以不可能产生合法的工联运动。在这种条件下，也不可能诞生收入高的熟练“工人贵族”，把运动引向修正主义的渠道。

1918 年，中国参加罢工人数只有 6000 人。1919 年，当时还没有工人阶级的政党，但铁路、冶金、机械、印刷、电车工人起来参加“五四”全国总罢工的已经达到 10 万人。1922 年，即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第二年，通过福利团体、俱乐部、夜校等渠道，党联系的工人已达到 30 万人。当年 1 月，在英帝国主义直接占领的香港，有 6 万名海员和码头工人要求增加工资，大罢工达 8 个星期。这次大罢工受到从华南的广州，到东北的沈阳铁路沿线工人的支援，他们筹集资金汇给罢工工人。这次罢工在结束之前，曾发展到引起部分香港工人的总罢工，英国驻军曾分派在中英边界，向工人开枪，还企图从香港撤走。这样，就暴露了帝国主义致命的弱点，没有工人供它剥削，它将一事无成。

罢工的成果还给人另外一个教训。过去的斗争，不管是中国农民自发的，还是资本家进行的，都没有从帝国主义者手中，得到丝毫让步。而香港

海员工人这次大罢工，却使资方被迫增加工资 15%—30%，工会还从过去被英方宣布为非法，变成法定组织。

1922 年中国其他各处也出现了罢工斗争。

工人要求工资足以糊口。在上海，当时熟练工人挣的工资不过每月 6 美元，非熟练工人只挣 4 美元，妇女儿童工资更低。

他们还要求实行 8—10 小时工作制。此前机器工业，工人每天工作长达 14—17 小时。

他们还争取组织工会的权利。而根据北京政府法律，组织工会和罢工都是非法的。

在许多工潮事件中，领导工人的大多是共产党员。1922 年，毛泽东被选为湖南省工会主席。接着长沙出现罢工，在邻近的江西安源煤矿，有两万矿工罢工。由刘少奇领导的这次罢工，意义特别重大。罢工使安源的煤不能外运，而当时由日本与中国官僚资本控制的汉冶萍公司，是当时最大的钢铁企业，全靠安源供应煤。这样，罢工便是对反动的军阀政府与帝国主义者的直接挑战，安源罢工不但组织坚强，把掌子面和各车间工人都团结起来，还对工人开办夜校，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教育。这种组织方式后来各地罢工运动都广泛采用。1926—1927 年北伐战争时期各地反军阀革命力量也采用过。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在白色恐怖中它也并未被粉碎，而是组织起武装工人纠察队，作为一个地下联络据点，为后来 1927 年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再后来为在井冈山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提供了支援。井冈山是中国工农红军在全中国创建工农政权的第一个据点。

早在 20 年代初期，中国工人队伍就显出了他们宁愿斗争牺牲，也不愿忍受处于缺乏最基本权利的、被压迫深渊的处境。他们既反对外国金融资本拼命压低工人工资，也反对中国军阀为了保持他们的“好处”、任意杀害工农群众。

阶级斗争的主要领域并不限于轻工业方面，虽然轻工业是民族资本家发达的部门。斗争主要在铁路、造船及其辅助的修理厂和矿山，这些是代表全中国的机器工业，也是帝国主义者靠勒索手段兴办起来的。正是在这种领域里，帝国主义才能主宰一切，并且和军阀的利益纠结在一起，也是在这个领域里，工人阶级才高度集中，可能开展全国范围的接触，统一行动。再说，这里的工人还能得到各方面的支援，包括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因为他们在交通与其他基本产业方面也受到外国控制。所有这些因素使他们和帝国主义发生强烈的冲突，这也表明，越来越多的爱国人士认识到，工人阶级在反对民族遭受奴役的斗争中，处于最前列地位。

一场不可避免的战斗在英方资本控制的京汉铁路展开。当时是北洋军阀吴佩孚管理这条铁路，铁路收入在支付外国股东之后，正好用于维持他的部队。

1922 年 8 月，北京近郊长辛店机车厂、汽车修配厂工人，在共产党员组

织的俱乐部和夜校里讨论要求实行 8 小时工作制，休息照发工资，提高工资等要求，后来得到胜利，于是工会决定 1923 年 2 月 1 日在河南省郑州举行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事前此事已在报刊公布并将通告送铁路局。

铁路局批准了工会要求，但暗地向吴佩孚报告，要他派兵封闭会场。代表们和当地铁路工人对当局背信弃义行为深为愤慨，冲进会场宣布总工会成立。但当天晚上军队就袭击会场，加以捣毁。工会于是号召举行全路总罢工，提出下列要求：

1. 将京汉路北段军阀任命的头头撤换，因为他违背诺言。并将郑州警察局长撤换；
2. 赔偿工会损失，归还没收的旗帜；
3. 为袭击事件正式道歉；
4. 对铁路员工节假日照发工资。

这次总罢工纪律既严明，又卓有成效。全线没有一次车在运行，但受阻乘客也未受罪，罢工委员会为他们安排食宿，邻近铁路的旅客改由其他交通工具运送。

工人阶级的力量震惊了美国、英国和其他各国外交代表，他们向北京政府联合提出照会，要求立即镇压罢工，托词是罢工危及了外国贷款的偿还能力，这条路是靠各国贷款修建的。

吴佩孚于是立刻派兵占领了总工会在汉口附近江岸的总部。铁路工人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所用武器则是从士兵手中夺过来的。被捕的人中有两个共产党员，一个是总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林祥谦，和它的法律顾问施洋。当局要求他下复工令，两人都宁死不屈，断然拒绝。林在当场被杀，施洋也在武昌牺牲。2 月 7 日，长辛店的工人被杀死 4 人，伤者也不少。

屠杀引起全国义愤。北京成千的人都走向街头参与遇害者的葬礼。全国四条路举行罢工，以示抗议。日本控制的汉冶萍钢铁厂与其它工厂工人也参加罢工，直到工会下令复工。

1923 年 2 月 7 日的大罢工，是 1919 年“五四”运动后中国革命斗争发展的又一个高峰。胡乔木在他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里，这样评价了“二七”斗争的教训：

中国铁路工人的英勇斗争，一方面，表示了工人阶级组织力量和革命积极性的迅速增长，因而大大提高了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政治威信；另一方面，也证明了工人阶级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同盟军，如果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就无法在毫无民主权利的条件下战胜全副武装的反动派。在反动政府的高压之下，年轻的工人斗争暂时转入了低潮。事实教训了党和工人阶级，必须与占全国人口 80% 的农民，与包括几千万人口的城市小资产阶级与要求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建立反帝反封建的同盟，并且必须用武装的革命来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

第十三章

建立革命统一战线 (1923—1925年)

在1922年7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中，已经指出必须组成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才能“消灭内战，打倒军阀，建立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统一中国，使它成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宣言虽然还有缺点，即没有强调由工人阶级领导革命，没有为无地少地的农民提出明确的土地纲领，但它仍然是迄今为止中国人民对斗争目标和远景的最明确说明。

一年以后，在为“二七”事件举行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又对建立革命的联盟作出了具体的步骤，它指出工人阶级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斗争中，并不孤立，也并不必要孤军作战。

农民，在军阀勒索和农产品价格下跌之下已陷绝境。1922年在华北许多地方纷纷爆发起义。由共产党员彭湃在广东组织的农会，会员有20万人，在南部开展斗争。

民族资本家在大战时期得到短暂复苏立后，又处于逆境。他们不仅遭受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的压迫，还受到1921年发生的战后世界性经济萧条影响，国内则由于军阀混战，国内市场也陷于崩溃。共产党因此号召建立联合战线，同国民党制订共同纲领。国民党当时鉴于民族资本家的处境，想找到出路，但却因从来未能和城乡劳动人民接上关系，所以收效不大。

同资产阶级建立联合行动的提出，是依据列宁的指示作出的。列宁指出，在帝国主义国家与殖民地或附属国家之间，革命的原则有根本的差别。在帝国主义国家，资产阶级是对本国和其他国家人民的压迫者；而在殖民地国家，有些资产阶级也遭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因此，列宁指出“在殖民地国家里，共产党人应该支持资产阶级的解放运动，但这种运动必须是真正的革命运动，而且他们的代表不能妨碍我们组织和教育农民和被剥削群众，发扬他们的革命精神。”

现在中国就存在这样的情况，因此出现了战斗的民族革命运动空前增长的局面。

这个时期的国民党，是由真正的爱国者孙中山领导的，他虽然有过许多估计不足的错误，却从来没有丧失过他的战斗精神，也没有忘记从事件中吸取教训。他早就了解，只有革命的武装斗争，才能消灭中国的武装军阀。但他却专心致志于找一支现代的部队，作为工具，即试图找到一个“比较爱国的军阀”，跟他联合。出于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他跟一些不可靠的人联合，

《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合订本，1476页）。

而忽视了 1919 年“五四”反帝群众运动的革命潜在力量。还有，他对帝国主义的本性，早就有过误解。他在《国际开发中国》一书中曾试图劝说外国资本家，认为要避免一次大战后带来的经济危机，他们应该跟统一的、主权国家的中国做生意，而不要通过政治统治瓜分它，消灭了这个市场。然而，在强大、有主权的中国出现以前，上述想法只能是痴人说梦。

出于对世界现实的错误理解，孙中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对外国列强劝说，被对方置之不理。他想依靠的“爱国”军阀陈炯明，又被英国收买，把孙中山驱逐出他的首都广州。而这个军阀叛徒，不久以前还被人大肆吹捧为“我在中国见到过的官员中，印象最深的一位：他很可能成为闻名全国的人物。”吹捧人就是西方自由主义的吹鼓手，哲学家杜威。

这位教授在当时的中国，即 1919 年“五四”运动后的中国，几乎成为青年心目中的“圣人”，他想把中国青年人刚刚升起的研究马克思主义（从此以后被人称为“过激主义”）的热情，引导到（对帝国主义说来）比较安全的，只进行行政教育改革的实验主义道路。

然而，孙中山却不是属于这个范畴的人。从一开始，他就钦佩俄罗斯的革命，从 1921 年后，他一直研究马克思主义来指导解决实际问题。他给苏联领导人写信说：“我对你们的事业，特别是你们苏维埃，你们军队，你们教育的组织工作，极感兴趣。像莫斯科一样，我愿把中华民国的基础，深深扎在年轻一代人的心头，他们是为明天劳动的人。”

1923 年，孙中山和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有过接触。他也和苏联派来的外交官越飞谈过话。越飞本是苏联派来想和帝国主义控制的北京政府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但没有被接待。中国共产党当时提出和孙合作的建议，孙认为合理可行。在这种影响下，孙中山对他的政纲和观点作了剧烈修改。他用极大热情宣传这些新思想，认为是使中国革命成功的钥匙，这是他毕生所追求的。

孙中山为国民党制订的“三大政策”是：联合苏俄，联合中国共产党，扶助工人和农民运动。孙在一系列讲演中重新阐释了他 20 年前提出的三民主义，他极大地加强了三民主义学说的革命特点，而这些是 1911 年辛亥革命后国民党玩弄议会花招时早已抛弃了的。

民族主义的内容，不再是以汉族（中国的主要民族）统治来取代清朝皇帝（满人）的统治，这种观念早已随时势推移而过时。新的内容是从一切形式的帝国主义控制中，解放出来，实现国内各民族完全平等。孙中山的另一个特色是，他毕生所奉行的，不但要从中国的民主传统中，还要从一切民族的民主传统中吸取营养。因此他的民族主义，总是与世界各国倡导国际间的和平与“宇宙和睦”的思潮联系在一起的。但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得有个最低的先决条件，即平等；这就是他痛恨，鄙视殖民主义的思想根源。关于帝国主义列强统治集团的本性，他曾这样写道：

《五四运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546 页）。

现代各国所谓民主制度，通常都被资产阶级垄断，变成压迫一般平民之工具。而

国民党的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而共有，非少数人们所得而私也。

孙中山从中得到的教训是只有团结一致，亚洲人民的独立运动才可能成功。在实现世界大同的伟大理想之前，还要完成艰巨的斗争任务。

民权主义重新阐释为：“现代各国民主制度，一般为资产阶级所专有，成为压迫人民的工具，而国民党的民权主义，则为一般人所公有，不许为少数人拥为私有。”

民生主义再一次强调实行“耕者有其田”满足农民愿望。承认工人有组织工会，要求增加工资的权利。私人资本不能操纵国民生计，有独占性企业，概由国家经营。孙中山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对马克思许多观点持异议），但他认为在革命斗争中马克思主义者是志同道合的人，他说“我们不能说共产主义与民生主义有冲突。”“并不，它是民生主义的朋友。我欢迎社会主义，因为它是为国家人民谋福利。社会公正要求一切产品归大家所有，确保人民得到福利，社会主义在我国得到实现，可以保证老有所养，人人都有工作。”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不是科学的社会主义。它没有说明各个阶级在社会中的地位，没有承认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然而，它代表了当时一般人能接受的普通纲领，它不为少数人谋福利；孙中山并不害怕民众，他的结论是，只有唤起民众，才能救中国。

孙中山的国民党随着共产党人加入而变成革命的联盟，虽然共产党仍然保留它自己的组织。它的新的性质在 1924 年 1 月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得到体现。宣言严格检查了国民党 1912 年以来（特别是将权力拱手送予袁世凯以来）的错误，它反对帝国主义的不平等条约。它保证工人有组织工会的权利，采用各种办法改善工人、农民的处境。它还强调士兵的人权和政治权利，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不但改善对革命军人的关系，影响还扩展到军阀部队中的 150 万军人，他们全都受着牛马般的对待。宣言的政治基础是孙中山重新制订的三大政策，以及对三民主义的重新阐释。孙中山对此进行了坚决的、不屈不挠的斗争。当有些国民党右翼分子反对和共产党的合作时，孙中山说，你们这是反对革命。据孙夫人宋庆龄回忆，他曾对那些人大声说：“你们如果不愿跟共产党人合作，我就宣布解散国民党，我和廖仲凯一起去加入共产党。”

新的革命政府在广州创办陆军军官学校（因位于黄埔岛，一般称为黄埔军校），为打倒军阀培训新型的军官。蒋介石任校长，周恩来任政治教官。军校的官兵曾经从课堂直接走上战场，平息反革命的广州“商团”叛乱。商团是由香港英方花钱组织起来的，英国驻广州总领事按照英第一任工党首相麦克唐纳的旨意行事，而这届工党政府的帝国主义本性，并不比它前任保守党、自由党逊色。总领事曾照会孙中山的政府说，如果炮兵攻击商团，将遭到英国舰队回击，有 9 艘军舰将炮口指向中国军舰，进行恫吓。

平息商团叛乱后，工会和农民运动更加发展，使广州成了全国的革命中心，一切有远见卓识满怀希望的人都云集广州，开展活动。

与此同时，反动的北京政府为了应付面临的革命风暴，也用蛊惑人心的花招为自己涂上一点民主的色彩。它安排一场“总统选举”，军阀曹锟从美国方面得到巨款，以5千银元一票的价钱，用于贿选国会议员。为了满足舆论要求，它最后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但这些花招并未能阻挡革命发展的势头，这说明广州的动静，已使华北军阀统治的心脏，受到了影响。

1924年10月，与帝国主义没有直接联系的“基督将军”冯玉祥，背叛吴佩孚，把国民军开进北京，赶走了贿选的军阀“总统”曹锟。这说明他用外国资金买来最高权力的这桩买卖，并不合算。

同时，冯玉祥还赶走了1911年辛亥革命以来留下的一个摊子，加以清除，即驱逐了一个赖在北京“紫禁城”里的小朝廷，退位皇帝溥仪，那是独裁者袁世凯以优待清廷逊位条件把他留下来的。溥仪先逃到荷兰大使馆，后又逃往天津日本租界。1931—32年日本占领东北后，又扶植他上台担任伪“满洲国”执政。

国民革命运动高潮，迫使北京政府建议举行一次国事会议，讨论中国和平统一问题。孙中山接受邀请，从广州北上，路途受到各地民众的热烈欢迎。然而，在到达北京以后，他发现北京统治者并不急于接受他的召开国民会议讨论中国新的政权体制问题。不久，孙就患病，1925年3月12日因肝癌恶化去世。这位伟大的、爱国的、革命民主派在临终前留下一份遗嘱，和给苏联中央执行委员的一封信。

他为国民党写的遗嘱是：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写给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信中，希望两国在争取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

他的致苏联遗书全文是：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中央执行委员会亲爱的同志：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藉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俾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为达

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谨以兄弟之谊祝你们平安！

孙逸仙（签字）

说到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将理论大战扩展到外交军事领域，加剧其分歧的，并不是中国。恰恰相反，正是中国一再宣布，只有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基础上讨论，政府间关系才能得到改善。正是中国，在疏远多年之后，主动提出，举行谈判，讨论边界和全面恢复关系正常化的问题。

1979年9月，中国代表团到达莫斯科，举行全面谈判时说：“我们期望达成积极的成果。这是中国人民，而且我相信，也是苏联人民的热切希望。”

需要克服的主要障碍，看来不仅仅是观点问题，而是苏联方面的霸权主义行为，诸如在中国边界大量驻军，通过邻近中国的第三国对中国施加军事压力问题。 —

第十四章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 (1925—1927年)

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的几个月里，中国越来越广大的各阶层人民都认识了孙总理对时局分析结论的正确性，即不推翻帝国主义与军阀统治，中华民族就无法生存下去。在国际方面，这一时期世界资本主义虽然没有推翻列宁在俄罗斯创建的苏维埃政权，但它终于把欧洲兴起的工人阶级战斗行动镇压下去。由于美国大企业及其政府指挥摇摇欲坠的资本主义势力，出资金支援各地的反动派，德国、匈牙利的革命都被制服，而法西斯却在意大利上台了。

1921—22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得到相对稳定。像过去那样，帝国主义总是梦想把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清除掉，但首先，它必须把东方，特别是中国的革命浪潮压下去。因此，中国的每一起国民运动，都成了帝国主义镇压的目标。

1925年2月到5月间，上海和青岛的日商纱厂爆发罢工，参加罢工者超过10万人。工人除提出经济方面要求，承认工会组织外，还包括“不许鞭打工人”，这可以想见当时工人的处境。罢工毫无例外要与公共租界与军阀政府警察发生冲突。但由于工人的顽强斗争，总算争取到一些改善条件的成果。

5月1日，在广州举行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全国51.4万工人派出代表与会。这时日本政府要求中国当局解散纺织业工会。同月，上海国棉七厂日方警卫枪杀工人顾正红（共产党员），还打伤多人。这场暴行以及其他类似的挑衅镇压事件，激起中国最大城市上海群众的极大义愤，上海本来就是中国工人最集中，而且也是帝国主义列强最集中的地方。

参加为受伤工人募捐运动的学生和民主知识分子还被投进监狱。上海公共租界的工部局当时局长是美国人费森登，他下令实行新闻检查以及其他镇压行动。镇压在5月30日达到高峰。当天，租界的英国巡捕头子埃弗森指挥的巡捕向近万名游行示威，要求释放被捕的人，停止干涉中国政局的群众开枪，打死13人，伤者不计其数。在1919年5月4日，1923年2月7日两次高潮之后，这是全国性觉醒的群众运动的第三次高潮。这次高潮是一切民主阶级、集团组成新的联盟，而且打上血腥的烙印。

帝国主义分子对这次惨案也进行装模作样的调查侦讯，而屠夫埃弗森却被定为无罪。英方法官高兰，是前香港殖民地的大法官，还有日本法官，两人都认定，“下令开枪是无可非议的。”美国法官约翰逊，原来也是殖民地官员，他发表一篇“精采的”，类似那个主持审判耶稣，并下令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犹太巡抚官彼拉多的名言：“当时如果有足够警力在现场，开

枪的事就可能不至于发生。由于警力不足，开枪就是不可避免的。”

惨案激起全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罢工浪潮日益扩展。因为学生走上街头示威游行，要求驱逐帝国主义，大中学都悉数关闭。全国还掀起不卖英日货品的浪潮，立即抵制两国商品。血腥冲突到处都在发生。在广州，抗议的示威群众遭到沙面租界英国军警的排枪扫射，当场击毙 52 人，重伤 170 人。这场屠杀发生在革命首都的外国飞地里，它更能说明中国收复被帝国主义掠夺去特权的必要性。

在英占领的殖民地香港，一场规模空前的省港大罢工，使香港陷于瘫痪状态长达 16 个月。外国军队在中国海岸登陆。像太平天国起义时期那样，许多外国干海盗勾当的人结成团伙。这是他们的本性，一些由各帝国主义国家的人组成了类似白俄流民的还乡团，打起了“上海法西斯蒂”旗号。当时，英国报纸《North China Herald》的主要撰稿人是美国人吉尔伯特。他是“法西斯蒂的吹鼓手”，他居然叫嚣对中国爱国人士可以援用“美国西部开发时斯林奇法官采用的私刑。”

由于省港大罢工影响，革命根据地广州一下子增加了 13 万来自香港的工人。不久即准备北伐，从事打倒军阀的军事斗争。军阀是帝国主义控制中国的主要工具。1925 年底，以英国为后台的陈炯明，被逐出广东省。从 1926 年 7 月开始，从广州出发的北伐军接连打胜仗，这是太平天国起义以来少有的局面，只用三个月，便于 9 月间攻克汉口。战无不胜的原因是所到之处都受到人民的支援，农民运动更在其中起了重大作用。毛泽东在湖南开展农民运动，1927 年初农会会员从 200 万人，4 月间便激增到 500 万人。

由于战争都在远离海岸的内地进行，所以跟几个帝国主义大国没有构成直接冲突。但英国军舰于 1926 年 9 月 5 日，轰击了长江上游万县手无寸铁的居民。英国军队还向当时革命政府所在地汉口庆祝光复的游行群众开枪，汉口工人便于 1927 年 1 月 4 日夺回了汉口市的英国租界。革命政府便正式要求英国归还租界。英国面对着革命浪潮的形势，不得不玩弄花招，同意了中国的要求。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这是中国人民首次收回了位于自己土地上的外国领地。

1927 年 1 月 1 日，革命的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到武汉。与此同时，一些地方军阀也宣布赞同革命，其中有“基督将军”冯玉祥，他的部队位于中国西北部，他们早就同民族资本家同广州有过联系。他们部队中也有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有些军阀则暂时观望，不急于冒进，追赶高潮，希望有机会还能恢复旧秩序。

这种形势使联合战线的任务在军事方面有所减轻。但从政治上说，那些观望不前的军阀，说明不可靠分子渗入革命队伍的危险。在 1926 年 12 月到

1927年1月宣布效忠革命派的56位将军中，估计有51位是地主出身，他们拥有财产比一般农民家庭高250倍，这些将军的部队驻扎区域在安徽、河南、湖北、湖南、江西、福建等省，他们的财产也都在这些省内。

以1927年初，国民党人数，由于共产党员和工人农民大量加入，增加到500万人。共产党则从1925年“五卅”惨案的900人，增长到5.7万人。工会会员近300万人，农会会员近1000万人。

胜利已经在望，随之出现了一个问题：由谁来收获这些成果？是由工人阶级帮助广大农民群众完成他们的目标，从而将全国绝大多数人动员起来，共享胜利果实？还是由联合战线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贯彻始终，建立起民主共和国，然后进而过渡到社会主义？

或者，由代表大资本家、买办阶层、地主的政客取得政府与军队的控制权，把工农群众撇在一旁（因为利用他们的目标已经达成），再同帝国主义达成新的妥协？

共产党当时的领导者没有采取适当步骤去走第一条道路。它也并不充分意识到第二条道路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以总司令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内那些与封建、买办、或大资本家有勾结的人，开始认为群众运动不必害怕。许多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已经证明，这种人只愿意同群众运动合作一阵子，他们的合作还是“一个骑马的人跟他的马那样类型的合作”。他们并不愿望人民的胜利。他们只愿骑在人民背上掌权。在中国，这种趋势早在1926年春天就已非常明显。即在北伐开始之前，蒋介石已派兵将省港大罢工委员会广州总部包围起来，执行他的命令，以虚构的罪名逮捕或驱逐陆海军中的共产党员，从而在部队确立自己的绝对统治地位。他还暗杀了国民党进步人士领袖廖仲恺，认为廖是他实现独裁统治的绊脚石。

在1925—1927年革命中，资产阶级底子还脆弱，优柔寡断，而人民运动则处于高潮时期。因此，这种事态的发展本来可以减弱或者可能避免。然而，由于共产党本身还弱小、缺乏经验，最糟的还是，它的领导人是右倾机会主义者陈独秀，陈便向反动派投降。

中国各个阶级组成的联合阵线本来就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其形式在1924—1927年表现为与国民党联盟合作），这是一条动员最广泛力量反对两大敌人的正确路线。但这个联合阵线必须由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来真正领导，才能赢得民主革命胜利，为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打下基础。还有，工人阶级必须是联合阵线的核心，由它来跟农民建立最牢固的同盟。党还须在它自己领导下，建立革命的军队，积极保证联合阵线的全部军队的革命性永不改变。除此之外，革命的未来是不能确保的。

然而，陈独秀却由于急于消除国民党内右翼资本家和半封建分子的恐惧，并没有这样办。相反，他居然利用他在党内的权威地位，让革命军已攻克的地区的工人农民停止活动，放弃了自己的革命口号。他完全不理睬毛泽东等人坚持的，巩固工人农民相互支援作为整个联合阵线中坚力量的建议。

他忽视农民的态度更是致命的错误。在当时，农民占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九，而农村劳动人民在一切国家都是城市工人的主要盟友。产业工人曾是主要领导力量，但数量上，即使加上他们家属，也不过占人口的1%—2%。再说，只有农民才能推翻中国的封建主义，而中国的封建主义正是帝国主义所倚仗的基石，所以，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中，农民是取得胜利的主力。不动员，不武装农民，领导他们全力斗争，就意味革命终将失败，另外，没有取得无产阶级对革命军队的领导权。当部队受到国民党右翼分子的抱怨或攻击时，陈独秀甚至下令屈服。这样的屈服当然意味着，革命工人本来人数就不多，缺少占人口多数力量的支持，当帝国主义者和国内剥削者挥起屠刀时，自然处于无法防卫的地位。

因此，当革命部队胜利抵达沿海帝国主义的强大堡垒时，右倾机会主义者于1925—1927年革命失败播下种子。这使反革命阶级不是从外部而是正好从革命阵营内部找到它们重新上台的机会。当时以美英两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政府，特别关注着这种发展势头。军阀反动统治，像辛亥革命时期的清王朝一样土崩瓦解了，而且外国列强也清楚，只有两种办法能堵住这股浪潮：一是外国列强全力投入一场大规模战争，或者像过去选中袁世凯那样，找到一位新的卖国贼来颠覆这场革命。而外国直接军事进攻是一项冒险行动，谁也看不到要付出多大代价，得到什么后果。再说，帝国主义者还害怕，这样干涉不但在中国要大战一场，还可能引发殖民世界里爆发新的起义，在本国国内也将遭到民主与工人阶级舆论的谴责。例如在英国，当时就发生过罢工，工人提出“不许干涉中国”的口号。这种事也可能在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内出现。所以，他们只能采取用阴谋诡计，即外国军队只须用来威胁中国人民，作为在中国扶植一场新的反革命的盾牌。何况，中国共产党的机会主义分子也正在阻止群众运动的发展，这就为采用这种手法打下基础。

当汉口租界被收回以后，英国外交界还装出一副和善面孔，它是想用可能“和平妥协”的幌子来讨好国民党中的右翼分子。例如，当时上海的半官方英文报纸《字林西报》，原来把蒋介石骂的狗血淋头，说蒋是“赤色匪徒”。现在一变而声明“新的政府会在英国找到朋友”，但要它能“维持法律秩序，管制好暴徒”。

华盛顿方面，它早就通过派传教士，为留美学生提供奖学金，在中国设立受美国指使的传媒机构等办法，大力向国民党集团内美国可能找到的“朋友”，传出妥协的信号。

当北伐军队攻占南京时候，曾经有几个外国人死伤，1927年3月24日，美、英、法、意四国在向中国提出最后通牒后，英、美军舰借口保护侨民，猛烈炮轰南京。这两件事都意在要蒋介石以及右派，在支持或反对帝国主义问题上，迅速作出选择。的确，当时英国外相张伯伦爵士，后来就曾在英国

《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报告》，1920年7月26日。

下院内吹嘘说，此举的目的是“协助保守派反对过激党。”

几乎与此同时，上海这座大城市也从军阀手中解放出来，但解放者并不是蒋介石的部队，而是以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总理的周恩来为首的上海工人。他们从总罢工转为武装起义，前后经过三次起义，第一次在1925年末，当时因为准备不充分，未能成功。第二次起义在1927年2月底，参加人数达30万人，但也因条件不成熟，也失败了。孙传芳的军阀部队，曾将被捕杀的共产党人的几颗头颅挂在电线杆上，以此来吓唬人民。然而，群众运动持续高涨。3月28日，又宣布总罢工，参加人数达80万人。经过30多小时激战，终于击溃了北洋军阀在上海的驻军。

早就与帝国主义密切勾结的上海银行家、买办，对中国实业家感到担心。后者不愿参加刚刚成立的革命政府。而取得胜利的工人准备欢迎国民革命军，为此，银行界派密使去见蒋介石。他们要求蒋进驻上海，摧毁工人纠察队。他们允诺给蒋几百万元的财政资助。如果进驻，还可得公共租界与法租界英美军队保持亲切的中立。蒋和英美操纵的“公共租界”美方主席费森登，法租界当局，和鸦片帮头子杜月笙等暴徒订立协定，杜月笙得到5000支手枪和其他装备。虽然不平等条约规定持有武器的中国人不得进入外国人控制的租界。杜月笙的打手不但可以通过租界，还有卡车护送。这样，工人纠察队就从后面受到突然袭击。

1927年4月12日，是一个臭名远扬的日子，蒋介石派他的部队进攻工人纠察队，工人死伤几千人，而正是纠察队为他扫清了军阀驻军，才能进入上海。蒋还秘密下令他指挥的国民党右翼军队在南京、广州等地进行类似的大屠杀，乡村农民也遭到毒手。这次事件后，为南京3月24日事件外国提出的最后通牒，再也没有人谈到了。从此以后，这位卖国贼和屠杀人民的屠夫，在全世界资产阶级报刊中，蒋成了一位“英雄”。

1927年4月18日，紧跟这一连串大屠杀之后，蒋在南京成立了他自己的“国民政府”，全由国民党右翼政客、军人组成。这对武汉的国民革命政府，是一种篡夺和背叛行为。从这次背信弃义，叛变革命“四·一二”大屠杀后，蒋介石集团便从帝国主义者，杜月笙鸦片黑帮，以及非法的南京政权手中，得到他自称的“正统的中国政府的权利。”

蒋叛变革命后，武汉国民政府里的革命政治联盟存在了三个月之久，其成员是代表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左派”，代表工人农民的共产党人。武汉政府要求罢免蒋介石，蒋的对策是从经济上封锁武汉。在这段时期，武汉和它控制的湖北、湖南、江西三省，群众运动重新高涨。工人纷纷加入工会，农民到处组成新农会。他们都要求拿起武器，斗志昂扬。然而，就在这1925—1927年革命的第二阶段里，灾难的种子并未停止萌发。

杜威 (Dewey, John) : 《中国、日本和美国》，1921年，纽约新共和印本，书中作者又称赞陈炯明“是为人正直、特立独行，忠诚无比的人物。”但不知是对谁忠诚？

武汉政府的国民党左派政客，其中以左派头目出现的是汪精卫，开始摇摆不定，想在夹缝中“找到出路”。他们想方设法既要反对蒋介石，又要依靠一些军官力图控制局势，限制工农运动，他们最担心的是武装劳动人民。

在共产党内，陈独秀等右翼分子仍然控制着党的政策。虽然蒋介石叛变后不久举行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曾经指出了党的错误是没有深化革命的社会内容，而机会主义者也接受这项批评，但党中央领导并未换人。毛泽东刚刚在湖南组织农民取得很大成功，他就主张党必须带领反对地主的农民运动和武装农民，以贫农和雇农为核心。他目击了觉醒农民的力量，要求废除对农民运动的一切限制，对他们，以及他们的重要性深信不疑。

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取舍。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

毛泽东的预言，从中国革命最后的发展来看，是完全正确的。但当时党的领导并未选择毛指出的道路，事实上，五次大会上他还没有选举权。陈独秀仍然害怕惊动了资产阶级，宁愿选择共产党的另一个右翼分子谭平三，当时他任武汉政府农业部长，他就全力制止农民组织的浪潮。党也没有在部队中配备足够的政治素质优良的干部，在任何革命中，这都是不可原谅的疏忽。

出于这些错误的结果，使武汉部队中的投机分子和反动派都走上蒋介石的道路。从1927年5月底开始，他们开始解散各地农会，特别是湖南省内农会，屠杀农会领袖与积极分子。5月6月间，开始有人倒向蒋的一边，其中有冯玉祥。7月15日，当36艘外国军舰获准驶入汉口停泊时，汪精卫为首的“左派”开始屠杀工人、农民、学生、特别是共产党员。汪精卫大屠杀的规模，甚至比蒋在上海清党杀的人还多。当地反动派痛恨群众运动，想给他们教训，以至于在大街上滥杀成千的人力车夫，罪名只因为在革命中他们胆敢组织工会。敢于剪短头发的女学生，也可以处死；因为剪掉长发，就是她们不守传统秩序的“证据”。

武汉政府就这样消失了。一切权力都归于蒋介石在南京的“国民”政权。国民党领导人背叛了孙中山的全部遗志。他指示的争取民族独立，变成了跟帝国主义通同一气。他指示要扶助工人农民，变成了杀害工人农民。他主张联合共产党人，变成了屠杀共产党人，谁参加共产党，就要被处死。他主张联合苏联，变成了对苏联满怀阶级仇恨。在国民党领导层中，唯有孙夫人宋庆龄和少数人还毫不动摇遵从孙中山遗教。因此，他们只好流亡出走。

蒋介石取得最高权力后，他跟清朝统治者、袁世凯、以及其他军阀扮演

这些障碍后来也同苏联在平等基础上通过谈判，得到解决。

同一种角色。即成了帝国主义者盟友和工具，反对中国人民。他和他们政党现在成了城市买办和农村封建反动势力的政治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太软弱，没有取得政权。恰恰相反，像过去处于帝国主义与反动派联合统治下一样，政治上、经济上都处于绝境。

其他事件也和辛亥革命后情况类似，即帝国主义找到一位可以接受的“强人”后，新的政府立即得到西方列强承认：美国又一次成了带头承认的国家。不错，即使在资本主义的国际大家庭里，对革命政府取得形式法定的承认，道路也是漫长的。所谓“形式”，是因为即使给予正式承认，这个革命的政府仍然可以被“合法”推翻。然而，对反革命的政府，承认的道路可以非常短。有时候，当政府还未搭好权力分配的框架时，已经得到外国的“承认”

鉴于后来许多人企图把卖国贼打扮成“民主人士”。引述某些外国机构代言人的意见，是有启发意义的。当蒋介石还在被人吹捧时，美国前参议员史注恩，曾经在讨论中国关税的一次国际会议上，他作为美方代表说：“中国需要一位墨索里尼，”美国的格里斯沃尔德教授，写过一本研究美国远东政策的书，后来成了美国大学的标准教本，他露骨地说，蒋夺取了国民党统治权后，“他转化成一位法西斯独裁者。”

博格（Borg, De rothy）：《美国政策与中国革命，1925—1928年》，1947年，纽约版。

第十五章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 (1927—1937年)

1925—1927年革命失败以后，随之而来的是一场漫长的、一片腥风血雨的白色恐怖。蒋介石集团想迎合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的利益，扭转历史的车轮。官僚资本主义是一小撮国民党高级官员，其中蒋本人也在其内，因为蒋在上台之后，通过他们的国家机器，也在各个经济部门，建立了个人或家族的专利控制。为达到扭转革命大潮的目的，单在1927—1929年间，蒋就屠杀了共产党人、工人、农民、学生、民主派知识分子估计45万人。正如当时叛徒汪精卫公开声明的原则，“宁肯错杀一千，决不放过一个共产党人。”各大城市租界当局，也在这次大屠杀中，与反动派通同一气。他们把管界内的进步分子抓起来，把他们送交蒋的屠夫。这种勾当几乎无人不知，只是最近才在《为上海当警察：1927—1937》一书中，被美国学者威肯纳详细作了报道。这本书1995年由加州大学出版社印行。可以估计，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殖民地统治时期的类似资料，还将陆续问世。

但这只是一个侧面。另一个方面则是，中国革命的洪流变成一个浩瀚的，风涛澎湃的，席卷整个社会的海洋。这海洋虽然有涨潮，也有低潮，但其势头是不可阻挡的。在伟大群众斗争第一个回合失败之后，资产阶级当了逃兵，中国人民的民主革命，则变成由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绝对领导。正如毛泽东10多年后指出的：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和其他革命阶级进一步又采取一个决定性行动，即领导组建起自己的部队。那一天，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等在江西省的南昌组织了3万人的军队，同反革命派作战。因为这次武装起义为红军，即现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奠定基础，因此这一天被定为建军节。

8月7日，共产党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清算了机会主义分子陈独秀，撤消了他的领导权。会议还确定革命军队必须由党领导。还指出土地问题对革命至关重要，党的责任是领导农民，拿起武器，没收地主土地交给农民。毛泽东在湖南、江西省执行这些决议。他指导了两省的秋收起义。在湖北、广东也有暴动，组织工人、农民、士兵组成新军，同反动派展开斗争。

几个月之后，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的部队在江西省井冈山地区会师。在这里建立起第一个有革命政权的农村根据地，向最后取得人民胜利前进了一步。以后两年内，在中国东部，中部、南部、西部与西北部先后建立起19个根据地。后来又在江西瑞金成立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从此以后，中国有许多地区都建成了由共产党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民主政府，成为今天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先行者。此时共产党虽遭到摧残，人数减少了些，但它依然满怀信心，拿起武器，勇敢进行土地改革，高举革命政权的大旗。所有这些根据地，当时都不过是很小的规模，但它却指向一条伟大的历史道路。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这就是为期 10 年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时的情景。这是一场由工人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在战争过程中，这两个阶级联合起来，占了中国人民的绝大多数，这种联合是牢牢地坚持下来了。

在这种新形势面前，党在政策上也犯一些新的错误，后来才得到纠正，使正确政策巩固下来。这些错误延续了好多年，主要是“左倾”错误。中国共产党内一部分人，出于对最近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客在白色恐怖叛变行为的愤怒，忘记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并未改变，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仍然是革命打击的目标。这就使他们在根据地采取打击富农、小资本家的政策，而这样的政策只能在取得全国政权，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才能推行的，某些政策则是直到那个时期也不宜采用的。他们对待联合阵线中的非共产党人，采取了消极的宗派主义态度，因而毫无必要的把工人阶级孤立起来。他们并不理解陈独秀的，以解散群众武装来讨好资产阶级，结果导致革命失败的投降主义路线，与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支持的，为武装斗争服务的联合阵线的区别。而后者才是领导革命成功的主要保证。

“左倾分子”也不耐心在农村建立新的力量，认为这样干进展太慢，而主张把刚刚组建的红军过早地投入进攻中心城市。他们可悲地低估了新建立的帝国主义者与蒋介石联盟的力量。这些轻率起义最后都以失败告终，它不但在军事上损失严重，还使这些工业城市党的力量和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力量大为减弱。

陈独秀类型的右倾机会主义，与继之而起的瞿秋白、李立三在 1927—1930 年和王明在 1931—1934 年的“左倾”领导，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对中国人民中的大多数人，即农民的革命潜在力量，缺乏信心。从表面上看，他们对事物的反应是极其不同的。陈害怕斗争，只相信在上层政治策略上稍加改良。对比之下瞿秋白、李立三则希望对一切人，包括可能的盟友，可能的明天的敌人，以及今天真正的敌人，展开斗争。虽然如此，这两派人在具有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与主观主义方面，都是对孪生兄弟，因而都招致于革命的失败。列宁早就指出过，在俄罗斯革命运动的早期，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即职业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与主张只进行经济斗争的工联主义者为一方，与似乎“极端革命的”恐怖主义者为一方。还出现过这样的事实，即今天的恐怖主义者，明天又常常变成改良主义者。

在中国，具体情况又有所不同，即将革命引向胜利的路线是逐渐发展，经过对右倾投降主义与“左倾”冒险主义的斗争考验的。这是一条人民战争的路线，这条路线由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坚持各种形式的斗争达 20 年之久，才达到了毛泽东指出的：

因为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反动同盟军，总是长期地占据着中国的中心城市，如果革命的队伍不愿意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妥协，而要坚持地奋斗下去，如果革命的队伍要准备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并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和强大的敌人作决定胜负的战斗，那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藉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藉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

每个共产党员须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下一个革命过程。

很显然，中国革命还处于第一个阶段。因此，党开始寻求跟一切反帝反封建的集团以及其他可能的盟友合作的办法，来反对共同的敌人。在日本侵略中国以后的年代里，当日本成为对中国民族生存，也是对太平洋地区其他主要帝国主义列强利益的主要威胁时，党就采取了对蒋介石这帮大资产阶级也加以联合的政策，以此来抗击日本侵略者，哪怕蒋是围着美国、英国转的人。

一方面，必要的时候对他们在社会政策上作些让步。另一方面，从而也避免了重演 1927 年被叛卖的那种大灾难。这是因为，革命力量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军队和根据地，他们成为联合阵线的核心和最活跃的力量。因此，没有一个想抛开这个阵线的集团，能把中国共产党孤立起来。它只能把自己孤立起来，得不到人民的好感和支持。

所有这些都后来形势发展中得到证明。与此同时，反动的国民党政权，也证明它完全不能解决中国的任何问题，在每个节骨眼上暴露了它的本来面目。

蒋介石曾经许诺要“统一国家”，但他不久就跟其他新军阀混战不息。他描绘自己“反对不平等条约”，但他在这方面没有做过一件反帝的事情。相反，在 1927 年底，他的部队谋杀了苏联驻广州领事馆官员，而苏联是宣布废除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唯一的国家。这件事情的发生，正巧跟在北京掌权的老牌军阀张作霖一样，他在与西方外交团与日本的共谋之下，袭击了北京的苏联大使馆，而“使馆区”向来是享有豁免权的。蒋介石的英美主子，正如张作霖的日本主子一样，总想破坏中苏之间的外交关系。

然而，帝国主义列强同中国新军阀一样，他们彼此之间也在凶狠地互相火并。日本决不让美英的宠儿蒋介石，接收他们在华北的势力范围。1928 年，日本派兵进入山东济南，杀害了蒋介石北伐军派去交涉的特派员蔡公时。但号称“国民革命军”的蒋介石，对日本大规模入侵杀害中国军民，既不加抵

鲍威尔 (Powell, John B.) 《我在中国二十五年》(My Twenty Five Years in China), 1943 年, 纽约版。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 合订本, 13 页)。

抗，又不诉请中国人民的支援，而是自己跑到东京，卑躬屈节地向日本军事法西斯的黑社会头子解释说，日本把蒋看成危害日本利益的人，是一场误会。在这次拜会中，他得到日本极端反动黑龙会头子头山满的赏识，而此人是主张日本入侵中国东北、蒙古以及苏联远东的狂热鼓吹者。

蒋心甘情愿向一切帝国主义主子公平效劳，不久就非常明显。他在扼杀1925—27年的中国革命后，在欧洲亚洲曾于1917年十月革命后，掀起了一股反苏浪潮，是由各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参加的干涉行动。1929年，中国部队也进攻苏联边境，夺取了苏联修建的中东铁路的管辖权。这条铁路是沙俄修建的，一直是俄国进行治外法权式管理的中心，由俄国军队守卫。正像由美国管理的巴拿马运河区，和英国管理的苏彝士运河区一样，说明帝国主义列强的花招，也有许多共同之处。十月革命之后，中东路由西方列强与日本共同管理。

除了协助经营沙俄在中国一些破产的产业外，还用以作为进攻列宁领导的无产阶级新政权的基地。此项企图失败后，根据苏俄与当时北京政府签订的条约，中东路仍是苏联的产业，但一切治外法权废止后，由中国收回主权。1929年收回中东路，逮捕大批苏联铁路员工，袭击边境，此正当苏联开始进行实现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机发生的。它是国际反动派阻挠社会主义事业的行动，随之还大肆宣传“对中国的赤色侵略”。

中国共产党坚决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恪守阶级与爱国主义的职责，向中国人民果断地驳斥敌人为了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利益，阴谋把中国对其朋友，世界上唯一一个工人农民统治的国家作战的企图。

苏联红军立刻重建它原来的管理权，而没有对中国要求赔款或罚金。这样，苏联就尽到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本分，向中国人民展示，不让他们受到反动统治者行为造成的伤害。同时，它也表明，它不会让帝国主义的仆人为所欲为。

两年之后，中国人民就尝到了1927年蒋背叛革命，从1929年起，将中国的军队用于为国内外反动派效力所带来的苦果。1931年9月18日，日本利用西方列强忙于应付世界性经济危机的机会，入侵中国，占领了东北三省。这些省人口共4千万，是中国工业最发达地区，从此被日本鲸吞。过去连封建王朝对此也曾起而抵抗，但蒋介石未派一兵一卒支援地方部队，还命令他们不得抵抗。其后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为止，东北的抗战都由人民的游击部队担任，其领导者为共产党人。

这段时期蒋作出唯一一次“抗日”姿态是，向国际联盟申诉。国联派来了李顿率领的调查团。该团提出的报告却把日本明目张胆地侵略中国事件，编出一个奇妙的结论说“这次冲突的起因，并不如一般人想象的那样单纯。”

博格(Borg, Dorothy)《美国政策与中国革命 1925—1928年》(American Policy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47年，纽约版，355页。

写得如此克制的理由是，西方列强并不喜欢日本掠夺中国的领土，但既然受害者仍然只是中国，他们就并不介怀了，特别是占领的地区邻近苏联边境，他们就可以指望，日本进一步冒险，必然是指向苏联。

1932年1月日本进攻上海时，蒋并不给英勇抵抗的十九路军以任何援助。因为十九路军并非他的嫡系部队，所以宁愿看着他们被敌军击溃。淞沪战争结束后，蒋接受一个屈辱的停战协定。为这次停战协定调停的是，墨索里尼的女婿齐亚诺，当时是意大利驻上海的总领事，后出任法西斯意大利外交部长。

在国内，尽管当时帝国主义之间冲突，已经发展到世界性的规模，然而蒋主要关心的，还是“围剿”、消灭中国工农红军。但这支红军现在是在远离帝国主义据点的中心城市、铁路、大河的内地，打一场人民的游击战争。它打到哪里，都实行毛泽东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它打到哪里，农民就能从封建地主手中夺回土地，组织自己的政权。它不但是一支军队，还承担有教育与组织人民的任务。在1930—1934年间红军打败了蒋介石百万军队的四次“围剿”。蒋介石的部队不但被大批击溃，还纷纷叛逃，因为他们也来自农民，还有些爱国军官也向红军投诚。

红军由于广泛开展的政治工作，和人民联系的紧密，向敌军官兵进行的瓦解工作，而使战斗力大大加强了。它保证了一切行动都不违背为之战斗的原则。特别重要的是把党支部建在连队上，即深入到部队的最低层。正如毛泽东后来总结的：“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是枪指挥党。”

旧式军队中那种威吓欺侮的办法是不允许的。要特别强调，官兵关系是阶级兄弟之间的关系。以服从命令这条来说，这既包括了军事民主（官兵一起讨论每次作战方案，和战斗总结）、经济民主（士兵参加管理伙食账目）。这不是单纯的民主原则，而是动员全体官兵主动性，去实现战争目标，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

基于上述道理，证明红军的战斗力数倍于它的人员数量。

由于帝国主义者武器充足，蒋便倒向了他们一边。蒋聘请德国法西斯军官组成他的军事顾问团，为首的是臭名远扬的塞克特将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是德国暗中重振军备的组织者。还有福开森将军，后来充任希特勒占领比利时的总督。然而后来在与中国共产党的部队作战中，这些“雄才大略”的将军，证明他们那一套思路并不管用。蒋的空军，是由美国的陈纳德将军组织和训练的，以罗蒂将军为首的意大利法西斯空军团，曾经轰炸成百的村庄，杀害大量的农民，然而在一场人民战争中，这帮人的业绩，证明其军事价值微乎其微。

因此，国民党想消灭红军，却连吃败仗。另一方面，中国红军军力还不

格里斯沃尔德（Griswold, A, Whitney）：《美国远东政策》1938年，纽约版，382页。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合订本，629页）。

够强大，不能攻占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革命根据地依然处于被包围状态。

在国际方面，罗马—柏林轴心开始形成，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都想利用蒋打内战，建立他们在中国的影响，准备将来争夺世界霸权时有这筹码。德国人更深入到国民党的军队和警察组织：例如纳粹军官斯滕内斯（Walter Stennes）大尉成了蒋的保安队指挥官和私人情报队头子。以意大利资本建起中意航空工厂。前意大利财政部长斯特凡尼，成了蒋的经济顾问，他制订计划，收买了中国内河最大的航运企业，组成招商局。墨索里尼的一位高级官员说过，“有了这个中国船队，就有办法取得政治上，可能是领土上，取得让步。”意大利的空军设施，成为进攻江西，福建两省的基地。

蒋完全不顾本国的利益，可以从他对待轴心国野心的态度看出来。在法西斯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密切合作（日本正在进攻中国）后，蒋仍然保留了两国的军事顾问团。他明明知道，纳粹法西斯军官正在把最敏感的军事形势的情报，转手交给日本。

至于美国和英国呢，虽然日本不让两国和中国东北做生意，甚至敢于向两国在上海的势力范围挑战，但仍然没有放弃对上海的包围。

美国曾经宣布它希望“门户开放政策”得到尊重。美国为了充当“中国朋友”的角色，它口头上谴责日本的侵华行为，但实际对日本增加了出口石油和废钢铁。这类出口物资恰恰为日本提供原料，没有这类原料日本战争机器是运转不起来的。

英国政府这时也感到，它的目前损失，在日本“给中国以教训”这点上，得到补偿。英国外相西蒙爵士曾极力阻止国际联盟反对日本侵略的议案，而又假装表示同情中国，实际上则一再让日本继续进攻中国。英国一位内阁成员艾默里，用典型的保守党腔调说，“谁能说日本不该为保护它自身利益而采取那样的行动，它是在保卫自己反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我们如果谴责日本，我们在印度的全部政策，在埃及的全部政策，都该受到谴责。”

至于英国和美国的显要集团则仍然认为，日本如果没有得到华尔街与伦敦银行的支援，它不能独自消化从征服中国得到果实，因此，美英也可分享到利润。他们的心里还时时有这样的念头，即日本在中国东北的部队邻近苏联边境，早晚会同苏联打战。

还是那位艾默里写道：“既然我们的政策，或美国的政策，都不在于引发日本和苏联的争端，那我们就不用关心，如果他们的争端导致开战，阻止日本在东西伯利亚的扩张。”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合订本，646页）。

最初，日本试图独自管理，不久，便由美国史蒂文斯为首的“联合铁路管理局”代管。当时，它是美国和日本部队策划入侵西伯利亚，支援白俄军匪帮的机关。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1928年毛泽东在井冈山时开始制定的，它实行多年，经过多次修订，但内容

美国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美国和英国整顿蒋介石的金融实力，都属于一种再保险性质。再说，蒋的金融实力加强了，也可使他更加下力气进行反人民的内战。

在国际舞台上，唯一反对日本和其他法西斯侵略行为的国家是苏联。苏联维护中国权利的表现，使得国民党长期不和苏联建交，无法向人民交代。1932 年底，莫斯科和南京终于建立了外交关系。

与此同时，国民党更加起劲地打内战，对日本则节节让步。但全国要求抗日的势头也开始高涨。1931 年和 1932 年，尽管遭到镇压、逮捕，大学生游行请愿运动仍持续高涨。不满蒋政策的人还扩展到军界。“基督将军”冯玉祥，以及吉鸿昌等，都在察哈尔省抗击日军。不过这场抗日行动没有坚持多久，因为不仅得不到蒋的支援，反而被从背后开刀而失败。吉鸿昌将军在天津法租界被警察逮捕，送交国民党，后被处死。

1933 年，在上海抗击日军侵略的十九路军，后来不愿与红军作战，在福州建立一个既反蒋，又反日的人民政府，但不久被蒋讨平。

1934 年 10 月，由于王明路线的“左倾”政治错误，从原来以运动战游击为主的正确政策，改而采取阵地战，红军不得不在强大的敌军压力下，离开了江西、福建的中央根据地。连同其他地区红军一起，开始了伟大的长征。这次进军长达一年，行程两万里。在战争史上，它是无以伦比的一首壮丽史诗。天天行军打仗，加上连续不断的政策错误，使红军损失惨重。在长征开头，各根据地红军总数达到 30 万人。到长征结束时，人数只剩下 3 万人。这说明部队只要领导不得当，几乎就会走到无以为生的地步。

然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红军却能转败为胜。在军事政治上，得到巨大胜利。红军的行程跨越 11 个省，其地区居民数达两亿，给他们留下为人民事业献身的榜样。部队经过千难万险，到达西北，是一支经严峻考验、敲打的革命军队之花。在 1935 年的遵义会议上，前些年为革命事业带来惨重损失的“左倾”领导，最后被克服，成为全党工作的一个转折点。事实证明，毛泽东的政策在哪里得到推行，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就得到发展，还开辟了新区。而“左倾”路线在哪里得势，连强大的革命根据地和红军，也遭到损失、摧毁。到这时，连原来信奉“左倾”观点的人，也逐渐看出，什么政策能推动革命，什么政策则使革命受损失。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从此以后，直到全国解放，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路线，都在党内抬不起头，而政治胜利，军事胜利，却一个接着一个到来。

在斗争进程中，革命不可避免地要遭受挫折，如何才能扭转进程，将挫

基本不变，只在词句上稍有改动，用以规范红军的 行为。后来在解放战争中沿用，1947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又重行颁布如下：三大纪律：1.一切行动听指挥； 2.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3.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 1. 谈话和气；2.买卖公平； 2. 借东西要还；4.损坏东西要赔； 5. 不打人骂人；6.不损害庄稼； 7. 不调戏妇女；8.不虐待俘虏。

折变成胜利，长征提供了一个典型的范例。许多人却只看到一事实，即红军如何丧失了原来的根据地，在考验中损失了九成的军力。

张国焘就是一个例子。这位原来的“左倾”宗派主义分子，后来变成右倾机会主义者。他像各种牌号的机会主义分子一样，对人民和革命都丧失了信心。他对遭受到的困难，以及摆在面前的困难，感到惶恐，于是放弃了北上抗日路线，转而企图分裂党和红军，带领他的部队，另走一路。他先是在四川少数民族地区，赖着不走，后来又想到新疆，那里离日本侵略者最远，十分安全，再说又靠近苏联友邦，何等方便。在西进路上，在无谓的战斗中，红四军损失了大部分人马，剩下的人才发觉受骗上当，又退回来找到红军主力。张国焘是从目光短浅的冒险主义，变成同样近视的惊惶失措者的典型。

对比之下，毛泽东由于给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采用对情况作全面分析的方法，对不同意的意见，作出满怀信心的指导。

他在批评悲观主义者的讲话中说：“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一个蛤蟆坐在井里说：‘天有一个井大。’这是不对的，因为天不止一个井大。如果它说：‘天的一部分有一个井大。’这是对的，因为合乎事实。”天到底有多大呢？中国革命有了很大的进展，毛泽东在1935年完成长征后不久，这样写到了长征的伟大意义：

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人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谁怀疑我们领导革命战争的能力，谁就会陷进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去。

红军经过考验，精神焕发地来到新的根据地。它打败了蒋介石许多次讨伐进攻。全中国人民都看到了这支部队是打不垮的，战无不胜的，要想把威胁中国生存的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只能靠这样的部队。1935年12月9日，日本夺取华北的冀东时，北京大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反对日本侵略。学生运动引发了全国的抗日运动，他们提出口号是“停止内战；联合抗日！”

此后不久，随着全世界反法西斯联合战线的成长，毛泽东提出了共产党的任务是“把红军的行动，和全国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

《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合订本，535页）。

塔马那（Tamagna, Frank L.）：《意大利在远东的利益与政治》，1940年，纽约版。

产阶级的活动结合起来，组成一条全国革命的联合战线。”党还把原来的在反帝反封建革命胜利后建立工农共和国的口号，改成人民共和国，使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也能参加进来，在政治生活上占有合法的地位。这样改变也符合革命的性质。即并没有改变由无产阶级领导一支全国革命的联合阵线的原则。也没有改变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原则。这样做，是便于在胜利完成现在的民族民主革命阶段后，立即转入未来的社会主义阶段。

中国红军向国民党军队建议举行谈判，取得国内和平，联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它向蒋的部队提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共同抗日！”的口号。

红军的倡议产生了巨大反响。1936年冬天，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将军，联合急于把日军赶走，收回东北领土的东北军少帅张学良将军，向红军达成地方性停战。12月，蒋介石飞到西安，要张杨部队向红军进攻。他们并未服从命令，反而把蒋扣留起来。在扣押期间，周恩来去看望蒋。见到这位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想到自己杀过几十万共产党人，蒋以为他的末日已经到来。

然而，共产党却劝说蒋的不服从他剿共命令的部下，不要采取将蒋介石作为叛徒，加以公审的办法。说否则将出现新的规模更大的内战，只能对日本有利。党主张采取一系列办法，包括释放蒋介石，取得国内和平，推动抗日斗争，向全国人民证明，这是联合各阶层人民，保卫国家的最佳设计方案。

共产党也看清楚了，在全国要求抗日情绪高潮之下，蒋介石也不会再进行内战。还估计到，日本加紧进攻，蒋也不得不起而抗战。又估计到，蒋的美英主子在中国的地位，也会受到东京军阀的威胁，自然会给予一定的支持，好在未来的列强与日本打交道上，占点上风。最好的结局是联合中国，打败日本。为了利用上述各种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就必须动员真正的创造历史的人民群众。要打一场人民战争，要组成全国一致的联合阵线，来为反对日本侵略的武装斗争服务。

第十六章

抗日战争

(1937—1945年)

这个正确的分析得到了证实。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向卢沟桥发动攻击。经过几天激战，日本占领了邻近的北平。8月13日，日本海陆部队开始联合突袭上海，中国军队抵抗了三个月之久。

随着中国半殖民地的局面被打破，东京现在试图把中国完全变成它的殖民地。中国人民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民族危机。

在中国内部，内战停息了。国民党和共产党达成了协议。红军改称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党提出让其他团结进步力量加入地方参议会和政府。没收地主财产分给农民的政策，改为实行减租减息。争取民族生存的八年抗战，拉开了序幕。这场战争也是对所有军队、党派、集团的一场考验。

在抗战的初期，即1938年10月汉口和广州失陷之前，国民党投入了一定力量进行抵抗，有些部队顽强战斗并取得战果。然而尽管在这一阶段，蒋介石的策略，由他的阶级本性和受制于帝国主义的决定的策略，是消极的、机会主义的和摇摆不定的。

在国内，他企图只用一部分兵力对付日本人，而保留大部分力量用于对付人民，并猜疑防范每个群众组织发挥主动性。就在早期，他已跟日本谈判过两次。第一次是1937年日本攻下南京的前夕，牵线者是德国人。第二次是1938年，通过蒋派遣的使节。

在国际上，蒋始终把眼光盯在国际联盟和他的英美主子身上，希望他们能帮助他摆脱困境。他没有运用苏联与中国政府的密切关系和为加强中国自身抗战力量进行的援助。反之，他盼着苏联自己也卷入对日战争，好增加他与日本讨价还价的砝码，甚至让日本转变立场。

于是，即使在中国人民为生存而团结战斗时，自认是国家领袖的蒋介石，仍然按照他的反动阶级立场和年轻时在上海交易所做投机生意时养成的思考习惯行事。他的思想行为只遵从狭隘的集团利益。当全国军民为国家战斗作出牺牲时，他仍然充当外国利益政策的仆从和傀儡。最显著的一个表现就是，在1937年日军向中国发动进攻的四年半之后，蒋仍然没有对日宣战。直至1941年12月日本攻击美国和英国仅仅两天之后，蒋介石才对日宣战。

从1939年初以来，蒋介石实际上没有对日本认真打过战。他宁可集中兵力对付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后者正以主要精力在日寇后方作战。这段时间蒋重又开始了反共袭击和挑衅。

在蒋的对外政策中，也有与其对内手法相似的表现。欧战爆发后，轴心国家曾取得暂时的胜利。蒋介石也像背叛他自己人民一样，做好出卖英美的

准备。随着法国战败，蒋恢复了与日本最高层人物的直接秘密接触。当战争进入高潮，东京外相松冈洋右对他的纳粹同行里宾特洛甫谈起蒋介石时说，“我跟他打过交道，理解他、信任他。”

1941年德国进攻苏联后，国民党企图全面恢复内战。纳粹进攻莫斯科成为蒋介石向共产党地区发动全面进攻的信号。接着，一批国民党先头部队试图依附轴心国。但像全世界反动派的许多美梦一样，当希特勒的攻势在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军民英勇反击下瓦解时，国民党这个梦也随之破灭。这整段插曲再一次证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命运，与中国人民，以及世界其他地方人民反法西斯生死斗争的利益，是多么紧密相关。1941年12月美国参战，日本袭击珍珠港之后，蒋介石向日本和其他轴心国宣战。国民党的如意算盘是，稳坐钓鱼船，静等美国人把它从贪婪的日本和自己国家人民那里解救出来。它一直认为，美国是战无不胜的。然而1942至43年，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对英美打了一连串的大胜仗。蒋介石政府立即恢复了与东京的私下接触，甚至是通过公开的卖国贼和纳粹特工滕内斯这一帮人。另一方面，他们允许黑田这样的日本特工要员，住在中国战时首都重庆，处于他们的保护之下。

这阶段，蒋介石让他的57名将军率部50万人投向日本，以便得到日本的钱和装备，好与华北华中的共产党军队交锋。他想得很简单，假如轴心国赢了，这些部队就是他自己转变立场的桥梁，如果同盟国赢了，他们也能派上用场。打着日本旗回到已被国民党正规部队放弃的敌占区，为以后内战占据一个理想的位置。

到了下一个阶段，即1944至45年，日本的海空军都衰败了，它的航运线在美军攻击面前已无能为力。为此，日本陆军违反在国民党地区休战的口头协定，重又发起进攻，妄图保全从东北到中印边境的铁路交通线。

对此蒋介石并不起而抵抗。他调动所有从美国得来的装备，和美国军官训练过的精锐部队，对解放区进行封锁并时而进攻。对抗日前线他不是派遣重兵，而是派出谈判代表。

上述桩桩件件的事实全部都有记录，并得到披露和证实。确实，有许多事当时被公之于众并不仅仅是出自义愤的中国爱国者那里，有些是来自美国官员和外交官。1944年才调离的驻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史迪威将军，就是其中的一位。这些人虽然特别想巩固战时和战后美国在华的控制权，对轴心国进行更有力的斗争。但他们许多人连自己也未感觉到，他们准备好在战后

艾默里 (Amery, L.S.) : 《向前观察》1935年，伦敦版。

同前。

后来，毛泽东和党曾批评他，要他不再犯错误，保留了他党内的负责地位。但后来证明，此人本性难移，他又一次主张走“左”的冒险主义道路，最后于1938年叛变革命，参加蒋介石政权，担任法西斯秘密警察。后来死在加拿大。

实施的蒋日美携手对付中国人民的“大战略”，是何等的背信弃义。有些人抵制了它，后来受到惩罚，有的被逐出美国政治界。有的像史迪威，不幸地死去。

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指出：

我们反对美国政府扶蒋反共的政策。但是我们第一要把美国人民和他们的政府相区别，第二要把美国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们和下面的普通工作人员相区别。

然而中国和远东的真实历史，并不是由蒋介石、日本或美国政府和军队写成的。未来是由中国人民和他们的革命领导力量共同创造的。就在这些年里，他们的力量、经验和政治远见都大为长进，他们不再受挫败，或是 1927 年那样，受到愚弄，丢掉斗争的果实。

当国民党统治集团既背叛全民族，又背叛自己的士兵，靠掠夺国统区人民积聚起惊人的财富时，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高举起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旗帜。在反对侵略者的不停战斗中，他们在数量 and 影响上都成倍增长了。毛泽东和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所在的西北小城延安，成为所有卓有远见、中国爱国人士心目中的北极星。这里是一座巨大的熔炉，整个国家的未来领导人在这儿受到锻炼和教育。

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战争期间，共产党逐渐得到包括国民党在内、具有爱国之心的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承认。这个结果事出必然，因为它维护了作为民族主体和绝大多数全国劳动人民的阶级利益。党员人数从 1937 年的约 4 万人，增至 1945 年的 120 万人。在党的指导下，日寇占领区的每个角落广泛开展运动战和游击战，唤醒千百万人满怀希望和信心，果敢地投入战斗。在这支群众创建的武装力量中，以前所未有的此例，涌现出无数成熟的军事和政治领导人，这才是真正的“人民的拳头。” 1935 年英雄的长征结束时，中国红军减少到仅有 3 万人。而 1945 年，人民军队经过持续作战，已发展到 91 万人，还有 250 万以上武装的民兵队伍。在所有人民军队从日本侵略者手中夺回来的地带，成立了广阔的解放区，从冰封的北疆直到亚热带的南方岛屿海南岛。解放区的领导者受到中国工人阶级政党的锻炼。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农民，不仅得到充分政治权利，而且在大幅度减租减息中，经济上也得到很大改善（为争取最大限度人口团结抗日，当时没有提出重新分配土地）。所有阶级的爱国人士都在其政治、经济和文化政策服务于人民和民族战争需要的各级行政机构都有代表权。

1937 年，共产党只有一块革命根据地，地处贫穷干旱的西北边区，有 150 万人口。到 1945 年 4 月，即日本投降前 5 个月，解放区已拥有 9500 万人口，有自己完善的地方管理机构。它们是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摇篮和雏型。

抗战 8 年的头两年过去后，国民党的“正面战场”仍处于休眠状态。而

解放区承受着与 60% 以上侵华日军正面交锋的持续苦战。他们还得面对 95% 的听命于日本的汉奸队伍（其中有按照蒋介石命令投敌的伪军）。

在这整个阶段，国民党对解放区实行军事和经济禁运，切断了后方各种物资的供应。从美国和苏联运来援助抗战的物品，没有进入解放区，反而装备了封锁解放区的部队，使他们成为整个国民党军队中装备最好的队伍。这些装备还在许多次战斗中直接用于进攻人民军队。最骇人听闻的就是 1941 年初对于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总部进行背信弃义的伏击和大屠杀。

人民武装以持续的游击战和运动战，与力量对比悬殊、装备精良的日本侵略军作战。他们避开强敌盘踞驻防的大城市，同时控制农村，粉碎敌人每一次进攻。与此同时，大多由中国农民征集组成的伪军纷纷被打败，或通过各种军事和政治手段使其保持中立。在这场人民战争中，总计有 96 多万敌人在八路军和新四军手下伤亡，还缴获了大量装备，同时完成了革命农村对城市的包围。

对国民党，则采取了灵活的“团结加斗争”政策。军事上，“针锋相对”地击败它的进攻，但在开展斗争中时时注意“有理、有利、有节”，不使冲突扩大，引起大规模内战，给日本人和极端反动派以可乘之机。政治上，共产党揭露国民党对全国人民的每一次挑衅，号召人民巩固和加强抗日统一战线。同时注意让海外民主舆论得知他们在做的事情。这样做有助于树立左派的声望，扩大阵营；争取中间派，揭露和孤立背信弃义的右派。

为了粉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并未采取军事行动，解放区掀起了能够把全体人民调动起来的大生产浪潮。他们成功地把穷乡僻壤的群众组织到一起，投入农业和小规模（大多是手工业）企业生产的高潮。在只有村庄和小镇经济的基础上（解放区当时没有城市和重要城镇），他们生产出的东西不仅供应战争需要，而且为军队和老百姓提供了衣食，比在国统区的情况还要强些，尽管国民党从外援中得到了多得多的物质和好处。人民军队在不打仗时自己生产大批粮食，尽量减少农民的负担。革命军队的自力更生精神证明它是不可征服的。

在政治和观念方面，全党范围开展“整风运动”，并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其宗旨是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自我教育，把它运用到中国的具体条件上。它与学院式学习截然不同。通过研究学习和热烈的讨论，全党和各个基层组织、每个成员的真正经验都得到总结提高，因为他们都或长或短地经历过实际斗争，有过成功和失败。整风运动加深了人民对于过去“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认识。同时，已经积累的大量实践需要接受检验和分析。更重要的是，参加者能够通过整风识别哪些作法是正确的、有前途的；哪些是在当前和随后的工作中需要加以纠正的；今后应该怎样做。

从基本方式方法来说，整风的针对目标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

1941 年 3 月 29 日由德国外长签发，美国政府截获并公布的文件。

股。”主观主义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教条地学习理论而不顾现实（主要来自“左”倾机会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什么事只凭自己熟悉的经验去办，不考虑全局，不要理论的指导。宗派主义，即一事当前只要自己那个小团体或工作部门的利益；只要党的利益不去考虑非党群众；只要军队不要地方；只要青年不要老年（反过来也一样）。“党八股”，即说话写文章用僵死的语言和空洞的修饰，不是真正把党的原则和观点向群众讲清楚，而只是罗列一串串套话以炫耀自己，缺乏真实思想——脱离实际，无的放矢，只注重形式的表现（甚至装腔作势），不注重为群众指明方向。整风运动的主要文件是毛泽东的重要演说和著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和《学习和时局》。

这是一场使思想解放和恢复活力的运动。在共产党看来，它使全党通过全面领会整风精神武装起来，不仅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而且在随之而来的反对蒋介石和帝国主义的解放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依靠自己在本国的经验和国际斗争经验，中国共产党现在能够更好地独立判断，中国革命中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这就是用马克思主义之“箭”，射自己问题之“的”。简而言之，这就是形成把马列主义运用于中国具体实践的毛泽东思想的重大的一步。

中国共产党始终运用毛泽东思想来制订自己的政策。这从政治上表明，由长期留学莫斯科，对中国本身缺乏实际经验的王明推行的“王明路线”的失败。王明的忽左忽右路线，曾经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在这场整风运动中，才得到彻底的批判。

这场政治思想整风运动与它指导下的最艰苦的战争，和根据地军民自力更生的生产运动交织进行。同时还进行着一场社会改革（减租减息运动和组织农业初级互助组）。多年以后，有人试图把毛泽东思想曲解为政治与生产和其他实际工作相对立的思想，他们忘记了毛泽东思想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从实际出发，革命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40年代前半期，革命根据地还成为全国文化中心，把乐观和信心向四方辐射。（“一种新人”，许多过去仅凭对国统区印象评判中国的来访者，都说延安“出现了一种新人”）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整风运动的主要文件，它激励和培育着这股清新、活泼的风气。

通过这些方式，解放区不仅在军事和经济力量上有了增长，还赢得更多中国人民的称赞，包括那些在敌占区和蒋管区生活的人。在那里共产党处于地下或半合法身份，共产党成就的新闻受到严格审查和压制。

所有这些当时在重庆已是公开的秘密。尽管很多年里，它都不能披露在“高雅”的出版物上。例如，战时美国外交官奥·埃德蒙·克拉布在他的《我的目击记》（1975年纽约版）中，描述他当时在“肮脏的、被炸毁的……重庆，店铺存的都是从日本占领的上海进的货，游客们来往于日本傀儡政府所在地南京。”日本轰炸的主要受害者是老百姓。官员贪污，消费日货，还私通日寇。

解放区像一块磁石，吸引的不仅是中国人，还有日本共产党领导的一个日本爱国团体，其中有许多是曾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斗争坐过牢的志士。你还可见到有朝鲜、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爱国者。年轻的印度医生柯棣华在前线救死扶伤时牺牲了。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曾随八路军、新四军行军，搜集素材唤醒了她本国的众多同胞，认识到广大中国人民的斗争在世界范围的光荣和意义。加拿大外科医生、马列主义者诺尔曼·白求恩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被毛泽东作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全体共产党人行为的榜样来纪念，号召大家向他学习。

延安是中外人民在反对中外反动派所有联盟中结成战斗友谊的源头。

抗日战争中的两条战线就这样形成，一边是代表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另一边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共产党。一个引向分裂、反动和不断的失败，另一个——人民战争战线，奠定了中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胜利基石。不仅如此，它还还为随之而来的中国已进行一世纪之久面对国内外敌人的反帝反封建革命最后胜利打下了基础。这确实是世界所有进步力量的伟大胜利，不仅因为它改变了全球各种势力的格局，还在于它演示了如何运用前所未有地发展的理论和实践，在本国条件下开展并赢得一场人民战争。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抗日战争发生时的特定国际环境。

美国总统罗斯福，早在 1937 年就大谈“孤立侵略者”和对受害者表示同情。但事实上，美国垄断集团不断扩大向日本出口石油、废铁和其他军用材料，而这些物资是继续战争所不可缺少的。1938 年，这些军需材料源源供应占了美国当年对日出口总量的 67%。1939 年这个比例上升到 70%。1941 年罗斯福政府才开始对侵略者采取经济手段。何况，那是在日本已明明白白地表现出，它不仅进攻中国或打苏联，还决定“向南”进军，把矛头指向美国 and 英国在亚洲的势力范围。然而即便到了这时，美国外交官们还试图达成一个“远东慕尼黑”。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们容许日本保留在中国已经争夺到手的“满洲国”，只要它不过多侵犯美国在其他地区的利益。在日本 1941 年偷袭珍珠港时，双方正在讨论这种安排。

美日帝国主义之间的内部斗争是实实在在而又极其尖锐的。但美国政府尽管有时对日本确有敌意，却也愿意用它来消耗中国和苏联，企盼日后能仗着久经考验的美元的威力，把一个新日本帝国主义操纵在手里。

珍珠港事件后，美国统治集团自然得改变策略。现在他们跟中国变成同盟国携手作战。但策略便逐渐变化，努力把中美同盟引导到实质上把它变成一个殖民地，把中国人民的民族抱负和其他帝国主义竞争对手的影响永远排

可以看作史迪威自己为这些事件所作旁证的，有怀特编的《史迪威书信集》1948 年纽约版；有史迪威一位战时参谋写的《在中国的时机：第二次大战期间谢伟思电稿汇编》，1974 年纽约版；还有美国历史学家巴巴拉·塔奇曼运用一些新披露材料写成的《史迪威和在华美国人的经历，1911 年—45 年》，1971 年纽约版。

除。大批美国军官、官员和军事、经济、教育顾问涌入中国。他们指责国民党政权腐败无能无可救药，试图把美国指挥官和管理人员，以及最“可靠”的亲美中国官员，安插到军事和国民生活的各个部门。

美国有时也主张蒋介石与共产党谈判，不要在对日作战中陷于内乱，这时美国也有它自己的一套长远打算。抗日战争的利益是它的主要动机，可以在这种力量均衡中坐收渔人之利。但是到 1944 年，重心转移到“挽救国民党自身”，不让它准备不足就发动内战，而是等到它有把握摧毁和遏制人民革命的时机到来。当美国政府作为两党间的调停人出现时，它妄图借此“谈判”，取消或至少叫人民没法再搞什么独立革命运动。要取消中国人民经过百年苦难和奋斗取得的最坚实的成果，和他们用鲜血凝成的对未来的可贵保证，这是一个最便捷的法子。

1937—1941 年，英国最关注的就是收买日本。它把长期以来由自己控制的中国海口关税征收权，移交给了侵华日军。在北方，英国人控制的开滦矿务局，欣然向侵略者提供煤炭。1938 年 3 月，矿务局请来日本军血腥镇压了中国矿工的罢工。1938 年 6 月 27 日，英国政府充任了中日之间的调停国。

一位英国作家这样评价说：“对于战争爆发，哪一方负有更多责任，未置一词。”在伦敦看来，日本人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1938 年 11 月 1 日张伯伦首相就曾得意地扬言——这位作者写道：“他不相信当中日战争结束时，日本能供应开发中国的新资本，中国的重建离不开英国的帮助。”1939 年年中，经英国驻东京大使克雷吉爵士与日本外相谈判，英国政府正式批准，根据它在天津租界的治外法权，日本军队有权“镇压或清除任何会阻碍它们或有利敌方的行为。”它恭恭敬敬地请日本军队屠杀大批从事爱国抵抗运动的中国人。

这段时间，英国不单是以中国为牺牲，谋求与日本侵略者和解，而且又一次照它的老习惯，利用中国的不幸寻找蚕食疆土的机会。1936 年，当日本大举进攻中国已迫在眉睫，英国又将在西藏单方划定一条未被任何中国政府承认的“麦克马洪线”，作为“分界线”载入英国正式地图。

甚至后来战争期间，英国作为中国的盟军对日作战时，还在接连不断地把驻印度部队调进来。1944 年 5 月，一次这样的蚕食行动就曾遭到拉萨的西藏地方政府的抗议。尽管拉萨政府难以从英国势力下自拔，但对于“麦克马洪线”，他们和中国中央政府一样无法接受。12 月，英国试图消除拉萨的对

《愚公移山》（《毛泽东选集》合订本，1102 页）。

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后来试图在 20 多年间“封锁”、“禁运”和“孤立”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中国，以“遏制”和抵消它的影响。他们该记得，这种手法已被证明行不通。尽管 30 年代末 40 年代初，解放区正遭到分割和围剿。标志苏联修正主义领导从革命马列主义滑向社会帝国主义的彻底背叛，从赫鲁晓夫时代起也对中国采取了同样的禁运策略，结果等待他们的是同样的失败。

都发表于 1941 至 1944 年间，收入《毛泽东选集》第 3 卷。

立情绪，提出了达旺以南的另一条“线”，同样遭到拒绝。1945年4月，战争结束前不久，西藏人又一次对英印士兵入侵瓦龙提出了抗议。这段时期，中国边境屡屡被犯，在西藏其他地段，在新疆的阿克塞地区，还有与缅甸的冲突。

1940年，伦敦迫于日本的压力，关闭了缅甸路这条中国接受西方援助的唯一安全通道，并尽它之力安排了一次中日“调停”。随着1941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英国开始逐渐把精力放在一项长期政策——在民族解放运动和美国日益增长的侵略性面前，保住它自己在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的地位。

相比之下，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政策是援助所有受到法西斯侵略的国家。1937年日本侵入中国后，苏维埃共和国立即与中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提供长期贷款，并通过西北边境开始向中国提供军事和其它物资。一支实力强大的苏联志愿空军，在反击日本对南京、汉口和其它城市的空袭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连一直站在蒋介石一边的美国空军陈纳德将军，在1949年写的一本书中也不得不承认，“从1937年夏季战争爆发到1942年底，中国的外援大多来自俄罗斯。”

激烈反共反苏的国民党航空委员会的战时首领蒋介石夫人为与苏联对比下美国的行为感到羞耻。她在美国一份销路颇广的杂志上写道：

日本战争物资的80%来自美国……日本飞机无情轰炸时所用的燃油95%是美国油。

抗战整个头三年，苏联给予中国长期贷款用于购买军备和其它必需品，数倍于英国和美国给予的贷款额……

更有甚者，在国联会议上，是俄罗斯站在坚定立场，支持中国呼吁对罪恶的日本侵略者采取积极措施……当日本抗议说，俄罗斯对中国援助是违背中立立场时，俄罗斯并未退缩、投降或是妥协，而是继续向中国输送军援……

我指出的是，俄罗斯的帮助是完全无条件的。

对苏联援助的报复，日本向苏联领土及其盟国蒙古人民共和国发动了两次进攻。一次是1937年在距海参崴不远的张高峰，另一次是1939年在蒙古的诺门坎，都以日本大败告终。仅诺门坎之役它就损失了660架飞机、大批坦克和不少于25000人的阵亡。

碰了几个硬钉子后，日本对西方的怂恿不热心了，它暂时抑制了入侵西伯利亚的野心，而选择到它认为“抵抗最小的战线”南太平洋，去试试运气。

《纪念白求恩》（《毛泽东选集》合订本，653页）。

1938年12月30日伦敦《泰晤士报》刊登开滦煤矿的年度报告，表达了对“日本当局良好理解”的感激之情。“这表现在每次对矿务局的保卫行动和给予开平煤矿生产和运输的援助。”同一年，矿山股票持有者获得7.5%的派息，而头一年只有5%。更主要的是，面对日本的军需市场，一个年总产100万吨的新矿井开掘已经列入这家英国公司的计划中。见F.C.琼斯所著《上海与天津》，1940年纽约版，第171页。

洛德（Luard, Evan）：《英国与中国》，1962年伦敦版，第45—46页。

最后，当 1941—1945 年摧毁了希特勒侵略军之后，苏联的目标就是与其他盟国达成一致，在日本地面部队最集中的满洲，给予迅猛有力的打击，使东京军国主义者再也不能在中国土地上继续作战，从而陷入最终的败局。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部队也参与了这次行动。

所谓“原子弹的决定性作用”，是华盛顿为了政治目的而制造的一个神话，它在爆炸之后卖力地在全世界广为传播。日本投降当天，反苏的美空军陈纳德将军发表军事评论说：“俄国人对日参战，是加速日本灭亡的决定因素，哪怕没有原子弹投下来也是一样。”

两位美国政策分析家，一个后来当上杜鲁门总统政府的空军部长，他后来坦率地披露，决定使用这一灭绝人性的武器是出于政治考虑：

为什么我们那时扔下原子弹？假如原子弹使用得正当，我们干嘛不在联合国主持下做一次试验，显示它的威力，然后向日本提出最后通牒？

不行，这都不可能进行，如果目的是趁俄国没有参战时把日本打垮——或者至少是在日本垮台之前俄国有任何要参战的暗示。

所以，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的爆炸，并不代表它是打败日本军阀和结束反法西斯战争必不可少的武器。恰恰相反，对在与所有法西斯轴心国斗争中起主要作用的各国人民，原子弹的爆炸无异于是一种威慑，把胜利果实从他们手中夺走。在远东，这就像判定了社会主义苏联和在中国及其它东亚地区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的革命力量，在战后处理日本的问题上没有发言权。在当时事情正如它的策划者、美国副国务卿约瑟夫·格鲁所证实的，美国的政策已经转向保住日本天皇的御座，以防止一场发自日本本国人民的革命。

总之，必须说明，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并没有被原子弹吓倒，他们才能继续完成自己的革命。1945 年 8 月 13 日，原子弹爆炸之后 5 天，毛泽东嘲笑了“武器决定论”者面对原子弹爆炸流露出的所有束手无策的情绪，那种与无产阶级革命依赖人民大众相对立的态度。他宣称，仅仅靠“小米加步枪”，人民军队成功地战败了日本现代化战争武器。如果由美国装备起的蒋介石军队，把内战强加给中国人民，人民同样会赢得这场战争。

几个月后的 1946 年 8 月，当时内战已经爆发，毛泽东在会见世界知名的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时说：

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都是纸老虎。提

除了上面提到的 1936 年地图，绝大多数英国统治时期的印度官方测绘地图，都以这条边界“未划定”。凡此类事件，可参看麦克斯维尔（Maxwell, Neville）：《印度的中国战争》，1970 年伦敦版，1970、1971 年纽约版。

陈纳德（Chennault, Claire L.）《战士之路》（Way of a Fighter）1949 年纽约版，第 61 页。

起美国帝国主义，人们似乎觉得它是强大得不得了，中国的反动派正在拿美国的“强大”来吓唬中国人民。但是美国反动派也将要同一切历史上的反动派一样，被证明为并没有什么力量。在美国，另有一类人是真正有力量的，这就是美国人民。

这个对世界以帝国主义反动派为一方，以人民（尤其他们本国人民）为另一方的双方间新的力量平衡的论断，并不是抽象的哲学概念。它是武装了毛泽东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人的战略思想，使他们能够巩固反法西斯斗争的成果，继续前进，争取不仅民族的，而且是社会的解放。而这恰恰正是在西欧经过同样反法西斯斗争，已取得领导地位的一些共产党，由于没有正确的战略思想而阻碍了自己革命继续前进的脚步。

第十七章

解放战争和胜利 (1946—1949年)

1945年后，美国企图在远东接替战败国日本的位置。它所渴望得到的就是独家控制中国的巨大资源和市场。所有能够参与争夺这个控制权的帝国主义者，或自认为强大到足以分一杯羹的人，都已被排除或者彻底削弱了。而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则日益壮大，使美国垄断集团的独占野心难以得逞。

因此，从日本投降那天起，美国方面就积极展开活动，包括军事、政治和经济各条战线企图夺取中国人民的胜利果实。

在军事上，第一个步骤就是，麦克阿瑟将军命令在华日军不得向人民军队投降。接着是蒋介石进一步指示日本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抵抗人民军队。因为国民党军队多年前就已逃离了华北、华中的大城市和沿海大港口。这一来意味着，“投降了”的日本军队暂时还能保留着它的武器。后来又加上美国军队，它在华对日作战只有6万人，在胜利那个月，一下子便增加到14.3万人。同时，美国空军运输队和海军舰队运送了上百万蒋的士兵，去接收125万日本兵投降，连同他们的全部装备。杜鲁门在他从美国总统职位退休后所写的回忆录中，披露了这次行动的目的。他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中国的形势以及美国的举动，作了如下论述：

事实上，蒋介石要想重新占据中国南方，有着极大困难。想占领北方，他需要与共产党签订协议，如果不跟共产党和苏联人达成协议，就永远也进不了中国东北。在共产党占据着铁路线的情况下，蒋根本不可能占领东北和中南。这就完全清楚了，如果我们让日本人马上放下武器，退到海边，整个中国就会落到共产党手里。这样我们必须采取步骤，利用敌人来驻防，直到我们把中国国民党军队空运到北方，派遣海军陆战队去驻守海港。于是日本人便受命保住他们的地盘待命。等待蒋介石的中国军队出现后，日本人再向他们投降。再把日军集中到海港，由我们遣送他们回日本。利用日本人阻挠共产党接收的作法，是国务院和国防部共同决定，由我批准的。

接着，由蒋介石授意投敌的57名将军率领的49.1万伪军，也加入了敌人阵营。这些人和日本侵华期间组建的30万伪军加在一起，立刻重组成为一支国民党军队。这支反革命军队，比原来残余的国民党军队更强大、装备更精良。这些人在美国人主持下展开部署，为了进行一场空前残酷血腥的国内战争。然而，这支反动力量在壮大之时，就埋下了它日后崩溃的种子。中国人打败日本，并不是为了再受美国人控制。他们是为民族独立而战。他们不是与摘取胜利果实重新点燃内战火焰的反动派和少数剥削者作战，而是为重

建国家和美好生活。这种情绪，在国民党军队中，在其他所有中国人心里，都同样存在。

在政治上，实施美蒋计划需要时间和狡猾的花招。为了计划成功，必须欺骗全世界的舆论，包括中国的和美国自己的舆论，使人们习惯于美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常用的背叛行为。世界范围内，“杜鲁门时代”，美帝国主义是在组成这样一个结合体：即一面以“仁慈”外表掩藏其阶级本性决定的掠夺天性与战后目标；一面全力威慑和粉碎人民追求新生活的愿望。为了“美国世纪”美梦成真，最迫切的任务，就是给各国反动派以时间和物力，重建对其国家机器和军事力量的完全控制。同时，又用哄骗手段，从人民那里夺取在反法西斯抵抗过程中建立起的军事力量。在中国，考虑到上述目标，美国统治者在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摆出了一副“调停”的姿态。

中国共产党十分清楚美国和国民党的动机。在谈判中，他们以中国人民要求和平、重建家园与进步的愿望为出发点。“两条道路”的选择，始终摆在共产党员和整个民族的面前。即如果中国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则过去所有牺牲都将付之东流。因此，中国必须成为一个属于人民大众的独立国家，并且只有走工人阶级领导的唯一道路，来完成民主革命。它应该在可能的和平条件下完成。但要粉碎任何企图阻挠民主革命的反动势力。“在这个时期出现任何形式的机会主义”，毛泽东写道，“都会导致艰苦斗争的失败，将本应属于人民的果实拱手呈给蒋介石。”因此在同蒋谈判中，共产党始终保持警惕，粉碎和揭露了美国撑腰的蒋介石轮番的军事和政治挑衅。

中国共产党吸取了历史的惨痛教训，决心不使中国人民再一次因为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本性的幻想，像 1927 年那样陷入大屠杀和倒退的地狱。毛泽东在 1945 年抗战胜利时写道：

一九二七年的时候，我党还是幼年的党，对于蒋介石的反革命的突然袭击毫无精神准备，以致人民已经取得的胜利果实跟着就失掉了，人民遭受了长期的灾难，光明的中国变成了黑暗的中国。这一次不同了，我党已经有了三次革命的丰富经验，党的政治成熟程度已经大大提高了。

为提醒人们注意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进行战争准备，毛泽东继续说：

看到人家手里拿着东西了，我们就要调查一下。他手里拿的是什么？是刀。刀有什么用处？可以杀人。他要拿刀杀谁？要杀人民。调查了这几件事，再调查一下：中国人民也有手，也可以拿刀，没有刀可以打一把。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调查研究，发现了这个真理。

为了履行自己对人民的责任，毛泽东强调，党永远不能重复投降主义者陈独秀 1927 年犯下的给人民造成重大损失的错误。他说：

例如陈独秀，他就不知道拿着刀可以杀人。有人说，这是普遍的日常真理，共产党的领导人还会不知道？这很难说……我们采取了和陈独秀不同的办法，使被压迫、被

屠杀的人民拿起刀来。

牢牢掌握人民武装。中国共产党在与蒋介石的谈判中，终于迫使国民党在 1945 年 10 月 10 日和 1946 年 1 月 10 日的两个协定上签了字。协定规定了中国政府的民主化，和国民党军队与人民军队的联合基础（而不是后者被前者合并）。蒋介石同意了，但他只是为了赢得时间。然后，正如预料中的，他违背了自己的诺言。但最终结局并非导致中国共产党的陷于政治混乱状态，（像美国支持的反动派在西欧施展同样花招那样）。当蒋介石政权选择诉诸武力时，就已经注定了它的彻底失败。

结果是被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革命路线得到的胜利所证实了。紧跟在重庆谈判之后，党内产生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认为，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今后将是“和平与议会”道路，人民武装的军队将“成为国家军队的一部分”。解散党的组织，许多共产党员将“进入政府官员行列”。在中国条件下，所有这些观点无非是 1925—1927 年陈独秀路线的重复。在国际条件下，它带有考茨基和伯恩斯坦“议会道路”的味道。与之类似的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自我缴械和短期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路线，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就是这样拱手把胜利果实交给了反动派。

然而，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保持了党的独立性和军队。在与国民党谈判时，可以而且已经做出让步，撤销了它控制的 8 个解放区，把部队北撤转移驻地。但是在任何地方，都不会把抗日战争中积累起来的人民武装，无论正规军还是游击队的一件武器，一粒子弹交出来。

除了中国人民之外，苏联和各国的进步力量都站出来强烈反对国民党的内战阴谋。1945 年 12 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外长会议上，美国和英国政府还与苏联一起在支持中国和平与团结的联合声明上签了字。杜鲁门领导的美国那时还需要一个伪装，掩盖它并不放弃罗斯福执政时期开始出现的两种制度联合的势头。杜鲁门虽然签了字，但并不表明他要信守诺言，后来的事实证明了一点。

然而国内和国际的这些谈判和协定，后来都证明对中国革命有利。美蒋原想把这些协定作为假面具，后来也失算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结果是他们言行不一的嘴脸彻底暴露在中国人民和整个世界面前。

经济上，在抗日战争期间长期远居内地袖手旁观的国民党官员，此时如饿虎扑食般回到原来敌人占据的区域。他们利用自己在政府中的地位，将工厂、住宅、商店和其它日本先前从民族资本家那里攫取的财富，全都饱了私囊，而不理采原来主人的认领要求。官僚资本主义畸形发展，掌握了中国现

《纽约时报》，1945 年 8 月 15 日。

诺尔曼·卡曾期与托马期·K·芬利特撰文，《星期六文学评论》，1946 年 6 月 15 日。上述两段引文引自《原子能的军事与政治后果》（伦敦，1948 版）；著者为前英国政府原子能顾问委员会成员 P.M.S. 布莱克特。

代经济的命脉。私人财富集中在“四大家族”手中。他们是蒋介石、财政部长孔祥熙、外交部长宋子文和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他们控制着国民党机器，总财富估计超过 200 亿美元。还是那个杜鲁门，对他为援助蒋所作的如此这般努力，多年以后在 1973 年作了回顾：

蒋介石和蒋夫人以及她的宋氏家族、孔氏家族全都是贼。他们从我们送给蒋的 35 亿美元中偷走了 7 亿 5 千万。他们将这笔钱用于投资圣保罗（巴西）和纽约。

与此同时，美国收到了 1946 年中美商约中作为它对国民党支持的首期回报。它打开了美国投资和商品自由进入中国市场的通道。

形形色色的廉价美国货淹没了中国市场，许多都是在“援助”的幌子下免税进口，使得国内生产和就业的复苏成了泡影。美国公司的推销员坐着美国军用飞机和美国控制下的“中国”民航班机飞来飞去，在矿藏和其它资源上打下标记，以备将来的开发。

由于正常经济生活的瘫痪和日益增长的蒋介石军事预算，导致了前所未有的通货膨胀。这给官僚资本家投机商、经手洋货的中间人和腐败官员们提供了巨额利润。然而它给工人带来了饥饿，给小工厂主、商人和工薪职员带来了灭顶之灾，这种形势引发了城市劳动者的大罢工和示威游行，中小资产者中的反帝、反政府和激进思想的迅速增长。停止美国干涉和中国内战，成为全中国大多数人民的普遍要求。美国明显地再次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复苏日本垄断经济力量，更加深了人民的这种感情。何况还有美国兵的杀人和强奸暴行。

国民党和它的美国主子靠着他们懂得的唯一办法——恐怖手段，来对付每一次抗议游行。由蒋军驾驶的美国坦克，冲进上海一家棉纺厂院子，镇压绝大多数为女工的罢工者。国民党特务用美国海军谍报机构的无声手枪，杀害了文化领袖闻一多和李公朴教授。他们当时都和代表“中间道路”的民主同盟有联系。在许多城市，国民党还在校园中杀死学生（声名狼藉的一例是当学生在自己宿舍里睡觉时下的手）。此外，逮捕和杀害、特务活动、挑衅、反动的审查制度、对书店的搜查以及其它那些在 30 年代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用过的种种手段再次被沿用，而且变本加厉。

但时代已不再是 1919 年，1927 年或 30 年代了。在新的历史时期，日益增长的对抗情绪已无法压制下去，哪怕是暂时的。因为它具有坚实、宽广的基础，那就是民族解放的人民阵线。在这个新的民众联盟的核心，是完全成熟的中国共产党和它钢铁一般的武装力量，它的威望正在不断上升。这条人民阵线具有高度政治水平，基础更加广阔，有果敢战斗的领导力量，目标也非常明确。斗争从为国内和平改革，很快过渡到推翻国民党法西斯统治，实现以“土地还家”、没收官僚资产阶级财产和彻底从帝国主义奴役下得到解

引自杜鲁门的《哈里·S·杜鲁门回忆录》第 2 章“考验与希望的年代”，1956 年纽约花园城版，第 62 页。

放。

美国伪装的调停失败，内战爆发，加快了革命的进程。一家在华出版的美国周刊这样描述首席调停员马歇尔将军的活动说：

对我们来说，我们还在试图搞清楚，马歇尔将军来此究竟是作为一名美国调停者呢，还是作为美军国民党军的联军的指挥官。

美国军事代表团现在在内战战场公开活动了。

在战争第一阶段，从 1946 年中至 1947 年 7 月，人民解放军从许多大城市撤退，包括它原总部所在地延安。在战略上这是为了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消耗和摧毁国民党军队，而不是保留一城一地。解放军每到一个地方，都带来了土地改革。这已不再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期限于减租减息的土改，而是把地主的土地无偿分给农民，和彻底取消所有积欠的农村债务——也就是消灭封建主义。土改的效果是一批批青年农民踊跃加入革命军队行列，或是建立民兵，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另一方面，国民党占领区的农民纷纷起来反抗。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一份美国军事报告中都使用了沮丧的言辞，这份报告后来收入美国国务院关于中国的“白皮书”：国民党军队“所处的位置与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的遭遇毫无二致”，而人民军队在“成功地运用了保存自己实力和运动战，为最后的集中作准备的战略，这个时机由他们自己选择。”

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军队尽管有美国慷慨提供的装备，政治上还是迅速走向瓦解。美国官员的报告十分关注“国民党的消耗，士兵中对于长官肥得流油、小兵一贫如洗的悬殊差别的强烈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对于远离家乡，在一群不友好的民众中打仗毫无兴趣。而共产党却是在为自己的土地而战。”

土地改革也影响到国民党军队的士气。国民党士兵中家在人民解放区的，和所有其他农民一样分得了土地。他们怎能给了他们和他们家属土地的共产党和军队，当作“敌人”。

这就不难解释，无论美国 60 亿美元的武器和其他战争援助，还是美国军事代表团为国民党政权提供的训练和顾问，都无法挽救它的失败命运。而且正如毛泽东所预见的那样：美国的原子弹垄断，也无法扭转这种力量对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毛泽东选集》合订本，1126 页）。

出处同上，第 1127 页。

在美国人民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也有不少人反对美国支持蒋介石，其中有美军官兵。上海举行反对美驻华士兵暴行的大游行中，学生工人高呼“美国佬滚回去”的口号，其中也有美国士兵，高呼“我们要回去！”当时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驻华机构的美方工作人员，对于国民党官员大肆盗用联合国拨的救济款行为，感到震惊，因而反对美国援蒋政策。美国还有些知名学者、作家、科学家，神职人员、演员、记者和老兵。反对援蒋的一个委员会由前美国陆战队战斗英雄，卡尔逊少将担任主席。此外，美国国会两院、劳工机构领袖中也有不少人反对美国援蒋。后来事情发展证明他们都是有远见卓识的人。

比。中国人民不怕原子弹，他们知道任何武器都无法战胜在革命斗争中武装起来的人民。正是在这种斗争中，他们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展。他们也不怕帝国主义者刻意渲染的那些奇谈怪论，什么中国的革命如果进行到底，就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此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方面，以毛泽东为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必须面对那些可能与自己大相径庭的观点及其后果。“解放战争时期，斯大林第一次给我们下令，不要把革命搞得太紧，一旦内战爆发，中华民族就要冒着自我毁灭的风险”，10年以后毛泽东回忆道。这是对中国共产党能力的一个最严峻考验：对形势作出独立的马克思主义判断，并把它放到本国的决定性实践中去检验。共产党人这样做了，并且取得完全成功。新中国的诞生就是结果。这种客观正确判断的重要性，可以想象得出，如果没有新中国，或者中国长期处于分裂、僵化状态，会是什么样的结果。“中国革命胜利后，斯大林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中国共产党后来提起过。”应该指出，这样评论，并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要全面否定斯大林，而是肯定他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总的贡献超过了他的错误。问题在于，任何国家的革命航程，都包括注意听取外界的正确意见，和拒绝那些不正确的判断，这才是革命领导者的义务和责任。

那么，中国共产党是怎样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整个形势呢？毛泽东和其他中国领导人相信，在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一定会达成妥协。因为军事力量的实际平衡，和人民斗争不断高涨的压力，使得妥协成为可能，而且大家愿意接受。但是毛泽东在1946年也指出，“这种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各国人民与反动派之间的斗争将不断向前发展，消耗敌人的力量，最终形成帝国主义者梦寐以求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最大障碍。问题在于不要去回避“刺激”那些好战分子和反动派，而要设法捆住他们的手脚，准备进行革命的各国人民，不会不这样做。

事实上帝国主义者 and 各国反动派还没有一件有效武器——将来也不会有，可以用来对付植根于群众的革命运动。蒋介石像他之前的日本侵略者，和他之后在越南的美国侵略者一样，企图使用反革命力量的“特殊的”“胜利秘密”和“反游击的游击”战争对付革命力量。但是这一招完全失败了。因为革命战争能否成功，只能建立在民众支持的革命政治基础上。对老百姓来说，人民的军队才是“我们的”，反民众的军队总是敌人的。

在中国，1947年7月，人民革命军队完成了军事和经济意义上的“以农村包围城市”。还在政治情感方面也完成了以中国人民包围和孤立城市与农

梅尔勒·米勒（Miller, Merle）：《说老实话——杜鲁门口述自传》。1973年，纽约版。

《中国周报》（China Weekly Review）上海，1946年6月22日。

《美国对华关系》（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美国国务院，1949年，第314页。

村的国民党。这个月人民解放军渡过黄河南下。这一举动标志着战争进入第二阶段，也是最后阶段——解放大城市的战略进攻阶段。在 1947 年 12 月召开的党的会议上，毛泽东主席指出，这不仅标志着国内战争的转折点，而且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事实很快就作出了证明。

1948 年 9 月到 11 月，整个东北解放，国民党军队被歼被俘 47.2 万人。美国军事顾问们以近乎绝望的口气报告说，在锦州“防守城市的第 93 军部队开了小差，投奔共军，”在其他战场，“美国训练和装备的军团崩溃瓦解，”国民党军队从辽沈地区乘船撤走者只有几个人，绝大多数政府军则不战而降。”值得注意的是，美国预感到反动军队的濒临溃败，积极寻求利用联合国来阻止人民军队在东北进攻的方法。魏德迈将军被杜鲁门派去报告形势，他于 1947 年 9 月 9 日正式建议，“联合国应立即采取措施，促成在东北停战，以备下一步的监护或托管。”他还建议征得联合国总体上认可，由华盛顿对中国进行干涉。这是早年美国常用的办法：一贯利用国际组织缔造和平的威信，作为反动派和新殖民主义的工具，采取直接军事行动对付革命军队，或者麻痹其斗志，让他们陷入被消灭的境地。后来的例子，当然是朝鲜。这里提到 1947 年这段插曲是说明，此后很长时间里中国人民的警惕性，在冷战时期对联合国的看法，是建立在多么深刻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中国革命军队没有理会这些花招，继续战斗并在魏德迈标上“国际托管”的地区赢得了胜利。东北的解放使人民解放军在数量对比上大大提高。从此以后，解放军不仅在战斗力和政治支持上，而且在数量上都超过了国民党军队。

在紧接而来的淮海战役（1948 年 11 月—1949 年 1 月）中，55.5 万国民党军队被击溃。又一次，美国驻国民党军事援助团团团长巴尔将军，只好在写给上级的报告中说：“已经得知国民党有两个师变节投向共产党，另一个师也可能叛变。”淮海战役的成功不仅在于消灭了国民党“王牌军”的大部分，还在于缴获了大量坦克、大炮及其它现代化装备。

当中国人民在战斗中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英雄主义和惊人的军事指挥才能的关头，蒋介石政府通过它在联合国的代表蒋廷黻，居然向美国国务卿马

同上，第 316 页。

《论十大关系》（《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一章），写于 1956 年，但直到 1977 年才公开发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1977 年北京外文版，第 304 页）。

《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公开信》，1963 年 9 月。摘自《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争论》文件集，北京英语版，1963 年，第 129 页。

《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1181 页）。

《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合订本，1243 页）。

《美国对华关系》，美国国务院 1949 年版，第 320 页。

歇尔提出，由美国完全接管它濒临溃散的国民党军队。“美国是否同意”，他请求说，“选派美国官员以担任顾问名义，实际指挥中国的军队？”蒋还请求，由一名美国将军来制定国民党的战略计划。马歇尔意识到，军事竞赛已见分晓，他沮丧地回答说，“美国把军官派到一个几乎注定的败局，是件十分严重的事。”1949年1月，中国北方大港天津经过战斗解放了，北京整个卫戍部队也投降，和平解放了。在这两个城市目睹人民解放军入城仪式的外国观察员写道，行进的队列携带着原来提供给国民党的美式最新装备。1949年1月，国民党在人民军队的迅速攻势下又折损50万兵力。美国官员在军事形势报告中哀叹说：

在此期间，共产党卓有成效地将大约20万前政府军吸纳到自己军队中作兵员；还有大约40万国军俘虏被送到共产党的后勤部队。

1949年春天，人民军队抵达长江北岸。帝国主义者和它的国民党工具当此最后时刻，看到中国几百年历史的长卷又一次展开，然后以高速度卷起来。

美国高级官员在这最后一刻亮出他们的美元，妄图收买革命。例如，“马歇尔计划”的头头，霍夫曼出现在上海，带着一个“援助中国所有方面”的建议。他的条件是共产党立即停止人民军队的进攻，并保证不“清除”蒋介石和其它美国奸细。

国民党军阀和政客们，作为清王朝和卖国贼袁世凯的最后一个继承人，封建主义守护者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警察，开始大喊“民主”和“国内和平”。他们提出恢复和谈，甚至允许一定程度的“土地改革”，要给地主以补偿。还特别提到，这一切要由一个“中美农业委员会”来掌管。

4月，人民解放军开始渡过长江，直捣帝国主义和蒋家王朝最重要的大本营——南京。英国军舰再次出没江上，仿佛是一系列历史事件中英国军舰的缩影和幽灵：1860年进攻太平军；1911年成功地推翻满清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施加压力；1927年炮轰南京，充当颠覆革命的工具；又在1930年炮击长沙的中国红军。然而，这一次的结果却完全两样。它被人民军队的炮火干脆利落地赶了出去。最顽固不化的脑筋都能懂得，老牌的“炮舰外交”终于寿终正寝了。稻草人的威风在中国已不能再苟延残喘。再也没有各种形式的海军或军事演习。《纽约先驱论坛报》发表一篇评论自我暴露地描述这一段过程说：

同上，第321页。

《美军给杜鲁门总统的报告》，1947年9月19日呈交。出处同上，第767页。

直到1971年，差不多四分之一世纪之后，新中国才在联合国取得了它的合法席位。它这样做是因为这个组织本身有了变化——开始反映由于中国革命节节胜利带给这个世界的影响：它在朝鲜和印度支那的反帝战争，在前殖民地半殖民地独立自主的斗争。中国进入联合国，并不以丧失民族和革命原则。它把自己摆在觉醒的人民一边，第三世界国家一边，和所有反对超级大国命令、侵略、瓜分世界的其他国家和力量一边。

如果外国干涉者仍然能在中国行得通，共军就会像大约 50 年前的义和团叛党、1865 年太平天国的叛匪一样被镇压下去……但今天已经做不到了……西方大炮再多，已不能再充当吓唬控制成百万亚洲佬的有效武器。

的确，那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人民革命的领导者共产党，这时已经制订出下一步计划。在渡江前一个月，党中央召开会议作出一系列重要决定。决定指出，革命的中心工作已经转变，经过 20 年在农村积累和扩大队伍，现在要从农村地区回到城市。它还宣布了这样的原则：在即将到来的全国胜利的基础上，建立人民政府。

1949 年余下的几个月里，中国的所有大城市都解放了。美国代表团被迫撤走，而蒋介石和他的一点残余部队，则由美国运输机运往台湾。蒋介石所以选中台湾做他的避难所，是因为这是个与大陆一水之隔，有美国军舰在海峡巡逻的地方。事实上，正是在中国这个海岛省份，因为远离解放战争的前线，正好能够开展反对国民党的斗争。1945 年，在日本占据 50 年后，有着强烈爱国情绪的台湾同胞，终于盼来了这个孤岛与祖国重新统一，感到欢欣鼓舞。对蒋介石的统治也曾抱有某些幻想。然而 1947 年，国民党的压迫和苛政，迫使台湾同胞起而抗争，成为整个中国人民争取解放斗争的一部分。起义被镇压下去了，几万人惨遭屠杀。起义的日子 2 月 28 日，成为全国每年都要纪念的日子，他们将继续斗争，最终结束国民党造成的隔绝，使台湾与中国其他省份一道，全民族实现重新统一。

夺取中国大城市的胜利不仅在军事上，也体现在政治和经济上。帝国主义者看到他们的傀儡在战场吃了败仗，把希望寄托在城市技术人员和知识分子身上，以为他们会躲开人民解放军，或者拒绝合作。它估计，长时期在农村工作之后，共产党会在上海这样中心城市棘手的经济和管理问题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上海这个 600 万人口的城市，早已被外国人控制和反动派带来的投机罪恶习气腐蚀了。现在更加原形毕露。美国报刊早就哀叹不可能“吓唬和控制”中国，现在，这些报刊又虔诚宣讲说，“自由世界的理想”，只有靠贪污来拯救了！

回忆起来，毛泽东早在 1945 年 7 月 12 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就曾警告，美国政府支持蒋介石，将会“陷在中国反动派的又臭又深的粪坑里”。这个政策如果继续下去，“那就将给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以千钧重负和无穷祸害。这一点，必须使美国人民认识清楚。毛泽东的结论如往常一样，注重于所有人民的共同利益。这种情形很有可能发生——后由于美国对朝鲜和印度支那的干涉，给美国人民带来了更为沉重的负担和祸害。1970 年代的中美关系正常化，就是吸取了历史教训才有的成果。

但是事实宣告了这一预言的破产。人民军队得到的支持不仅来自工人和农民，还来自知识分子、技术人员和爱国的民族资本家。这些阶层远离统治

阶级，欢迎人民军队领导全民族争取最后的独立。几个月内，新的管理就使生产复苏，通货膨胀得到抑制，并使国民党统治几年间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开始得到解决。

于是，一直夸口“对中国友善”的美国政府，提供美国飞机，由美国训练的蒋军飞行员驾驶，从台湾起飞轰炸了上海发电厂，企图使这个中国最大城市的工业陷于停顿。他们等着饥饿的工人走上街头，转过头来反对这个新生政权。他们还求助于封锁、制造各种破坏阴谋和谍报活动。然而所有这一切都未能使中国人民沮丧。反而让他们擦亮了眼睛，更紧密地团结在代表他们真正利益的领导者周围。

终于，帝国主义者开始了绝望的最后挣扎：为保留住进行破坏的基地，以图最终重新建立他们对中国的控制，他们又玩起了老把戏——利用周边地区孤立中国。在这些地区，“西方民主”的同盟者都是些丧失信誉的、卖国的封建余孽。

在内蒙古，美国煽动德王集团搞分裂活动，他一直就是日本在这一地区的傀儡统治者。但这也是徒劳无功的。内蒙地区有一部分早就解放了，那里的汉蒙各民族劳动人民在共同的武装斗争中获得了丰富的经验。因此整个地区的形势很快就明朗化。很有意思的是，当地封建头人见到大势已去时十分抱怨。据一位美国记者描述，他们把“责任归于德王集团建立在靠不住的美国谍报人员身上。”美国人曾经许诺慷慨援助，使德王和大家“起而抵抗”。

还有其他的例子，记者接着说道，能够从中看出的是美国在中国的作用，诱使他们在“靠虚假的许诺向上攀登，终致失足”。——对所有那些被人当工具使用的人说，这是个严酷的教训。

在宁夏（居住着回族穆斯林）和青海省（住着许多回族，还有藏族和蒙古族），美国人把赌注下在另一方面——反动恶霸军阀马步芳。美国公开赞许马家军表现出的“反共坚定性”，他们残忍地公开处决了500名战俘。然而人民军队打进这一地区，迅速解决了华盛顿这最后的宠物。

在新疆，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乌鲁木齐设立的总领事馆，积极支持对土匪头子奥斯曼的疯狂搜捕活动。这件事结局很不光彩，美国在这个地区情报人员多被处死。副领事麦克曼1950年离开新疆去了西藏。奥斯曼和其他美国工具没过多久也被捕和处决。英国前驻喀什领事也受到牵连。结果是，中国驱逐了福克斯·霍姆斯，1880年代荣赫鹏在新疆探险时期建立起来的这个外派机构的最后一任。外国煽动者抵抗新疆革命的最后结果，是新疆人民胜利地完全摧毁了新老帝国主义者。

最叫美国军队着迷的是西藏，这个“世界屋脊”。他们看到了这里对美国空军、对能控制全中国和苏联、印度的火箭装置的巨大战略意义。第二

出处同上，第887页。摘自马歇尔的备忘录，1948年11月6日。

出处同上，第323页。

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首次向这个地区渗透，进行勘察中，与农奴主贵族有过政治接触，提供了无线电装置。当国民党政权摇摇欲坠时，美国的情报活动更加频繁，以洛威尔·托马斯父子 1949 年用电台记者身份所作的旅行最引人注目。据他们后来披露，他们实际上曾接受美国远东司令麦克阿瑟将军从东京用情报发来的指令。洛威尔领导这个情报机构，还有美国驻印度大使洛伊·亨德森。托马斯父子从拉萨回来，呼吁紧急向那里调运“现代武器并派顾问指导如何使用。”在华盛顿匆匆会见杜鲁门总统之后，他们又向拉萨的农奴主们传达了杜鲁门“希望组织世界道德军来反对不道德行为”的口信，以及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建议：由一名华盛顿高级官员化装成旅游者进入西藏实地考察，拟定一个确切的支持方案。”这封 1950 年 5 月 10 日写的信中，指出艾奇逊建议的秘密间谍是“马克斯·桑伯格先生，我与他在土耳其和伊朗共事两个夏天……他是美国政界元老，致力于在中东抵制共产主义。“桑伯格除了是政府官员，还是洛克菲勒石油帝国要人，是把地方封建分子拴在美国垄断资本裙子上的专家。

美国对于西藏的煽动和渗透计划，使本已复杂的形势雪上加霜。英国早就在这儿稳扎营盘，坚持不懈地推行他们老“缓冲国”计划。抗日战争期间，它于 1943 年在拉萨成立“外事局”，1947 年支持屠杀数百僧俗群众的匪徒，一向支持压制中国主权。还是在 1947 年，由英国导演的“亚洲会议”在德里召开，企图让西藏作为独特的政治实体与会，并且拼凑出一名代表和所用的旗帜。但是印度的新政府，大资本家和地主的代表，不打算放弃英国侵略西藏的果实；甚至是想继承和加以扩大。于是西方强国只得依靠印度，并利用它实现自己的策略。一个阴谋之网在噶伦堡和其他印度边境城镇之间织成。英国驻西藏行政要员和专家理查森，从 1936 年起一直以“印度”官员身份在拉萨执行英方政策。

1948 年，印度、英国和美国允许一个公开闹独立的“西藏贸易代表团”，得到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的美国签证，尽管代表团并没有中国护照。在伦敦，代表团受到艾德礼首相的接见。连濒临垮台的蒋介石政府，也觉得这太过分了，曾提出抗议。但拉萨的外国操纵者继续猖狂活动，要赶在人民革命势力扩展到中国全境之前，完成他们的计划，并不理会蒋的抗议。1949 年 7 月 8 日，在他们要求下，为破坏中国主权的连续性，通知国民党官员离开拉萨。

这一不寻常的花招立即遭到揭露与反对。人民解放军严正声明谁也无法阻止解放军让中国每个地区都获得自由。事实上，这场斗争持续了一年半之久，伴随着帝国主义者在地位削弱后越来越多的自我暴露。当美国情报人员

这已成为标准的美国干涉者行径；1965 年约翰逊轰炸北越，同样伴随着一个“援助重建”的建议，企图收买越南军队停止抵抗。

《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毛泽东选集》合订本 1116 页）。

如洛威尔·托马斯父子等人继续在西藏做秘密牵线工作，在世界出版物和电台上大肆宣扬所谓“西藏问题”时，美国武器已经翻过了喜马拉雅山。在英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声明刚一发布，英政府就重弹 1911 年中国推翻清朝建立共和时的老调：不予承认，除非中国放弃西藏。甚至在英国形式上宣布承认中国的新政府之后，它的情报人员还潜伏在西藏，向独立分子运送由美国提供的通讯设备。他们紧锣密鼓公开进行干涉活动，只觉时间过得飞快。一个是雷金纳德·福克斯，自称“西藏外交部长”并向许多国家签署声明；另一个是罗伯特·福特，素有战争血手和阴谋活动家之称。而英国政府自己，形成强烈对照的是，1948 年它曾欣然为独立分子所谓西藏“贸易代表团”赴西方铺就合法平坦道路；而这次为拉萨代表团经过它的殖民地香港签发过境签证，赴北京谈判关于和平解放西藏，使之成为新中国的一部分时，它却从中作梗，使这个谈判拖延了几个月之久。而印度方面，试图与新中国谈判主动放弃对西藏的领土权。在向北京频频发出的照会中，它宣称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将会“给联合国反对承认人民政府的人以有力支持”，甚至引发“导致一场全面战争的危险。”在对中国一旦解放它自己的土地发出这些黑色预言的同时，尼赫鲁政府继续让英军蚕食中国边境领土。早些时候，乘中国内战之机，印度军队甚至越过了英国为侵占目的而划定的“麦克马洪线”。这曾于 1947 年和 1949 年引起国民党的抗议。新中国并未提出边界问题，期望印度能接受建立在友好基础上的相互关系，清算前帝国主义统治加诸两国的遗留问题。但是在很快产生的西藏争端中，中国却表现得无比坚定。人民解放军挺进西藏，直到 1951 年 5 月与拉萨本地上层头目达成协议，和平解放了西藏。

在这一事件整个过程中，中国明确表示了它在领土问题上决不商量、也不会被吓倒的态度。特别是要它以投降来换取自己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时的联合国由美国控制，成为它抢劫中国和中国东北的工具。在印度发来照会的同一时刻，联合国的旗帜被滥用于侵略朝鲜，并直接威胁中国边境。中国明白，所谓“战争危险”，如果成为现实，绝非由于它维护和保卫自己的主权，而恰恰是它对此产生动摇。那时广阔的西藏，也会成为帝国主义制造阴谋和营建基地的地盘。

中国共产党人不放弃西藏，不仅体现出他们的民族和国际责任，还体现了他们的阶级责任。旧中国政府在保护西藏和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免遭帝国主义侵犯方面屡屡失败。其内在原因，是他们实施的民族压迫和封建剥削。中国人民最终完成反帝反封建革命，不以背叛这个国家任何民族、牺牲其利益

《纽约先驱论坛报》，1950 年 5 月 10 日。

赖因可（Amaury de Riencourt）《世界屋脊西藏，亚洲的钥匙》，1950 年纽约版。

一封小洛威尔·托马斯寄自拉萨的信，落到人民解放军手中，长期在北京民族宫展出。

一位前国民党官员的自述，《西藏的历史状况》，1956 年纽约版。

为代价。中国革命的利益和前途，是与它所有民族的利益和前途相一致的。

西藏解放后，中国唯一仍处于外国控制下的大块领土就是台湾。中国人民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决心让台湾省与大陆统一，无论这要花费多长时间。

现在让我们来总结一下解放战争的成果。

军事上，约 800 万国民党军队被打垮，5.4 万门大炮、31.9 万挺机关枪和无数步枪被缴获到人民手中，用于夺取和保卫革命的胜利。

经济上，广大农村地区的地主天下一朝瓦解，为后来完成全国范围的土地改革奠定了基础。随着城市的解放，垄断集中于官僚资本家手中的工业、银行业和商业，被宣布收回国有。它们变原有的掠夺本性为中国新兴民主经济的社会主义领头成分。那些生产性非投机的私人工商业，政府帮助他们恢复生产，并且在复苏和拓展经济活动中发挥作用。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这是一个由工人阶级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新国家。它代表所有民主阶层，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它在平等权利的基础上团结国内各民族。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新胜利，也开始进入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新阶段。

作者后记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上，毛泽东说了这样的话。用如此精炼的语言，对如此重大的变革，概括得何等真实贴切。这场变革不仅席卷了地球上 1/4 的人民，还使得其余 3/4 的人民也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了。就殖民制度的崩溃来说，它的影响之深远，尤其重大。从 1917 年俄国十月革命以来，新中国的诞生，是世界帝国主义体系遭到的第二次巨大打击，从而使争取社会主义与民族解放斗争在全球的力量天平上，产生了实质性的摆动。

中国最后终于以平等身份站在世界民族之林了。不久，它就表明，中国决心而且有能力在强大敌人面前，保卫自己的领土与主权。在国际舞台上，它不再是任人踢来踢去的球，而越来越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球星了。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进行了太平天国革命，1898 年维新变法，和孙中山领导的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其目的都在于洗雪半殖民地的耻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才使洗雪国耻的目标，得以实现。虽然长期以来，某些外国政府就想能单独或联合起来，统治中国，但从 1949 年以后，就没有哪个国家敢于对中国颐指气使了。这就证明，新中国敢于在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顶住敌人的压力、威胁和挑衅。

在各式各样的威胁中，还包括使用核武器。在 1950—1953 年朝鲜战争中，当麦克阿瑟将军把进攻势头推向中朝边境的打算失败以后，军方高层就特别提到过这一点。建议之一，是在中朝边境制造一片带放射性的无人区。1951 年 7 月 8 日，《纽约时报》曾经断言，如果计划中的朝鲜停战谈判归于失败，华盛顿的头号问题是，美国应该坚持，由联合国 授权联合国军司令，使用手中的一切军事武器，用于结束战争，包括轰炸朝鲜境外（即中国），并在司令官的慎重考虑下，使用原子武器。在 60 年代和 70 年代的越南战争中，对中国使用核武器的选择，又被提到最高的政策水平上叫嚷起来。美

举个例子，1950 年 6 月《约克郡邮报》刊载它驻加尔各答记者的报道说，美国武器正通过纳苏拉山口运进来。美国卷入之后的细节，史里斯托弗·马林的《中央情报局的西藏密谋》一文已详加披露，刊载于 1975 年 9 月 5 日香港的《远东经济评论》。从 1956 年至 1972 年这段时期，这种卷入，包括向西藏空投枪支；和经过科罗拉多赫尔营地训练，用于边境突袭的和“秘密军队”提供财力和武器，向“游击队”接触，有些内容十分详尽。

埃文·洛德：《英国与中国》一书，1962 年伦敦版，第 77 页；1949 年 10 月 3 日《泰晤士报》一篇特稿说，虽然承认中国更有利于英国远东贸易利益，但还有其它考虑……特别是中国侵略西藏的意图，让人耿耿于怀。它不是《泰晤士报》“耿耿于怀”，实际上英国还找不到提出这个问题的机会。根据国际法，西藏几世纪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一事实，注定这里不存在“侵略”，除非来自中国外部，这样的事百年来倒是有过几回。

国前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在他新近发表的回忆录中，引述一则官方的内部备忘录，提到“如果中国进入越南或朝鲜战争，或者由于美方伤亡惨重，而常规努力不能达成预期效果，则可以使用战术性核武器，以及区域毁灭性的、放射性的细菌、化学武器。”到90年代中期，麦克纳马拉还在说，“美国今天的战机已能够像60年代那样随意使用核子武器，不过一般的美国人还未认清这一事实而已。”

在50年代初期的朝鲜战争中，中国还没有掌握核武器。到越南战争时，中国已拥有了核武器，但公开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麦克纳马拉还说，在他任国防部长时，曾经建议华盛顿发表一篇类似的声明，但由于遭到反对，未能发表。麦克纳马拉所说的，使用美国核武器，都不是指受到核攻击时的反击，而是指首先使用。他就事论事地提到的细菌武器，证明在美国军火库中的确拥有这武器，不过未加承认而已。

外国垄断核武器的压力，不只是来自美国一方。前苏联首脑赫鲁晓夫，当中苏还是友邦时，就不愿中国分享苏联的原子军事技术。但在1959年他与当时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会谈中，曾经讨好说，两家拥有核武器的超级大国，只要摇晃一下指头，别的国家（指中国等等）就得俯首贴耳，听从吩咐。

我们从历史的来龙去脉上看，中国在核武器的讹诈中，果敢无畏，不被敌人吓倒。中国原来没有核武器，1964年在科学家与工程技术人员通力合作下，研制出了核武器。当时中国就宣布，中国小规模研制核武器，是为了结束超级大国的核垄断，而且主张全世界销毁核武器。直到今天，中国还在为此大声疾呼。

最后，大多数过去曾经轻而易举践踏旧中国而捞了一把的列强，又不得不跟革命诞生的新中国，建立起关系。愿也罢不愿也罢，他们别无选择。那些封锁中国贸易的政府，尽管有些勉强，也不得不在平等基础上，恢复交易。他们的商人热心向经济快速增长的中国投资，并依法取得利润。因为他们不来投资，别的竞争者便可挤进来，把美国抛在后面。

外国势力曾经指望人民共和国在摇篮时便在重重困难中，夭折消亡。后来才知道，占人类四分之一的中国，正在进行新的长征。不是在名义上，而是在实质上，即经济上与技术上，力争与世界发达国家，真正并驾齐驱。对于这一点，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已经说过，中国土地辽阔、人口众多，而底子又极其薄弱，在这样一个国家中，任务是极其艰巨的。我们的任务是，从

几年后被中国从关押中释放，福特企图在书中洗清自己所作所为，即伦敦Pan书店1958年出版的《被囚西藏》。然而这本书恰恰成了他的自供状。例如，他说自己曾劝导昌都的封建叛军——昌都属于中国当时存在的一个藏族聚居的西康省：“把一些布朗式轻机枪藏在山里，炸毁桥梁。”（第51页）还有，他一边否认自己参与了毒杀爱国进步的吉达活佛的行动，颂扬这位活佛的诚恳正直，一边又无耻地宣称，“我知道是谁杀了他。我希望他永远不被发现。”（第92页）

1949年算起，在大约50年间，使全国人民消除贫困，达到小康水平，然后再用半个世纪时间，达到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因此，革命走过的一个世纪，只是个序曲。

到1952年，即全国解放后的第三年，在社会上，农民已完成土地改革，结束了长达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束缚。到1956年，即又过4年之后，中国又逐步完成了巨大复杂的过渡时期，即农业上从私有制转变到社会主义所有制，对城市工商业也进行了改造，而且在大转变的过渡时期，农村、城市生产都未受到损失。相反，产量都得到增长。

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中国在50年代早期，就结束了国民党统治最后几年间留下来的通货膨胀局面，当时其疯狂势头有如脱缰野马，钞票的购买力跌落到100万倍。要解决这项任务并非等闲，而是在经历了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内战，又经历了和妄图扭转中国革命进程的世界最强大超级大国在朝鲜打仗，即在几场战争后的废墟上进行的。正像反击那个经济军事巨人，把中国人民的自尊心提高到一个新水平那样，制止通货膨胀的胜利，表明中国人民如何与新秩序结合在一起，单靠经济手段，不管多么巧妙，也是不行的。

短短几年间，外国看中国的眼光就得完全改变了。说它无力防卫？它可打退了头号超级强国。说它战乱不息？它国内可一直平安无事。说它饥馑挨饿，多少人都有吃的，而且比过去越来越好。说它肮脏多病？它不断进行大规模卫生运动，从前流行过的天花、霍乱、吸毒，在新中国成立后的20年间基本消失了。医学教育家对我说过，他们曾经找不到向学生展示性病的病例。生活水平、医疗、教育，得到确切保障，虽然总的水平还不算高。旧中国猖狂泛滥的贪污，现在已得到大力治理。不错，在未来岁月中，随着旧中国形象的消失，它的道德方面的弊端，可能以某种新的形式出现，或者从外国传进来。但没有一个人能够否认解放带来的优良秩序和总体上的进步。

在一个幅员广阔，经济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其复杂性远比争取民族民主革命要大得多。所以，从1949年解放到现在，已经又过去近半个世纪，中国在取得许多举世瞩目的成就之外，还出现过暂时性挫折，那就不令人感到奇怪了。

和旧中国对比起来，中国革命带来的成就，令人感触最深。本书作者青年时期是在旧中国长大的，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那时候，中国还没能生产钢，连普通的钢笔尖，大头钉，也靠从英国、德国进口。老百姓把安全火柴叫作“洋火”，大多从瑞典运来。石油制品被人叫作“洋油”，则是从美孚油公司进口的。自行车来自英国和德国。在1949年之前，中国不但不能生产汽车，连组装也不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农业，10个农民中有9个都使用木犁耕地。

到了1980年，中国已年产3300万吨钢，而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只有100万吨。1949年因战乱影响，实际产量已经跌到可怜的16万吨。

总的来说，现在中国工农业产量是 1949 年的 16 倍。其中工业产量比重从不到三分之一增长到四分之三。钢增长 200 倍，煤增长 9 倍。至于原来几乎一无所有的石油化工制品、汽车、飞机产量，则可说得上成百、成千倍的增长。农业产量比 1949 年增长 3 倍，粮食产量增长 3 倍，棉花增长 7 倍。

更令人难以相信的是，又过了 16 年之后，到 1996 年，中国钢产量超过 1 亿吨。美国电视台有位评论家曾就此指出，“像这样爆炸性的经济增长，是任何国家都没有过的。”大量增长的还有汽车、电机、水泥、化肥、洗衣机、冰箱、空调器、电脑、电视机。现在城市多数家庭和农村两成半家庭，都已拥有电视机。

由于中国人口众多，按人均计算，在全世界 194 个国家中，被世界银行列为第 161 位，不但比发达国家差距悬殊，也比许多发展中国家，相去甚远。

按人口平均收入、消费、福利计算，中国在这方面还要做大量工作。它有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大市场，因此它不但要大大增长产量，还得大量进口别国的产品。经验证明，发达国家在经济上对世界贸易投资也在继续增长。一个稳定繁荣的中国，对世界和平的发展，对别的国家都是至关重要的。

当然，尽管有了上述惊人成就，应该说，还有不少不尽人意的地方：

1. 随着生活改善，婴儿死亡率下降，中国人平均寿命已增长到 70 岁，到本世纪末全国人口将达到 13 亿。这就出现一个严重问题。如果国民生产总值不能与人口增长率同步上升，人民的需求就得不到满足。所以，必须严格实行计划生育。

2. 由于先受到美国及其同伙，后来在 60 年代又受到苏联及其一伙的贸易制裁，管制技术进口，使得中国的进步被迫放慢了进度。

3. 由于中国共产党和政府采用过一些极左政策，原来想急于求成，高速发展，结果却适得其反，更加滞后。

4. 由于上述几种原因造成的困难，一些大国，如美国、德国、日本，在经济技术上有了长足进展，使得中国与他们的差距，随之拉大。

在这种情况下，新中国必须完成它的第二次伟大任务。在着手建筑社会主义大厦时，要显示它能够赶上有漫长历史的资本主义，并且最终将超过它。如果生产力不增长、物质不丰富，特别是在广大农村还有几百万农民，生活不富裕，就无法证明社会主义的原则——“各尽所能，按劳分配”能给人民生活带来决定性改善。更无法让人相信最终的共产主义目标——“按需分配”。中国共产党的实践，证实和检验了这条客观法则。即中国社会主义革命正在改变国内形势（虽然有得也有失）和国际环境（一再证明它有力量维护自己的独立性）。这也正是它在民主革命时期经历过的法则，即尽管道路曲折，但必然走向胜利。

无论是 50 年代末发起的“大跃进”，还是 60 年代至 70 年代的“文化大革命”，都是在毛泽东授意和鼓励下发动的，以为两个运动能启发广大群众的热情，在物质精神上朝着既定目标高速起飞。当时举国上下都被这种精神

鼓舞，被“大跃进”的口号弄得目眩神迷，因而奋发努力，认为能做到“一天等于20年”。当全国钢产量还未达到1500万吨时，马上又产生了能达到3000万吨（！）的幻想。工业和农业都不断制订出新的高指标。地方领导和积极分子竞相汇报，完成和超额完成了这些指标，唯恐背上落后或信心不足的罪名。人们虽然付出了慷慨的支持和努力，到头来这些竞赛不是增强，而是削弱了在此之前取得的那些实实在在，而现在却被嘲笑为缓慢爬行的成绩。

更大的危害来自“文革”，这更长时间内，出现以权欲熏心的“四人帮”为代表的极左路线。它不仅仅反映在经济领域，那些除了高喊口号和一味阿谀奉承、拉帮结派外没有其他本事的人，爬上了高位（被称为“坐直升飞机”）。而许多久经考验、知识渊博的政治、经济领导人被羞辱、罢官、流放、监禁、折磨——有的迫害致死。对教育的破坏损失了培养新人才的10年时光。经过考验的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也遭到破坏，爱国人士和知识分子得不到正当使用。解放后的现代化装备，虽然比解放前好得多，也被废弃。种种恶果，使许多年轻人受到腐蚀，有的悲观厌世、玩世不恭，或者空喊政治口号，搞派性斗争。

后来周恩来总理试图力挽危局，拨乱反正，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然而而是邓小平在几起几落之后重新出山，才制定出新的政策，把中国引向快速发展的道路。在他看来，由于孤立中国的企图失败了，中国可以大胆放松一些僵化政策，无论对内还是对外。中国开始寻求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往来，做到平等互惠。70年代末，当“四人帮”造成的危害被揭露出来，并且部分得到纠正后，一项被概括为“改革开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经济政策，在邓小平指导下开始执行。

改革首先在农业领域展开，以农田承包到户、承诺上交一定产量的形式开始，取代了过去在生产队劳动、由集体分配的体制。农民可以选择是种地，还是到市场去出售剩余农产品，这些产品过去只能按规定价格卖给国家。这个政策刺激起农业生产的积极性，而且带来农民收入增长，这样农村很快就呈现出大建新房的景象。

接着是城市和工业改革。在保持国有企业的主导作用的同时，还吸收中外合资，甚至外方独资，以及合法的私营企业，都来参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竞争。“开放”还包括鼓励投资和引进技术。“现代化”包括在技术和企业管理方面的更新。在这两个领域里，都意味着要向资本主义学习有用的东西，而不是去学习资本主义本身。目标不是让一切东西私有化，而是抓住机遇，最大限度地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这在20年前，根本办不到的，因为这种设想会被认为是异端邪说。在这个发展纲领的实施过程中，中国的城市和乡镇成了建设和重建的汪洋大海。为利润机会所驱动，外国投资涌入中国。中国制定这些政策，不是象过去那样，由列强勒索出的优惠待遇，而是靠自己独立、自主与强盛。

中国按照新政策，制定了国民经济总值在 1979 到 1990 年翻一番，到本世纪末翻两番的目标。这两个指标都已经达到了——第二个是在 1996 年，比预定期限提前 4 年实现的。

海外投资最初集中在简单的加工出口商品，后来逐渐改变为投向技术转让和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建设，在一段时期里集中供旅游、公司办公楼和外国雇员使用的高档楼堂馆所，后来转向改善普通城镇居民住宅，兴建交通设施如地铁、桥梁、高速公路等等。

在消极方面，巨额流动资金导致一些政府官员和接近他们的人员中出现大量腐败现象，引起老百姓气愤，要求采取措施堵塞漏洞，惩治罪犯。崇拜洋货和高消费倾向，在浪头过后开始平息。面对竞争，许多国内产品在质量、外观和服务上都有改进。因此进口虽然继续在增长，但已强调进口生产现代产品的设备和原材料。

到 80 年代中期，农民收入增长之快超过了城市居民。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乡里人成为农业工人。农民开始渴求知识，阅读科学技术小册子。不幸的是，农村还存在着铺张浪费操办婚事、丧事和佛事的风气。近来，随着农民收入再一次赶不上市民收入的增长，许多农村青年又纷纷拥到城市好多赚钱。这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农村青年的劳力。然而另一方面，他们又使城市汇款流向农村，并带回了知识和技术。

整体说来，改革和开放常常可比作一扇打开的窗口，吹进了振奋人心的生气，但也飞进了苍蝇。后者是指一些社会弊病和犯罪又死灰复燃。消除这些现象需要长期的决心和努力。邓小平号召物质和精神方面要两手抓，实际工作中，常常是精神方面的一手软。这种不相称的局面已经引起重视，正在加强补救行动。

中国的开放政策并非旧时期的“门户开放”——后者被侵略者的大炮轰开，被迫予以优惠特权。如今，中国拥有绝对主权，可以看好自己的门户。

现在来谈谈中国对外政策的几个方面的措施。

中国从未在海外驻军和设置军事基地。它长期实行不结盟政策。它不向海外派遣远征军和建立基地，设置推翻邻国政府的据点。它一再声明，保证不介入别国事务，不当超级大国。

当多极世界取代了两极的冷战后，中国愿意帮助建立一个和平的国际新秩序。认为将来的世界不应该重复依靠军事和政治争斗，调整势力均衡。无论言与行，它都力求与所有国家——无论大小，也无论其政治和社会制度如何——在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的前提下，发展友好关系。

本书的目的不在于责难、报复，而是为了未来。历史是实实在在的。忽视它就会导致重复，或者承受历史重演的苦难。只有正视过去的错误，才有可能改正错误，为新的友好关系消除障碍。

中国致力于与所有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和邻国发展友好关系。与

紧邻的俄国和印度建立共同的利益纽带，暂时搁置边界争端，对曾经侵犯它生存权的国家，也寻求建立一种良好关系。例如它表示，在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后，希望中英贸易和其他交往不是萎缩，而是更加扩展和改善。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因为台湾问题而一直时好时坏。美国在战略上一向把台湾当作它“不沉的航空母舰”，和“遏制”中国的前哨阵地。然而从现实主义态度和共同利益着眼，在世界上经济最强国家和发展最快国家之间的交流，正在持续进展。与日本的关系长时期以来相当巩固——尽管日本右翼组织企图破坏，为日本过去对中国的侵略涂脂抹粉，并把一再受其侵害的中国形容成一种威胁，虽然中国在日本土地上没有踏上一兵一卒。很多世纪以来，这两个国家隔海相望，有着悠久的文化联系，特别是经济上的互补，两国有更多理由友好相处，而不是争论不休。在各个方面，中国都谋求积极的合作成果。

西方媒介始终热中于反对新中国的大合唱，并且调门与年俱升。中国所做的一切都受到攻击和污蔑。它的人口直线一升，就被说是“挤满地球”；制订计划生育则被说是“侵犯未出生者权利。”它经济遇到困难，就被说是整个体制难以运转；它借助资本主义国家现代管理技术，就被嘲笑为背叛了自己的革命。

今天，随着经济迅速发展，它被夸张地形容为世界第三、第二，甚至头号经济强国，很快就会演变为军事威胁力量。国内各地域发展不平衡，就被断定是走向地区和民族的分裂。它坚持自己根据历史和国际法对香港、台湾、西藏行使应有的主权，那就被攻击为：“侵略”。

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被一些发达国家指控为环境污染的罪犯，而这些国家自己几个世纪来一直在污染环境，甚至现在还要向中国和第三世界其他地方倾泻它的有毒垃圾。中国在工业史上采取环境保护措施比发达国家还要早，这一点几乎任何外国报纸都不曾提及。

一个最荒谬的流行的诬蔑，说中国是潜在的战争威胁。事实上中国裁减了100万军队，国防预算只有美国的十分之一。

反对者们组成了一支反华大合唱，源源不断泼来脏水。其实明智做法是：停止泼脏水，面对一些主要事实。

事实之一：新中国的崛起，无疑是世界发展的积极力量。

只须做一个对照，看看如果旧中国依然存在，将是个什么样子。如果它没有经受住从鸦片战争到解放这一个世纪以来的入侵、干涉、分裂、屈辱，和加诸它身上的无尽苦难、折磨；如果它不曾抵御住列强的争夺，就难以保留下一片完整丰饶的大地。1931年日本武装占领中国东北，点燃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10年之后日本侵略全中国，继而又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如果当时中国是个强大主权国家，日本是不敢这么干的。战后美国在朝鲜和越南燃起战火，众所周知是妄图“逆转”中国革命的进程。因为新中国的存在不同于贫弱的旧中国，它使外国列强卷土重来之梦化为泡影。

事实之二：无论旧中国还是新中国，都没有在别国土地上发动过战争。中国的强大来自它成功的革命，这也有助于国际和平的巩固——不仅为它本国人民，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其他国家的人民，包括在亚洲非正义战争中耗去众多儿女生命的日本和美国人民。新中国决心而且有能力不再回到贫弱的旧社会，这对全世界都是件好事情。

事实之三：中国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里，致力于以平等、互不敌视和彼此有利发展的态度进行对话和调整关系。承认分歧，不急于解决，而留待在更好气候下来处理。对历史遗留下来的棘手的内部难题，它创造了一个在完全和平条件下的解决办法——“一国两制”。这一政策运用于对前殖民统治的香港和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和台湾与大陆的统一。

在这三个无可否认的事实基础上进行对话，以谋求共同的利益。这比起泼脏水加剧世界紧张局势来，要强得多。国际间的观点差异是正常现象，应当通过彼此对话——而不是冲突来解决。在今天的环境下，世界取得比过去更大的进步是可能的。而对争取下一世纪的和平与发展，更是至关重要的。

爱泼斯坦
1997年4月

